

[意] 安东尼诺·费罗
(Antonio Ferro) 卢卡·尼科里
(Luca Nicolì) 著
曹思聪 白龙天皓 译
童俊 校

QUESTIONS

ANALYST'S

CONTEMPORARY

ABOUT

PSYCHOANALYSIS

我想弄明白。

明白什么？

这些，所有的一切。

当你忘掉你先前明白的一切，
你就会明白。

星际漫游

The New Analyst's
Guide to the
Galaxy
Questions about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当代精神分析指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星际漫游：当代精神分析指南

The New Analyst's Guide to the
Galaxy: Questions about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意）安东尼诺·费罗（Antonino Ferro） （意）
卢卡·尼科里（Luca Nicoli） 著

曹思聪 白龙天皓 译

ISBN: 978-7-111-63435-5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客服热线：+ 86-10-68995265

客服信箱：service@bbbvip.com

官方网址：www.hzmedia.com.cn

新浪微博 @华章数媒

微信公众号 华章电子书（微信号：hzebook）

目录

导读	
前言	一组令人不安的想法
第1章	身份
第2章	游戏规则
第3章	开始
第4章	理论问题
第5章	从弗洛伊德到比昂
第6章	轻装简行
第7章	分析场域
第8章	技术议题
第9章	梦
第10章	会面
参考文献	

“我想弄明白。”

“明白什么？”

“这些，所有的一切。”

我指指周围，

“当你忘掉你先前明白的一切，你就会明白。”

——伊塔洛·卡尔维诺《鸟的起源》

导读

这是一本读起来很有趣的书。本书呈现了一位资历尚浅的分析师和一位世界级分析师之间的对话，风格轻快，为那些对精神分析充满好奇的人提供观察的视角。

从积极地给予诠释到容纳地给予共情，这种转变有多难？中立性是什么？应该保持多大的中立性？什么时候使用躺椅？分析持续多久？如何收费？色情性移情、负性移情、投射性认同、对缺席会谈的收费争执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好治疗记录？这些都在本书里有比较清晰的描述。

随后，话题从理论到技术，从投射性认同、转换、洞察的治疗价值到分析场域（analytic field）中角色的选择。这位世界级的大师就是意大利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安东尼诺·费罗，他关于分析场域的观点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非凡创建。他跟随维尔弗雷德·比昂

（Wilfred Bion）的脚步，将分析工作的重点从揭示潜意识内容转变为针对分析师与患者之间关系的隐喻叙事（metaphorical narrative）。精神分析中的两个主体不再被视为相互关联的身份角色，而是在关系场中相互融合的两个世界，在不同的时间会生出许许多多的场景。费罗的精神分析的主旨在于，经由创造故事，使得现有关系中的内隐方面外显出来。患者被压抑的部分、隐藏在深处的攻击性因素，被鼓励浮现出来，再与分析师的直觉和叙事能力所能创造的角色相遇。

这样的精神分析听起来很文艺，从精神分析开创时的一人心理到客体关系的二人心理，进而到由这两人带来的穿越古今和国界的两个世界。这真如费罗所言使人感到眩晕。什么是分析师呢？只有当患者在场并且在治疗框架之内的时候，分析师才能够获得分析师的身份认同。这有点让人联想起温尼科特的经典话语：“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儿！”

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之父被人攻击——从他的敌人到他的战友，再到精神分析的信徒，这似乎是他的宿命。如果你问什么是精神分析的精髓？大概是永无止境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永远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并因此永不停歇地探索，如同星际漫游。

本书到底说了些什么新东西呢？它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过时了。“这就像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我们能站在第七层，显然要感谢曾经从第一层走到第二层，从第二层走到第三层，从第三层走到第四层，等等。我们感激让我们走到第七层的那些脚步，但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还没有走到的楼层，以及这栋建筑中未知的房间，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建成的部分。”本书强调我们关于患者的已知情况所带来的“污染”，在临床工作中是灾难性的。同样，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理论和模型应当被我们所了解，但我们不应被其束缚，应该永远对未知充满好奇。

关于潜意识

费罗认为，没有考虑潜意识这个维度，那就不是精神分析了。费罗指出，潜意识具有不断在形成、转化、发展的结构，分析师和患者一起成为功能性潜意识（functioning unconscious）的生产者。分析工作就像是没有指南针的向导，分析师和患者一起成为潜意识的创造者。

费罗认为，在分析师被要求扮演的所有角色中，他首先是一个“魔术师”，他使用了声音、图像和文字的魔力。分析师改变了（患者的）内在现实，他骑着龙，驱除了恶魔：他为想象、创造、荒诞和未经思考的事物开辟了一个空间。

关于游戏规则

费罗认为，在分析中也需要有一定的频率才能触发连锁反应。如果每周能有三四次分析治疗的话，精神分析的某些作用就会显现，使得我们可以逐渐放下现实的某些方面。

如果每周只有两次甚至一次会谈，你能做精神分析取向的工作吗？当然可以，但我会称之为“精神分析取向的工作”。即使每隔15天或一周做一次治疗，患者所承受的心理痛苦也能得到缓解。这项工作有其存在的道理。然而，这并不是分析工作，难以帮助患者得到真正的身心成长，患者也难以充分获得之前不具备的能力。

对于分析频率、会谈时长、治疗的稳定性来说，关键在于节奏。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原始内核（archaic nuclei）时，也就是面对那个自闭的内核（autistic

nuclei) 的时候。单单依靠语言，我们无法接近那个最原始的内核，布雷格 (Bleger) 称之为凝集性核心 (agglutinated nucleus)。依托于节奏，再加上投射性认同等前语言的成分，治疗才能成功。

除了这些条件外，治疗协议也是必不可少的。费罗宁愿对不愿意为治疗付费的人坦言我需要这个钱去支付我的房贷，而不是用金钱去证明治疗的价值。

在本书中，费罗大师呈现了他与他的患者独特的相遇方式，并以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超过5分钟的沉默会切断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联结。他认为，给成年人、儿童和青少年做分析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可以学着从儿童身上看到我们内心以及父母内心的稚嫩层面；从成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结构化的思维层面。分析师可以做游戏分析，但需要思考为何做这种游戏。

精神分析的研究是非常难的，费罗认为精神分析最好的观察方法仍然是在这次分析结束后把经过写下来，或者在分析过程中做些简要笔记。尽管相对于分析会谈的实质而言，这些记录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但是基于此我们可以研究患者的叙事衍生物。这和督导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费罗说：“如果我把某次分析录了音，我不得不用录音时同样的时长来回顾所有这些材料；相反，一份事后重述的案例报告是经过了‘过滤’的，也就是说，过滤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保留那些最重要的内容，这会更容易进行督导。”

关于中立

费罗关于“中立”的观点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他说：“我觉得分析式中立这个概念太荒谬了。这就像我们幻想着可以自我受精，或者幻想通过眼神交流就可以怀孕。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在许多地方‘弄脏’自己。我发现两个人以中立的方式在一起的想法是荒谬的，是不现实的。”这个“弄脏”是指：“分析师必须要让自己能够被患者的焦虑、情感所渗透。为了允许渗透，他应当做到虚怀若谷。”

显然，分析师很难做到“虚怀若谷”。这种所谓的“弄脏”，在于你是否能够透过患者的现象看到本质，了解“客观现实”和“内在现实”。费罗相信分析师要有能胜任这种工作的能力，一个自己的“好的、长程的且有趣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即自己接受一段长程且有益的分析治疗是必不可少的。

从弗洛伊德到比昂

费罗认为，比昂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概念，即有一个心理过程不断地改变我们从现实中接收到的信息，从而使现实不断地转化为我们头脑中的电影镜头（movie sequence）。在精神分析发展史上，费罗认为两位天才创造了所谓的“元心理学”。弗洛伊德是个天才，比昂是在他之后的又一个天才。比昂的理论模型在知识上迈出了一大步，从畜力时代到了蒸汽时代。从这种新的元心理学中衍生出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临床技术，如果某人不了解比昂的理论模型，那么他也无法掌握以此为基础的新技术。费罗认为，比昂的元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完全不同，而且两者没有可比性。自我功能与功能之间没有什么异同点。费罗教导我们接受至少两种元心理学。如此看来“分裂”是分析师的宿命，但关键是你必须看到这一点。如果你要建立一个训练模式，就必须考虑到这种难以被整合的多元性。当我写到这里时，我意识到接受多元性是精神分析的态度，尽管自精神分析建立之初，各分析流派的争斗愈演愈烈，这也让我理解到接受不确定性是多么不容易。

关于移情/反移情

费罗提到：“有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也许现在是时候讲出来了，那就是移情/反移情这个轴心（transference/countertransference axis）。”此外，他认为只有当这个“镜像”的轴心与一个特定的理论模型连接起来的时候，它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分析场域”这个概念，它都没有空间去容纳那些老旧的轴心、过时的理论：既没有移情，也没有什么反移情。这里有的是一种多群体的状态，理论模型不断地变化，就像海浪一样，处在永恒的转化过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抛下移情/反移情这个轴心。在已知的事物之外，正是精神分析的魅力所在，科学的魅力所在，那里是无限的未知的深渊，而我们应该潜入其中的正是这个深渊。

关于投射性认同

我会更多地将投射性认同看成是从一个心灵（mind）到另一个心灵微转移/排泄（micro-evacuations）的连续交换过程，它既是从患者朝向分析师的，也是从分析师朝向患者的。这里我们需要用一点俚

语： β 元素即感觉，不断地从一个心灵向其他心灵行进，我们可以称之为“旅行”。投射性认同的过程越强， β 元素越多。当分析师为感觉落实情境时，他便被视为是具备接受能力的，种种感觉在其心中汇总积淀，并被分析师所理解，从而达到他对患者的投射性认同。

在费罗反复强调忘记弗洛伊德时，我们的问题在于：是开始就不要学习“学院派”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是在习得它之后批判它？我们是否在习得一种经典理论后，然后将之抛弃，才能发展出新的理论呢？

安东尼诺·费罗指出：我们有必要进行西点军校式的正统学习和培训。当然，他不认为西点军校需要弗洛伊德主义。毕竟，西点军校的训练模式极具克莱因主义倾向。他拒绝将元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等同起来。元心理学可以属于弗洛伊德主义、克莱因主义、比昂学派等。在我看来，不管怎样的离经叛道，本书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属于学院派的，还是崇尚科胡特、奥格登、比昂的理论模型，要想成为分析师，接受IPA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你选择怎样的模式，和你与怎样的患者打交道有关。

关于分析场域

分析场域是指通过治疗室中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投射性认同而形成的无意识力量的场域。

费罗说：“我的模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更接近于叙述学，它是很好的灵感来源。尽管叙述学是精神分析之外的一个领域，然而它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概念，且使其更全面。角色在叙述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更传统的观点来看，角色相当于人，然后以角色为故事的驱动力，最终由文本的读者和作者共同建构角色。”

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由对青少年和婴儿的分析实践，分析师发展出了新的、更直接的、更通俗的分析疗法。同样，患有严重疾病的患者也在迫使分析师改进和扩展他们的分析工具。

费罗相信移情存在一个总体情境，但他认为移情一定不是单向的、仅由患者朝向分析师的。尽管患者朝向分析师的移情非常普遍

（就像在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中占了三个车道），但至少有一个是相反的方向，即从分析师指向患者。

从历史进程来看，作为针对压抑的诊疗方法，精神分析发展起来了，通过横切意识的方式提取出了幻想和情感的材料。简单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场域理论更专注于分裂和解离的区域的发展，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意识的垂直切割吗？费罗认为，压抑的现象和分裂的现象一定存在于分析场域。被压抑的部分，甚至是分裂的部分，基本上早已存在，早已被创造出来了。我们现在关注的，以及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那些还没有到达可思考程度的东西，那就是分裂的上游，也定然是 α 功能的上游。

场域理论也有可能会被理解为情感的全息图像，释放两个心灵的功能。我们被允许在一个小节过程中分享梦境，从而处在场域理论的各种模型中。

费罗认为，一位患者所带来的内部群体，在分析师打开办公室大门时，与分析师的内部群体相遇会带来“场域”。一旦这些群体相遇，我们场域中的所有角色就会立刻发生转化。我记得一个曾经跟随我实习过一段时间的法国治疗师，在离开前告诉我：“在我们法国看心理医生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件，为什么在你的门诊来看心理治疗的都跟着这么多家人？”当然，法国人的心理治疗现实也不见得不是成群结队的。当一个中国患者进入治疗室时，有多少内部群体与分析师的内部群体相遇呢？这其中会有多少相遇呢？

在这里，费罗提示我们：对伟大的文学名著或经典影视的观察也会为我们带来许多工具，打开许多世界，增添许多视角和叙事方式。多亏了作家，或者多亏导演，我们将会磨练出拓展想象力的工具。分析师就像一位小说家，我们的小说写得很精彩，遗憾的是，只有50分钟的阅读时长：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分析小节就是小说中独一无二的部分。

如果费罗认为分析师就像小说家，那么不难想象在分析的场域里，有多么包罗万象。一个个分析师又必须在这种复杂的场域中能够去解构各类角色。

关于技术问题

受训者常关注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费罗认为，分析师应该是纯洁的，毕竟“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患者会很清楚分析师是否诚实，他是恶棍、骗子、一个堕落的人，还是他有一颗清白的心。肯伯格说：“患者头上有根敏感的天线。”费罗并不担心分析师犯下技术上的错误。如果分析师犯了技术上的错误，他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如果画作沾有污迹，画家就可以做出修补。我们在生活中存在痛苦，但是我们不应该将痛苦理想化为好事而沉湎其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分离、隔阂、死亡和疾病中承受了太多苦痛，所以让我们试着也在分析中做些其他的事情。

这种所谓的其他事情，就是设法把关于一个可怕事物的想法变得对于儿童来说都可以忍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做游戏：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且十分符合道德规范。我认为，分析师经常是“看破不说破”，这是在考虑患者以及患者群体承受痛苦的能力。当时机成熟时，患者自己会说出痛苦，释放压力，这比由医生说出来更好。我们要对自卫的表现宽容一点，恰当的防御使我们活得愉悦。

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分析情境是相当对称的。有两个不对称的位置，其中一个不对称的地方是伦理责任。在治疗室里应当没有任何欺骗行为，在这个治疗室里发生的事情中，99.999%的道德责任都是分析师的。这是最不对等的地方。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对等的情况，事实上分析师应该知道，在他的外套下面穿着一件戴着船长徽章的衬衫，他有责任制定航线。因此，这个责任也是不对等的，而且我认为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分析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决定导演人选的人。导演选择权也是属于患者的，但对这两个人来说，有一点不对等也是合理的。

关于梦

在这个迷宫中，当代精神分析似乎将焦点从梦的隐性内容转移到显性内容。事实上，询问有关梦境的联想这个普遍习惯正面临质疑。在通往无意识的捷径上有“待尽之事”吗？

费罗认为，整个精神分析过程就是一场梦，因为它来自这样一种假设，即分析师经历的首个丧失就是丧失现实。甚至从你进入分析的那一刻起，患者说的每件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当成现实来对待。费罗认为，梦真的是最不应该被诠释的，但是在梦中是可以做游戏的，精

神分析就是像做梦一般谈话。一旦我们和患者在一起时，交流对我们和患者都是最有利的。只要我們不去指责他，不去说所有问题都是他的错，不指责他的攻击、误解、嫉妒，这就足够了。那么，在这种方法中需要注意的风险和契机是什么呢？费罗回答：“风险是患者被治好了，他感到好多了，一种分析的方法被另一种取代了。”如此，精神分析过程的核心在于梦见双方能力的扩展，让患者获得一些工具，增强他代谢现实的能力。

关于会面——象征化缺陷

我们来谈谈临床实践。目前，精神分析的重点落在了所谓的象征化缺陷（defects of symbolisation）上面，这在神经症患者和更脆弱的患者身上或多或少有所体现。

费罗问：“我们仍旧必须使用象征化这个概念吗？”

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α 元素的转化，讨论一下容器的变迁，也就是说，用一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更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东西，从而更好地指出问题所在。也就是说，情况到底是 β 元素的过量，还是 α 功能的缺失？这有点像是把光学显微镜换成电子显微镜，后者能准确地告诉我们正在谈论的细胞膜究竟在哪里。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我们都有一些边缘的部分，我们应该与这些部分保持一种通达的关系：我们应该能够在我们的边缘性（borderline areas）区域、精神病性（psychotic）区域、自闭（autistic）区域、身心（psychosomatic）区域开设交流空间。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该认为某一种心理功能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费罗认为，那些具有某种倾听能力的精神分析师可能比其他精神分析师工作得更好，这要归功于前者更了解人们通常所回避的心灵区域。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策划编辑华章心理的曹文女士，我们一直合作近10年，很多我们共同合作的书籍都排在受读者喜爱的前10名。同时也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曹思聪心理治疗师和白龙天皓心理治疗师，他们都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深知他们的英文能力和文字能力都能胜任本书的翻译，而且他们确实不负所期。我相信本书也一定会像其他几十种语言的译本一样，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

童俊

武汉市心理医院

2019年3月31日于厦门鼓浪屿

前言 一组令人不安的想法

“你还在用躺椅吗？”

“假设我们搭伴儿工作怎么样呢？你向你的患者解释他们的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通过治疗来帮助他们。”

“医生，我想谈的是我现在的的生活。你不会只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吧？”

每天，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拜访朋友的时候，我都会注意到今天的精神分析是如何被人们看成是一项有些过时的智力活动的，一种怀旧者沉湎其中或者求得反复解剖的怪癖，而他们的生活却依然如故。

精神分析，这门我最热衷的学科，这门倾注了我多年学习、努力和金钱的学科，之所以背负如此强烈的偏见，部分原因确实在于当今社会对传统的机构失去了耐心，忽视了传统的方法，接受了那些时髦方法的投怀送抱。不过，精神分析师自身也难辞其咎。

就像许多革命后来掌握了政权，我们的学科诞生伊始，是以“文化糟粕”的面目示人的——我们为资产阶级淑女的性冲动发声。长期以来，精神分析一直在努力维持自身的创新能量，而现在，许多分析家正在给精神分析带上一套枷锁，一套世人非常熟悉的枷锁，不允许这个学科再继续“放肆”，担心它会失去灵魂。这有可能置精神分析于僵化的境地。所以，我们被画进了讽刺漫画，不论画得精确还是荒谬。画面中那个分析师缄默不语，几乎要入眠了，而他那可怜的患者兀自泣流成河。

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由与青少年和婴儿的分析实践，发展出了新的、更直接的、更通俗的与患者进行分析的方法。同样地，患有严重疾病的患者也在迫使分析师改进、扩展他们的分析工具。

让我深感痛心的是，精神分析文化的革新相当缓慢，而外界对这一变化也知之甚少。或许是因为精神分析的接班人很难超越弗洛伊德带来的珠玉在前的影响，或许是因为精神分析师担心如果通过大众媒

体、大众写作来传播他们的观念，会过度简化他们的概念；不管怎样，现在许多人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蒙着灰尘的怪异之物。

那么，那些好奇的人们，他们希望遇到一个能够带领他们面对恐惧、探索内心世界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那些今天的、明天的新手分析师们又该如何呢？他们希望倾听来访者内心的梦，希望接纳来访者，而不是被迫诉诸行为技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医疗机构的临时工作人员或者学生，甚至还在当酒保或者服务员，他们要上夜班挣钱来支付他们的学习和分析费用，他们只能在白天的有限几个小时来当治疗师；还有那些自由执业的治疗师们，他们的患者往往是来了又去（当患者离开治疗的时候，你会对自己有许多自我怀疑……）。所有这些人都会被一种热情支撑着，外人很难理解这种热情。

这本指南就是献给这些梦想家的。

这本书有点像一本指南，又有点像一本轻松戏谑的手册，让我们看见一位大师级别的精神分析师的工作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在以前可能是看不到的。

我有幸成为第一个看到的人。我欣然同意了安东尼诺·费罗（Antonino Ferro）的点子：把一位新手分析师和一位世界级分析师之间的对话编撰起来，为那些对当代精神分析充满好奇的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老实说，开头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寻找可以请教费罗的种种问题，我手里总是拿着个笔记本。开会的时候，走在街上的时候，和同事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在琢磨这些问题。有时候，有些问题似乎是些老生常谈，都已经被我们内化于心，几乎变得像咒语一样。如何避免患者脱落？从积极地给予诠释到容纳地给予共情，这种转变有多难？然后，还有所有新手分析师都想知道的问题：中立性是什么？应该保持多大的中立性？什么时候使用躺椅？分析持续多久？如何收费？

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在安东尼诺·费罗的办公室里讨论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谈话的脉络：我们的话题从理论到技术，

从投射性认同、转换、洞察的治疗价值到分析场域中角色的选择。

安东尼诺·费罗关于分析场（analytic field）的观点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非凡的创新。他跟随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的脚步，将分析工作的重点从揭示潜意识内容（这是弗洛伊德的起点）转变为针对分析师与患者之间关系的隐喻叙事

（metaphorical narrative）。分析中的两个主体不再被视为相互关联的身份角色，而是在关系场中相互融合的两个世界，在不同的时间会生发出许许多多的场景。费罗的精神分析的主旨在于，经由创造故事，使得现有关系中的内隐方面外显出来。患者被压抑的部分、隐藏在深处的攻击性因素被鼓励浮现出来，再与分析师的直觉和叙事能力所能创造的角色相遇。

当我听着费罗讲述的时候，我觉察到一种奇怪的、令人不安的感觉。有些像我读到比昂写的《塔维斯托克研讨会》（The Tavistock Seminars）时的感觉，又有些像我看到电影《黑客帝国》里面主角尼奥在一个陌生的现实中醒来浑身通着电线时的感觉。

抛开过去，走向未来。没有地图，也没有什么手册，离开那些我们已知的事物，迎接那些未知的事物。

是的，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会是一本手册。手册应该提供安全感，然而在去听我保存的谈话录音（以便日后整理）的时候，里面当然有信心、决心，但也有无限的疑惑，慰藉则甚少。相反，那些内容让我感到眩晕。

意大利歌手乔瓦诺蒂（Jovanotti）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眩晕不是害怕坠落，而是渴望飞翔。

飞是可怕的。

自由是可怕的。

对精神分析及其学术机构进行革新，这个愿景令人生畏，特别是你面前这位讲述者远比那些“谨慎的支持者”更为强烈地想要实现这个愿景。你要冒风险，被他带到先前你并不想要去的地方。我想到我自己内心深处对那个“已经讲了一切”的、不朽的弗洛伊德的抵触；我想起他在《科学心理学大纲》一文中提出的早期心理-神经模型，

在我看来现在应该把那篇文章放进故纸堆了，虽然有些同行颇有异议；我（悄悄地）想到我从来没有把《梦的解析》一页不剩地看完过，无论那是因为我脑筋懒惰，还是说明我有一种年轻人的反传统的自恋，或者是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过时了，尽管它曾经如晴空炸雷，至关重要。但是，当今“梦”这个领域已经属于格伦·加巴德（Glen Gabbard）、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Ogden）和博林吉耶里（Borinhieri）（他有一本由斯特凡诺·博洛尼尼（Stefano Bolognini）编辑的关于梦的书，目前已经不容易找到）这些人了。

费罗，带着他的诚实，带着一点“鲁莽”，建议我们把弗洛伊德全部的著作存放在学术机构最里面那间储藏室里。也只有拥有像他那样坚实的专业背景的人，才胆敢如是说。

全部？

甚至《记忆》《重复与修通》《哀伤与抑郁》也要丢进去吗？是的，其中少数几篇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至少从当今临床实践与操作技术的角度来看，费罗质疑弗洛伊德的用处，这位“精神分析之父”最终可能会沦落成精神分析的“老爷爷”。^[1]

有那么一瞬间，我发现自己在为弗洛伊德辩护，或者在为分析中的沉默辩护——尽管我在分析会谈中讲的话比我的许多同事都要多得多，我在为分析开始和结束时的仪式辩护，这些似乎支撑着我看起来还像一个分析师，而不像某个马戏团的杂耍演员。

或许，不可避免地，新入行的人们会被那些等着他们的未知事物给吓到，他们对自身具备的能力也没什么信心，最终选择用前几代分析师的技术和已知事物把自己武装起来。

另外，当我发现有人和我一样认为精神分析亟待与时俱进，我几乎感到一种狂喜。如果这个世界每隔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要宣布一次弗洛伊德已死，就像对待保罗·麦卡特尼那样，那么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埋葬弗洛伊德，没有祭奠完以后好好地活下去，就像有时候我们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也许精神分析仍然可以被人们视作一种现代的治疗工具，而不是像某些有影响力的国际报纸所描述的那样，成了一种迷人的、带有宗教教条主义色彩的老式学科；这需要精

神分析设法克服自身的某些旧习，比如它在概念上的自我论证，在理论上的武断固守，它的早期创始人的移情，以及它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势力性，这些使得它在许多人看来并不受欢迎。

对于我们分析师来说，尤其是年轻分析师，这不仅仅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也是一个事业追求和金钱投资的问题，还有可能会一直影响到我们退休。我们谈论的是我们的未来。

费罗提出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工作方法，旨在展望精神分析的未来。

有时候，他所讲的精神分析看起来就像“黑暗原力”：诱人、似乎很容易、有力量。让人听了以后很想立马成为他最忠实的门徒，心甘情愿让自己被他诱惑；同时，听了以后也让人想要退缩，因为“理智”告诉我们：精神分析可没什么捷径可走，理想化的翅膀是蜡塑的。

至少对我来说，这场残酷的冲突的结果就是打开了一条第三种视角的、有些不舒服的辩证之路。我在想，而且会一直去想：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我看待人的方式、看待分析关系的方式是相符的，在多大程度上我可以放弃移情性诠释或者阐述性诠释，转而投身到一种令我着迷但又让我困惑的叙事游戏中去。

我认为，这本书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有些段落读起来让人感觉信服，频频点头；有些段落让人感觉错愕，看起来太过简单、太过激进或者太过热血。

当然，费罗充满了一腔热血。

费罗是在后克莱因（post-Kleinian）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那种文化以尖锐有力的，有时甚至具有侵入性的移情性诠释为特征。显然，后来的比昂及其著述让费罗经历了一种解放性的转变：从“对患者进行工作”到“与患者合作”，把患者视为我们最好的同事。费罗的场模型（field model）是基于最大限度的对称性和协作性，甚至一些读者可能会感觉那有些过分、危险、可疑。同样地，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看起来可能离得太远了。

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可以被解读然后被“遗忘”，我希望并且我认为费罗不介意分享同样的命运，让他也成为我们前进中迈出的一步，成为一座火箭发射塔，助力我们朝着人类心灵的未知领域进发。

那么，让我们登上“企业号”^[2]宇宙飞船，让我们来聊聊我们即将阅读的这本指南。

我们这本书借用了著名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的名字，原著中的主人公阿瑟·丹特在星期四的早晨醒来，此时地球外太空正有一支巨型宇宙飞船舰队，他们向地球上的居民宣布：两分钟之后，地球将被化为尘埃，为了给一条新建的超空间高速公路让路。

这还不是精神分析的灭亡，但也足够近了。

世界行将毁灭，阿瑟和他的酒友福特·普里菲特正打算干了最后几瓶啤酒。此时福特告诉阿瑟其实他是一位星际旅行者，一个搭星际便车的人，他可以帮阿瑟一个小忙，让阿瑟也到地球之外的新世界逛一逛。阿瑟只需要带上一条毛巾^[3]和一本《银河指南》。

就像埃切瓜扬^[4]的论文和彭塔力斯^[5]的词典，《卡拉狄加百科全书》包含了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点子：比如如何使用巴别鱼，如何把它插入你的耳朵，让它帮你翻译宇宙中的所有语言，或者哪些行星的“泛银河系含漱火爆饮料”的口味最棒，或者如何在穿越冰冷的贾格兰·贝塔卫星的时候给自己保暖。同样地，我们这本小指南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些贴士，帮助读者探索在工作中可能会着陆的一些世界：色情性移情、负性移情、投射性认同、关于缺席会谈收费的争执。最后：

……尽管这本《指南》有许多遗漏，而且包含了不少胡言乱语，或者至少非常不准确的说法，但是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本《指南》超越了先前那些年迈而又僵化的作者所写的东西：

首先，它价格稍微便宜一些；其次，封面上用大大的、友好的字体写着“不要害怕”。

（摘自亚当斯1979年所著小说

[1] 我指的是在2015年于波士顿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大会上，时任协会主席斯特凡诺·博洛尼尼在发表演讲时，重申了让弗洛伊德成为“祖父”的必要性。

[2] “联邦企业号”（USS Enterprise）是电视剧《星际迷航》中一艘宇宙飞船的名字。这艘飞船上的船员的使命是“探索陌生的新世界，寻找新的生命和新的文明，勇敢地前往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

[3] “关于这条毛巾，《银河系漫游指南》还有一些话要说。如指南上所写，毛巾可谓是一位星际旅行者可以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了。它非常实用。当你穿越冰冷的贾格兰·贝塔卫星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把自己裹起来，相当保暖；你可以把它铺在桑托吉尼斯5号星球布满大理石沙砾的海滩上，呼吸令人陶醉的海水蒸气；在卡克兰夫星球的荒漠中，在漫天红色的星光下，你可以把这条毛巾盖在身上，美美入睡；你可以把它撑在一艘小木筏上，就像风帆那样，你就可以顺着深沉而舒缓的慕斯河慢慢航行；你把毛巾打湿，就变成了一件跟别人打肉搏战的武器；用它把你的头裹起来，就可以驱散有毒气体，或者避开饥肠辘辘的特拉尔怪兽的注视（这种动物愚蠢得令人发指，它以为你看不见它，它就看不见你）；在紧急情况下，你可以挥舞毛巾，发求救信号。当然，如果它看起来还够干净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擦干自己”（摘自亚当斯1979年所著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第16页）。

[4] Etchegoyen，阿根廷精神分析学家，曾任IPA主席。——译者注

[5] Pontalis，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曾编撰《精神分析词典》。——译者注

第1章 身份

卢卡·尼科里：

这本书的宗旨是为那些新的，通常也是年轻的分析师提供一本自卫手册。新的分析师究竟为何需要自卫呢？

安东尼诺·费罗：

首先，我认为年轻的分析师应该保护他们“年轻”的机会。几天前，我读到一位意大利同事的故事，他在谈到一位62岁分析师的时候，坚持认为这位分析师应该尊重那些年长分析师们的观点，而不是与他们争论。可见，62岁的分析师仍然被认为是一位年轻的分析师。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年轻的分析师应当指的是那些30岁或者35岁的人。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协会成员的职业年龄应当与他们的实际年龄相一致，而现在他们通常都带着20年的“附加年龄”，以至于62岁还算是我们的年轻同仁，65岁倒成了年轻的普遍标准，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

卢卡·尼科里：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自卫的地方，但我敢打赌还有更多需要自我保护的地方……

安东尼诺·费罗：

其次，我认为他们在面对那些过于正统的观念时，要保护好自己。那些观念正在阻碍新思想的发展，而这仍然与年龄问题有关。想想看，一位年龄在60~65岁正在授课的分析师，尽管他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但他的训练毕竟始于30年之前。所以，如果他在2016年教书，他讲授的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分析：这里面总会有30年的延迟。

另外，我还认为分析师必须首先要保护自己不受精神分析当中“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的伤害。也就是说，那些现在其实已经完全没有意义的所谓公理，但是这些公理仍然被作为归属的

标志来加以崇拜，新来的分析师必须不断地重提这些公理，才能被接纳、被承认为群体的一员。比如，至少在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也许不是在美国），人们在论文开头必须要引用弗洛伊德的话，而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事情变成了信仰一般的行为，使得我们与比昂在“塔维斯托克研讨会”（The Tavistock Seminars）这篇文章中所倡导的精神相去甚远。也许在引用比昂的同时，我也在做一些正统的事情吧，看来这确实是一种顽疾。比如说，移情和反移情这一对概念是如此的重要，并且产生了那么多新的观点和概念，以至于如今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地抛下（最初的）这两个概念，仍然可以做好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新手分析师，都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已知事物的禁锢：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都不应该再继续成为我们的兴趣所在。如果我们确信有潜意识这么一种东西，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其他的名字——我希望今后它可以被新的概念所取代；如果我们真的关注它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所关注的是未知（潜意识即未知）。对于某个患者我所知道的一切，一旦我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些内容就不再是我所关心的了。我的目光、我的注意力、我的耳朵应该指向所有我还不知道的东西。对于精神分析理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把理论放在一边，而不是把它奉为神迹，投注不容辩驳的崇拜。这就像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我们能站在第七层，显然要感谢自己曾经从第一层走到第二层，从第二层走到第三层，从第三层走到第四层，等等。我们感激让我们走到第七层的那些脚步，但是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还没有走到的楼层，以及这栋建筑中未知的房间，甚至那些还没有建成的部分。

想想看，正统观念正在怎样阻碍我们的视野：“负性移情必须得到诠释！”“负性移情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诠释！”这些观点过于武断。每一天，我们应该寻找对那个特定的患者来说，在那个特定的时候最有用的是什么，这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以及我们是怎样的。

另一个我们应该保护自己免受其害的事情，是我们已知的东西带来的“光污染”，它会妨碍我们看到那些仍然未知的领域。这就像是城市里所发生的情况，城市的晚上充斥着灯光。想想我们晚上乘飞机抵达纽约时看到了巨大的光斑，我们知道正是这些光线遮挡了纽约市民仰望天空，他们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黑夜。如果我们来到一个没有过多光线的区域，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夜空。我们有太多我们过

于看重的概念了。曾有两位年轻的精神分析培训候选人恰好向我指出了一些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但还没有弄清晰的想法。其中一位叫做亚瑟·史尼兹勒，他在某篇论述精神分析的文章中写道，精神分析赋予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使得人们无法觉察到大量的其他“情结”。如果不是因为俄狄浦斯带来的“光污染”，人们是有可能注意到它们的。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俄狄浦斯，这阻挡了人们发现、认识和理解其他的情意丛。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患者的已知情况所带来的“污染”，这在临床工作中是灾难性的；同样地，概念化

（conceptualisation）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理论和模型应当被我们所了解，然后就应当很快被遗忘。

卢卡·尼科里：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想要仰望星空的话，我必须知道天空是在上面，而且如果我的眼睛近视或者散光的话，我还需要一副眼镜，否则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还需要另外一些必要条件，比如黑暗，要不然我还是看不见。如果我们希望精神分析这个学科能够延续下去，那么在哪些条件之下，精神分析才能继续称之为精神分析呢？我们不应该遗忘的是什么呢？

安东尼诺·费罗：

首先，我们抬头可以看到上面的天空，但其实下面也有天空。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到了南半球的时候，我被震惊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夜空：我在寻找北极星，但是我看到的却是南十字星。然后，如果我们想象在地球上钻一个洞（谢天谢地，在精神分析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事情），通过这个洞可以看到地球的另一边，那么天空就在下面了。放下这个奇怪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所采取的视角。

我无法预测精神分析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在目前和若干年以内，我认为做精神分析，还是需要有两个人和一套设置。我想最低限度的要素包括：一位分析师、一位患者和一套设置。我认为，可以这样来定义分析师：当需要他陪伴的那个人愿意坐在患者这个位置上，并且有一套值得维系下去的设置的时候，他就可以是分析师了。在这种安排之外，分析师的角色是不存在的，我并不是全天24小时都在做“分析师”。我认为，只有当患者在场，并且在设置之内的时候，分析师才能够获得分析师的身份。在这个范围之外，当我们做其他事情

的时候，我们也只不过是受过教育的人，对生活有一定看法的人。我们或许也可以（在生活中）使用分析工具，认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部电影、一本书。但是在我看来，拥有人类学或社会学知识的人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材料。我个人的观点是，当我们尝试应用精神分析（处理分析之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变得滑稽可笑。我认为，我们不可笑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时候：只有我们、我们的患者，还有我们的设置。这个时候，我们变成了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一个能够应对心理痛苦的人，能够照料这些痛苦、治愈这些痛苦，并且能够消化这些痛苦。我们的专业领域是那些饱受精神痛苦折磨的心灵，我们可以为那个地方带去纾解、带去帮助，我们可以将治愈的历程变得更快一些。当然，治愈总是相对的、艰难的，但这是我们的领域、我们的专长。

卢卡·尼科里：

所以，我们都属于那群精神分析师，都认为精神分析最重要的是治疗心理痛苦，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治愈提供者，精神分析师一直探索治疗的要素是什么。如今还有许多其他的心理治疗工具：认知行为主义、建构主义、系统疗法。我认为，对于新手分析师和终身都在求索这门学问的老手分析师来说，了解精神分析作为治疗工具的独特功能所在，都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师能给那些求助于他的人们什么样的特殊帮助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会说：潜意识、潜意识、潜意识。

如果我们没有考虑潜意识这个维度，那就不是精神分析了。或许我们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理解潜意识的，也就是弗洛伊德的版本，认为它是已经结构化的、已然存在的，等待我们去解读的，这是对潜意识最初、最天真的思考；或许我们认为潜意识是一种不断在形成、在转化的结构，是在发展的，所以我们和患者一起成为功能性潜意识（functioning unconscious）的生产者；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像是沒有指南针的向导，和我们的患者一起成为潜意识的创造者。

此外，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当今我们完成上述任务所要使用的工具，我说“当今”是因为我希望在20年、50年、100年以后，我们所做的事情会有所不同。当今的工具都是和梦幻（dreamlike）有关的，包

括：在我们的感官清醒的时候，意象的变化；白日梦的内容和过程；我们能够“梦到”（dream）患者在表达什么，以及我们解构这些表达的能力和从中获得意义的能力；我们与病人一起构建不同的世界，在此之前，这些世界既不可思考，甚至也不存在。这套工具帮助我们将心理困境转化为可以思考的想法、可以栖息的情感，并且让我们可以“梦到”那些已经转变为症状的、未经阐述的材料，使它们变得可以被思考、可以被容忍，变得具有意义。分析师可以转化那些无法被消化的故事，把从患者心中生发出的新的、可持续的意义编织起来。他是感官经验的共同叙述者，把精心制作的产品带回到梦境和潜意识的领域。他是潜意识的共同创造者。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在分析师被要求扮演的所有角色中，他首先是一个“魔术师”，他使用了声音、图像和文字的魔力。分析师改变了（患者的）内在现实，他骑着龙，驱除了恶魔：他为想象、创造、荒诞和未经思考的事物开辟了一个空间。

托尔斯泰讲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和一个小伙伴一起用椅子搭了一列火车，两个人在这个虚拟的游戏中玩得很开心，直到他的哥哥走进来用一句话击碎了这场梦幻：“这游戏真弱智！不过是一堆椅子！”

这和分析师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虽然只有一堆椅子，但我们需要看到那列火车、那座城堡；我们应该给那些还不存在的故事和人物赋予生命。我们一直是共同的叙述者，而不是孤立的作者，我们应该始终意识到，我们共同创造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新的东西所取代。在分析中，不断打开又闭合的只有我们和患者才能了解的万千世界，患者也是这些世界的共同叙述者。

卢卡·尼科里：

你可能不知道，有关魔法和龙的故事是我在做精神分析之前非常着迷的东西，所以你让我想到了下一个问题。分析在何时以及如何变成魔法呢？

安东尼诺·费罗：

假设有人打电话报火警，如果消防队员跟他说，他看到的火焰其实是他失控的情绪，这就太荒谬了。同样地，假如一个朋友跟我说他

身上的一些痣似乎在长大，显然我会建议他去看一下皮肤科医生。如果有来做分析的患者跟我说，他来找我是因为他身上的痣在变大，那么我会如何思考呢？或许，我会想象有一条白色的毯子，上面有洞。这条白色的毯子又会让我想到一只羊，它身上的羊毛中间有一些缝隙，透过这些缝隙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黑色的：这只羊开始看起来像一只豹子了。如果这个患者不停地在讲他如何担心这些痣在变大，那么或许我会想象这条毯子上的洞变得越来越大，正在暴露出里面的东西：也许里面有一只黑豹。

所以，从关于皮肤痣的故事开始，患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绵羊、豹子和黑豹的故事！

因此，在咨询室里，我们需要有一个足够大的躺椅，可以容纳下这三个角色：绵羊、豹子和黑豹，这些角色还会不停地来回切换。虽然没有龙，但我认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魔法的。

当然，皮肤痣和丛林故事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每对分析关系都会创造出独特的、出乎意料的叙事，而且至关重要，正在展开的对话可以为我们提供了解患者以及我们自身的未知领域与潜意识特征的途径。

虽然消防队员的倾听需要现实一些，但是咨询室里的分析性倾听需要这么一个转化性的过程，需要这样的“魔法”过滤器，即在分析会谈过程中分析师的玩耍能力和做梦能力。

卢卡·尼科里：

谈到分析师的身份，有许多同事，当他们需要推荐其他同事的时候，除了提到姓名，一般还会提到性别，而不是其他方面。看来我们和作为诠释功能的分析师这个概念还相去甚远。在你看来，与其他方面相比，分析师的性别会如何影响分析中被激发的故事呢？

安东尼诺·费罗：

在分析开始前，影响很大。在分析开始后，没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两秒钟我就想到了答案，我很欣慰。

我的意思是，分析开始之前，关于男人或女人的想象、思绪会被激发起来。一旦真正开始分析，性别就不再激发起什么了。重要的是他或她是怎样的人，以及要做分析的这个人的类型、他的心理健康水平和这位患者的心理机能状况。

卢卡·尼科里：

让我们先从我每个人立即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在我们谈论理论和其他事情之前，我想先处理一下这个紧迫的问题。避免患者脱落的秘诀是什么呢？

安东尼诺·费罗：

当我声称自己不是那么正统的时候，我有些开心，但是如果比昂所构想的某些观点可以激发我的兴趣并给出完整的答案，那么我认为没有理由不使用它们。在一次研讨会上，比昂说：每一次分析会谈，我们都应该给患者一个下次再来的理由。换句话说，患者可以玩，感觉开心，享受分析。这就像《天方夜谭》里面的舍赫拉查德^[1]，她总是能讲出新的故事，总是能推陈出新，就像一场新的游戏。这应该是一场游戏，有时候伤心，有时候快乐，有时候好笑，有时候悲惨。我把分析比作“游戏”并不是忽视它带来的情感影响：游戏可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患者应当总是可以从我们这里获得一个第二天再来的理由，这便是如何不失去患者的办法。这意味着要激发他的好奇，激发那种好奇带来的喜悦。

我们必须确保分析就像《星际迷航》一样迷人，在这部电视剧里，主角们每次都会在意想不到的未知世界登陆，满心好奇地去探索新世界。想一想分析一直在扩展我们探索的世界：它可以持续扩展下去，只要我们不再紧紧抓住那些已知的东西。如果我们固守已知的事物，我们会发现自己就像一个阉割焦虑的例子，我们会发现俄狄浦斯，我们会嫉妒。我们知道这些。这是一个我们已经玩过的游戏，能看到的我们都看到了。这就像是玩轮盘赌，而你已经知道了会出现什么数字。

[1] 舍赫拉查德是《天方夜谭》中的主角，她是一位美丽而聪明的姑娘。故事中的波斯国王为了报复背叛他的人，决定每天晚上和一个奴隶同寝，然后在黎明时将她杀死。舍赫拉查德决心终结这种可怕的仪式。每天晚上，她都会给国王讲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在太阳升起之

前让这个故事留下悬念。出于对接下来的故事的好奇，国王总是把处决推迟到第二天。但是这位姑娘非常聪明，一旦讲完一个故事，她就立刻开始讲下一个故事，用她的故事迷住了国王。

第2章 游戏规则

卢卡·尼科里：

现在我们在谈游戏这个话题，当你开始玩游戏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些规则，如果没有规则，游戏就不是游戏了。所以，我们从确定构成我们设置的规则开始。英国人曾经一周做五次分析。在欧洲，人们通常是乘坐有四个轮子^[1]的“汽车”去旅行。在法国，他们有三轮车……

安东尼诺·费罗：

……或者是跨斗车。

卢卡·尼科里：

或者是跨斗车。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新手分析师和许多治疗师驾驶的是一辆小型摩托车；当事情变得糟糕的时候，就变成了一辆单脚滑板车。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说每周少于三次的分析就不算是分析，因为在低频度的关系中自由联想这个方法会失去意义。另外，你在谈及分析师的工具的时候，提到了对实际语言的解构；在一个低频分析中（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这种转变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现实正在大声地敲门。

安东尼诺·费罗：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发现你用的比喻非常贴切；对于我来说，跨斗车是没有问题的；小型摩托车或自行车也可以用。如果可能的话，我会避免使用单脚滑板车，因为它让我觉得我们是在用一个马戏团的道具。

卢卡·尼科里：

独轮车？

安东尼诺·费罗：

独轮车。当然，在自行车或独轮车上面，保持平衡要困难得多。我不会让我的祖母坐在一把只有一条腿的椅子上，她可能会摔骨折。一把只有两条腿的椅子也会让我不安。所以，如果有三条腿，这把椅子就开始能够保持稳定。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越多越好。

我们需要考虑这个设置是不是绝对的、强制性的。我认为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勉强接受的。水在 100°C 会沸腾。我们可以玩一些把戏来推翻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去安第斯山脉或者其他地方，通过这个把戏就能让水还不到 100°C 的时候就沸腾，但是即便如此，你并不能推翻物理学。水在一定温度下会沸腾，这是个物理定律，我猜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核裂变：你需要一定的临界质量来引发连锁反应。我相信在分析中，也需要有一定的频率才能触发连锁反应。我想，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个准确的频率是多少。就我的经验而言，我总是觉得，如果每周能有三四次分析的话，某些作用就会开始出现，会变得更加生动，使得我们可以逐渐放下现实的某些方面。为了能够成为分析师，我们必须放下这些方面。

如果每周只有两次甚至一次会谈的话，你能做精神分析取向的工作吗？当然可以，但我会称之为：精神分析取向的工作。即使每隔15天或一周做一次治疗，患者所承受的心理痛苦也能得到缓解。这是一项有道理的工作。然而，这并不是分析工作，难以帮助患者得到真正的发展，患者也难以充分获得之前不具备的能力。如果我们讨论的是那种具有深远变革意义的事情的话，我会说，粒子加速器必须设定为每周三到四次的频率。在这里，我会说，如果不那么严苛要求的话，一周两次会谈也可以，星期一次、星期五一次，这也没有太大问题。我不知道100年后我们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今天很不幸，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的频率。即使一周一到两次治疗，你也可以做很棒的工作，帮助到那些受苦的人们。是的，这样当然也是可以的。然而，我们必须勉强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没有高频率的分析，我们就不能把一座房子里的设备、管道什么的进行全面翻修。

曾经有一个区分方法，我仍然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这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太过时了，但是我发现用它来区分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还是挺有用的。老实说，这比频率的意义更大。如果你问我是愿意和一个能力不足的分析师做每周五次的分析，还是愿意和梅尔泽^[2]做每周两次的分析，毫无疑问，我更愿意和梅尔泽做每周两次的分析，而且我会称之为“分析”。如果你问我是愿意和奥格登做每周一次的治疗，还

是愿意和一位奉行原教旨主义的同事做每周五次的治疗，你认为我会作何选择呢？

现在我们讲得有些极端了。如果我们谈的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分析师的话，频率是很重要的。频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续性的一部分，这种连续性越确定越好，这属于设置。所以，我们有频率、会谈时长、分析时长，还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即节奏。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原始内核（archaic nuclei）的时候，也就是面对那个自闭的内核

（autistic nuclei）的时候。单单依靠语言，我们无法接近那个最原始的内核，布雷格（Bleger）称之为凝集性核心（agglutinated nucleus）。依托于节奏，再加上投射性认同等前语言的成分，治疗才能成功。

卢卡·尼科里：

你提到了相对的稳定性和节奏，说到这个，我有一个秘密要坦白。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像你这样的老师住在精神分析大厦的顶层，但是在地下室，那些年轻的兼职分析师们，他们每天或每周可能见两个患者。在那里，如果患者出现欠费的情况，地下室往往会充斥争吵，甚至情况会更糟，患者突然一去不返。所以请下到地下室，给我们讲讲你的意见！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这很简单，因为它属于“设置”这一环节。在“设置”这一环节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少被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给我们自己订立的协约。这也适用于打扑克牌，当你说：“这是我们在這間棋牌室玩牌的规则，愿意和我在这间屋子里按照这个规则玩牌吗？”对方可以自由地接受，也可以拒绝。同样地，当我遇到一个患者，我会和他分享我们的协约，一旦签署，协约就会适用于我们两个人。这不是我为患者制定的协约：因为我也 是协约的管辖对象。因此，如果我们在分析一开始就确立我们的规则，这些规则就不容忽视。如果我容许患者不支付他爽约的分析费，那我怎么支付我的房贷呢？我怎样才能如我所承诺的那样，支付我的房贷、车贷，还有我的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呢？那么，我会要求病人支付那些爽约的分析费吗？我当然会，因为我需要这些钱活下去，不存在什么惩罚性的原因，也没有“你必须付费！”这样教育性的说法。

如果患者过于频繁地爽约会谈，这意味着要么他是愚蠢的，要么分析是愚蠢的。如果一个分析师所做的分析足够生动的话，患者会提前10分钟到达，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开始会谈。分析是美好的，似乎没多少人理解这一点。我们一直在谈论痛苦、折磨，分析师的痛苦、患者的痛苦。这种苦难的仪式是如此的单调乏味，至少我们应该有能力享受乐趣才对。如果一个人经历了悲剧性的事件，显然在那个时候他不会有什么可笑的理由，比如说，也许他的祖母去世了。我的意思是，尽管祖母去世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事实或许可以变成布里克森^[3]所写的一个悲伤的故事。当我们可以把那些残酷的现实转变成一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我们就达到了加达^[4]在《了解悲伤》

(Acquainted with Grief)^[5]中所讲的那种状态，但这仍然比感觉自己的脑袋被锤打要好。因此，分析的乐趣就是：能够将迷失方向、无组织、支离破碎的精神状态变成一个故事，我真诚地希望这个过程是有趣的、新奇的。当然，偶尔我们会遇到加达那样的悲惨遭遇，然后我们也会讲述如加达那样的故事。但是我要重申，分析的乐趣和你在游戏室里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和阅读《天方夜谭》的体验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也是享受乐趣。我对疼痛过敏，是因为我把重点放在疼痛上。一定程度的疼痛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忍受它；如果我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我必须接受针头注射，尽管那很疼，但这不是世界末日。如果我意识到抗生素开始起作用了，那么明天我就会主动过去再来一针。

卢卡·尼科里：

从弗洛伊德到现在，分析的时长增长了许多，从几个月到几年，有人说这太长了。

分析是否应该缩短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分析应该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我不认为有什么分析时长的客观标准；我意识到我正在绕道而行，但我会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给出回答。曾经有过一些著名的分析时长的标准，就像所有事情看起来都有标准那样，例如，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可分析性（analysability）标准，那里有一条标志清晰的小路，上面有许多路标。

我真的不认为在当今有什么分析时长的标准；不过，我毫不怀疑，在某些时刻，分析当中会出现一些信号，告诉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而这些信号的出现通常是出乎意料的。因此，我认为当这些信号出现以后，又经过一定的时间，就可以结束分析。在以前的某些场合，我讲到过这些信号可能会是什么，但是现在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信号通常可以说明患者已经拥有一套足够好的思维工具，可以继续他的生活。

卢卡·尼科里：

不过，关于治疗时长这个问题在今天比过去更加棘手。当今的患者，部分是由于社会经济原因，部分是由于内心阻抗，他们不愿意接受一段长期的依赖关系。斯特凡诺·博洛尼尼（Stefano Bolognini）认为，现在的孩子很难拥有持续的、可靠的长期照顾。家庭解体又重组，父母、祖父母、保姆、体育教练、老师轮流扮演照顾者。结果往往是孩子很难有足够的信任把自己托付给另一个人。

那么，当我们建议患者接受这项每周数小时、经年累月的分析工作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处理他们对于依赖关系的不信任呢？

安东尼诺·费罗：

首先，我深信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事情是瞬息万变的：“精神分析要永远做下去”“人们必须要做分析”，这些并非理所当然。我认为分析应该由那些想做分析的人来参加，那些人应该在体验过分析之后第二天或者下一周感觉更好了。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分析应该是一种长期聚会，就像每个周一、周三和周五，朋友们约在一起玩纸牌游戏那样。分析应当是美好的，分析应当是有趣的，分析应当看起来像玩游戏那样。分析应当是你喜欢的东西，所以你愿意投入精力、时间和金钱，就像你去观看体育比赛那样。因为你对足球不感兴趣，所以你不想去观看国际米兰和AC米兰之间的比赛，那该怎么办呢？你当然可以不去，这应该是一种乐趣，而不是强制性的。

或许你发现，如果你患有恐惧症、抑郁症、惊恐障碍或者其他任何疾病，你可以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来处理紧急发作或者严重发作，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地摆脱它，那么不幸的是，目前为止唯一可知的方法是精神分析。我们的精神分析遭受着一种奇怪的命运，因为有时候

它似乎可以治愈一切，有时候似乎所有心理疾患都与它无关，它什么都治疗不了。你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6]

卢卡·尼科里：

你提到去看比赛：你不知道现在体育场的门票有多贵吧？那么让我们来谈谈钱吧，这是自清教徒时代以来取代了“性”的禁忌之一。一些年轻的治疗师对于获得报酬感到相当尴尬。当然，承认自己工作的价值确实有些困难，但在我看来，在新手分析师中间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即分析应当是每个人的权利，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困难时期，这个观点似乎更加明显。

在阿根廷，有人说，即使是在机场接你的出租车司机也做过分析。我说的是分析师的一种社会责任。然后就是危机，还有一个事实是，有些患者真的很难维持生计。因此，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下金钱、（患者和分析师的）内心幻想与外在现实之间的关系。

安东尼诺·费罗：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首先，我认为，“分析师要收费是因为钱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类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很有钱，我想我不会收分析费，因为我享受分析，我喜欢分析，我在治愈自己。我从中获得了很多好处，我真的需要分析！想一想，分析师比患者更依赖分析。患者每周有三四次治疗，就感到很满意了。但分析师每周可能需要32个分析，所以他上瘾更严重，矛盾的是，他比其他人更需要分析。所以，老实说，如果我很富有，我想我不会要求受分析者支付象征性的美元，我不需要这样象征性的补偿。当患者来的时候，他会给我温暖的微笑、握手、感激。

那么，为什么我要求支付报酬呢？我会说，我要求付费、普通分析师要求付费，是因为为了成为分析师我们所放弃的工作。如果我在做分析师的时候没有拿到报酬，那么为了养活自己，我必须做一名神经科医生，这是我以前做的工作，至少一天有几个小时是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我要求为了放弃神经科医生的工作而获得报酬。也就是说，患者并不是为分析中发生的事情而付钱，他付钱给我是为了让我能够养活自己，能够付钱给杂货店老板和肉食店老板。没有自己的钱，没有股票证券，没有私人公司，我不得不想办法赚钱给肉食店老板或者

面包店老板。因此，我不得不向患者收钱，因为分析是一种我们不能免费提供的奢侈品。

卢卡·尼科里：

既然你喜欢《星际迷航》，那就让我们登上一艘宇宙飞船，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那里有费罗博士的另一个我，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谢天谢地，在那个世界，我不是你的患者，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给你什么样的微笑和握手，才能报答你提供给我的分析。是不是这样呢？

安东尼诺·费罗：

有人甚至可能会揭露这样一个秘密，那就是有时候患者也能治愈分析师。我并不是说患者和分析师要做双向分析，但是我毫不怀疑，从心理角度来看，分析师能够从他所提供的经年累月的分析当中获益。

卢卡·尼科里：

我真的想从你这里挖出这个秘密，那么：提供分析对分析师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安东尼诺·费罗：

嗯，这就好比是在问：在一个充满细菌的世界里，抗生素对医生自己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相信进行长时间的分析有利于保养我们这套思维工具，使它们保持最佳状态，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这套工具是有可能出现故障的。

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分析师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充满活力呢？我要说的是，每天有那么几个小时，他不再是分析师，而是在做另外一些事情，在过他的生活。想想一个一辈子都住在办公室的分析师吧。

分析师必须要去生活，必须是一个有个人生活的人；如果除了做分析，他还有第二份工作，那就太棒了，但是通常没有那么多时间。如果我的分析师还开着一家活鱼店，或者一家肉铺，或者他同时还是

一位皮肤科医生，或者古生物学家，我会非常开心。理想的分析师应当还做着另外一些营生，就像某些老一辈的分析家那样。

除此之外，能有几个小时什么都不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让你的头脑放空一下，“什么也不做”其实是一门艺术。

然后我们回到治疗时间，因为我们对每个患者（开始的时候）知之甚少，所以对某个人做分析也是一种自我分析。

最后，我认为分析师应该培养他自己喜欢的事物：读书、看电影，或者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也包括去生活，处理日常琐事，和女朋友争吵，平息争吵，去电影院，去生活。

卢卡·尼科里：

能不能说，分析师最常见的疾病是抑郁症，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被他们的患者所治愈？

安东尼诺·费罗：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的确如此，有些分析师如果没有患者就会感觉不舒服，他们真的对患者有瘾，他们因为有患者才能自我感觉良好。我认为一个分析师应该有一个足够健康的生活，他会说：“如果我买彩票能中三百万大奖就好啦，那样我就不用再工作啦。”不，不，不，我不喜欢一个必须依赖患者的分析师，他需要和生病的人在一起才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其次，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通人，分析师应该拥有足够满意的生活。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最好也有足够好的性满足，否则麻烦就会发生。你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足够满意，你应该喜欢去度假。如果某个患者取消了会谈，分析师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能做些别的事情了，比如去买个冰淇淋或者买本书。如果没有患者，他也不应该为此感到难过，这并不是不可接受的。

卢卡·尼科里：

你说分析就像是一种对分析师也有益的抗生素：那么就像每一种药物一样，它也有副作用，对吗？主要的副作用是什么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她的丈夫当时的血液铁含量很低，我想她是想告诉我，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拜访她丈夫了，所以她丈夫的“铁含量”^[7]变低了。副作用的风险在于我们总是固守分析模式：如果一个朋友和我们一起吃饭，告诉我们说昨天他吃饭的那家餐厅非常糟糕，也许我们会认为他其实是在抱怨我们做的意大利调味饭。我认为主要的副作用在于过度解释，有时候分析师会认为自己能够解释世界、现实和未来，而他能解释的其实只有精神分析治疗当中发生的事情。

当我还是候选人的时候，我曾经目睹了两个不同理论取向的训练分析师之间的争论，他们一起看着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8]的一幅画，画的是一匹马的白色大腿。其中一位分析师认为那丰满的臀肌指的肯定就是乳房，那么白、那么圆，指的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另一位分析师不以为然，他说：“不对，你看，肌肉那么强壮，指的只能是阴茎！”我听着他们争论，感到非常困惑。我不喜欢“应用精神分析”（applied psychoanalysis）这个说法；我认为精神分析只能应用于患者，最多还能应用于我们自己或者分析伙伴。我不认为精神分析可以应用于精神分析治疗之外的任何事情。除此之外，让我们开心一些，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想把它应用到三角几何或者艺术品的解释上，这也不算铸成什么大错，但是有个关于蒙娜丽莎笑容的笑话非常有名：这位女士可能是因为知道自己怀孕了所以微笑，也可能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怀孕而微笑。

我的意思是，精神分析有一个特定的领域：治疗心理痛苦。手术刀的目的是切开患者的腹部，但是我们能用手术刀切开一张纸吗？当然可以！尽管它不是用来做这个的，但是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这么做。不过要记住，在街上用同样的手术刀任意划开行人的肚皮，那可是犯罪！

卢卡·尼科里：

谈到钱我就不得不谈一下交税了。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分析师也在竭力负担他们的税赋。我曾在三个公开场合谈到这个话题：第一次谈到的时候，同事们起立向我致敬；第二次，我被告知这个话题不适合被讨论；第三次，也是最有趣的一

次，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同事回答说，所有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超我来交税，交多少能让超我满意，那就交多少。你愿意讲一下你的看法吗，还是我们切换到下一个问题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要看他所归属的那个社会的现实状况。我希望在我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来纳税的，无论他们是分析师，还是理发师或者屠夫。我认为分析师的义务既不比理发师少，也不比理发师多。如果理发师不纳税，你不能说他的义务与足科医生不同，即便前者是照顾头部，而后者是照顾脚部。

分析师的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比如画家，所以我认为分析师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缴税。如果有人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种处境：如果缴纳所有的税款会让他挨饿，他的常识就会告诉他，要留下20%，好让自己活下去；但如果他有能力把所有的税都缴清，那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特殊的规定，即分析师是按照某种象征性的、特殊的、不同的含义来纳税的，分析师并不是一个特殊纳税类别。你缴税是因为有执法机构，有税务局，你作为一个意大利公民或者捷克公民就应当这样做，应当为社会运行做出贡献。

我非常希望能像芬兰人那样纳税，在那里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纳税，而且在芬兰，只要你需要，你就可以享受做免费的分析，而且可以做几年时间。有一次，我被五六个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同事邀请去吃饭，我给他们每个人都签了一份单子，因为他们要把我的晚餐费用平均分摊，而有我签名的单子可以证明我的消费是由每个人来支付的。

在我看来，分析师这个群体不应得到特殊保护，也不应该被中伤。在谈论纳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不想把超我扯进来。你之所以纳税，是因为你必须纳税。

[1] 意指每周四次分析，下同。——译者注

[2] Donald Meltzer，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译者注

[3] 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是20世纪丹麦著名作家，著有几部短篇和长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

[4] Carlo Emilio Gadda, 意大利作家, 一生经历坎坷。——译者注

[5] 英译者注: 作者加达 (Carlo Emilio Gadda) 没有完成的这本《了解悲伤》, 是一部影射现实的小说, 描写了加达的生活经历和他居住的地方, 但故事被设定在一个虚构的国家, 里面还有许多虚构的人物。

[6] 指的是2012年1月26日, 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发布了关于自闭症儿童的治疗指南, 该指南提倡采取康复干预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而非心理治疗。由此, 在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几个国家, 引发了一场关于精神分析与自闭症之间关系的激烈争论。

[7] 英译者注: “费罗” (Ferro) 这个姓氏有“铁”的含义。

[8] 保罗·乌切洛是一位15世纪的意大利画家。

第3章 开始

卢卡·尼科里：

现在，让我们告别会计师，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和我们的患者见第一次面。初始访谈。在培训开始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初始访谈算是治疗工作中最简单的部分了。在意大利，非心理治疗专业的心理学家都有资格做初始访谈，在公共医疗领域，通常是实习生和进修生来做第一次访谈。我看到的有关初始阶段的精神分析文献，也说这个阶段应该足够的短，应该在移情神经症出现之前就完成。

安东尼诺·费罗：

我们还相信移情神经症吗？

卢卡·尼科里：

Relata refero! ^[1]我根据我的经验谈一下。我本来也以为那是最简单的部分，暴风骤雨的环节在后面才会出现。但是在脱落了许多患者以后，我切身体会到第一次访谈其实是关键所在。我认为，特别是通过和青少年做分析，让我们抛弃了这样一个想法：两三次访谈就可以搞定初始阶段。我们可能要花许多时间才能把设置搭建起来。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初始访谈呢？也就是分析框架搭建完成之前的那个阶段。

安东尼诺·费罗：

我觉得这就像是第一次浪漫邂逅，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像有些人会一见钟情，有些人第一次见面就能进入分析状态，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花了两年时间才能躺在分析躺椅上。我不认为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当然，第一次访谈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能避免用不停地提问去污染它，避免询问童年经历，避免问一些我们并不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搭建起一个足够好的框架，基于这个框架患者就可以讲述他想讲的事情，特别是开始尝试去讲那些他不想讲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卢卡·尼科里：

那病史怎么办呢？

安东尼诺·费罗：

病史与精神分析无关，因为整个分析的基础是我们和患者共同建立的。认为病史不可或缺，这个想法是愚蠢的。你可以采集病史，它和精神分析无关，但是它和精神医学有关，从事精神医学服务的人士对此是感兴趣的，他需要书写病史，因为如果警察来了，有个家伙试图杀死他妹妹，那么这件事要在病史中有所反映。然而，如果你是一个分析师，在你的办公室里，你需要病史来做什么呢？（收集）病史会抑制患者，会阻碍那些让他不舒服的东西浮现出来。奥格登睿智地指出，我们必须能够和患者一起做梦，把那些变成症状而没有变成梦境的东西，给构建出来。我们是否必需读弗洛伊德的书才能明白这一点呢？也许在总结出如此简洁的箴言之前，可怜的奥格登不得不通读弗洛伊德，或者奥格登的分析师不得不翻遍弗洛伊德的著作，而奥格登可能通读的是温尼科特。然而，在奥格登告诉我们这一点以后，我们是否需要从鼠人（Rat Man）的案例开始，还是从奥格登告诉我们的情况开始，然后继续前进呢？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思路，那些没有足够好地转化成梦的东西变成了患者的症状，我们应当把它们继续转化成梦。

卢卡·尼科里：

所以，分析是一个致力于做梦的地方，躺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介于清醒与睡眠、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地方。说起这个，让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我的一个患者，他是心理治疗学校的学生，他告诉他的老师，他选择了一个精神分析师来完成必修的个人体验课程，这个分析师给他做的是躺椅分析。他的老师惊讶不已，说：“那简直老掉牙啦！”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反问：躺椅真的已经落伍了吗？不过第二个问题，也许就不是反问句了，特别是考虑到那些经常使用“独轮车”的同事们。在我接受训练的时候，他们说每周一到两次使用躺椅进行治疗可能是危险的，因为患者往往会退行，而如何容纳他们，则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你觉得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会说：让我们试试看！

如果我要给我的晚辈分析师一个建议，我会告诉他们分析并不取决于一个人躺在哪里，分析取决于两个人在心理上一起工作的方式。所以，躺在躺椅上并不等于在做分析，同样地，不在躺椅上也不会削弱分析状态。我曾经有一些患者是以很奇怪的方式在做分析：我之前提到一个患者，她拒绝躺在躺椅上，但是我们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analysis。我们每周见四次，坐着面对面交谈，因为她非常害怕不能控制局面、我的反应以及我可能会有的情绪。过了一段时间，我跟她说：

“是这样的，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方式，彼此盯着对方50分钟，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把身体转过去，背对着你做分析了。”我的办公椅是一把转椅，所以我就转了过去。就这样，每次这个患者走进我的办公室，她一坐下来，我就转过去，背对着她才让我感觉有些放松，以这种方式，我们又做了6个月的分析。后来，这位患者开始谈论她的生活应该有所变化，她想搬到一个更舒适的房子，现在似乎是个好时机。很明显，患者是在说我们的分析应当有所变化了。我们商量好的“搬家”日期到来的时候，我当然希望患者可以“搬到”躺椅上，这样我就可以回到（躺椅背后）我的扶手椅上去了。但是，这位患者走进来以后，径直坐到了我的扶手椅上。在那一刻，我可以做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举动，给出7000种以上的诠释；但是，我二话没说，直接躺在了躺椅上，所以我就那样躺着，患者坐在我背后，我们又做了6个月的分析。我反复忠告她说：“你不知道你错过了多么好的东西，躺在躺椅上实在是舒服得很。”6个月后，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的秘书肆意占据她的位置。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谈到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调换。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扶手椅上，患者躺在了躺椅上。这个变化至少花了3年时间，但是从各个方面来说这都是精神分析，一个非常正常的分析。所以，重要的是分析师知道怎么玩。

出于这个原因，我想提出我的一个观点，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同意——对成年人、儿童和青少年做分析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我们可以学着从儿童身上看到我们内心以及父母内心的婴儿方面。从成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结构化的方面。当然，儿童分析师更少担心患者破坏设置，因为他不会把那些行为看成是一种攻击，而是当成一种交流方式，最重要的是当成一种游戏来看待。我们可以一起玩任何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不能玩的，所以只要玩下去就可以。

分析师需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以及这意味着什么。显然，分析师应该具有思考和探寻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头脑，并且尝试给出一个能够被表达或难以被表达的意义；能够意识到什么、能够使用什么，这取决于非常多的变量。

卢卡·尼科里：

似乎弗洛伊德选择坐在患者的躺椅后面，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一整天和患者凝视。所以，也许对于分析师来说，躺椅也让他感到自在，是这样吗？^[2]

安东尼诺·费罗：

我相信如此，我认为让患者躺在躺椅上是最好的分析方式，对分析师来说也是最方便的！实际上，弗洛伊德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无法忍受患者整天看着他。正是因为有了躺椅，就可以避免面对面互动了，患者就可以随着他的思绪游走，所以念头和幻想就可以流动起来。分析师也是如此，他可以把现实放到一边，更容易地进入到一个幻想、联想、思绪和叙述的世界，免受来自现实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不认为在分析中使用躺椅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分析可以在许多不同的位置上进行。当然，我们应当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患者愿意选择这个位置而不是那个位置。比如，对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来说，躺在躺椅上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维可能会严重地偏离现实，进入一种遭受迫害的状态。我记得有个患者曾经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头狮子在他身后，随时准备扑向他。

还有一个患者，在纠结了很久之后终于同意躺到躺椅上，然后她梦见自己躺在一个用锋利的刀片做成的摇篮里，这个摇篮割伤了她，让她流了血。所以，我不认为躺在躺椅上开始一段星际迷航般的旅程去向未知的宇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容易的。有些患者需要在躺椅上开始他们的旅程，但还不能登上企业号飞船。在探索了他所生活的城市周边之后，他才能安心地探索其他城市，或者去往其他的星球、星系。

所以说，我们很容易遇到不愿意躺在躺椅上的患者，我们仍然有可能在各种情况下与他们面对面地进行工作。

卢卡·尼科里：

分析会谈似乎有一个特定的惯例：一般来说，患者有权开始会谈，然后按照露西安娜·纳西姆（Luciana Nissim）的说法，“会谈最后几句话”的荣幸也是属于患者的。是不是这样呢？

安东尼诺·费罗：

嗯，基本上我是同意的，通常我会让患者首先讲话，除非他沉默超过了5分钟时间。等5分钟并不是因为什么设置或者理论，5分钟没有什么神奇性，并不是说5分钟以后病人会开始感到孤独。不是这些原因，只是因为我会开始觉得无聊，也就是说，为了能开始运行、开始玩，为了工作和做梦，在等了这么一小会儿之后，我会发起一些话题。

卢卡·尼科里：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潜在的观点，就是在5分钟之后，分析式伙伴关系可能会出现断裂。

安东尼诺·费罗：

是的。

卢卡·尼科里：

因为分析伙伴需要行使分析功能，所以分析师费罗需要有交流。

安东尼诺·费罗：

在一个温暖的日子，我可以和女朋友躺在床上，但是，在床上躺了10分钟以后，我就会想和她有些交流！但是如果她睡着了，那我就让她继续睡觉。

在我看来，要有一种交流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必须交流，才能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一般来说，我会等待患者开始治疗谈话，或许等待5分钟、4分钟，也许应该更短一点，等待3分钟，我就会说“怎么样呢？”“今天过得如何？”或者“为什么这么安静呢？”等一些琐碎的话。

我不知道每次会谈最后一句话是不是应该要由患者或者分析师来说，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我通常会对患者说：“下次见。”对，我会让他说完最后几句话。

卢卡·尼科里：

我的意思是，在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做出诠释或给出评论，可能是不合适的。

安东尼诺·费罗：

对，对，我不会在患者快要离开的时候把他搞得晕头转向，这样做确实不合适。我总是会留出一点时间，看看患者是如何反应的。在我进入到患者的心理领域以后发生了什么，我是比较重视这一点的。

卢卡·尼科里：

我们在讨论内部和外部的框架，所以我想问你一个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在我接受训练的时候，有一条规则：分析师要有一台座机和一台答录机。但是，像我这样的“流动人口”基本不会考虑这些东西，而且发短信已经取代了语音电话，部分是因为发短信比打电话显得不那么有侵入性。另外，相当多的患者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治疗师，甚至首选电子邮件来发起求助：“尊敬的医生，我有焦虑症。我们能见面谈一下吗？”

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一下分析场域中或者分析的前奏中正在出现的一些变化，从“我在这里/我不在这里”转变为一种更加数字化的形式“我有一部分在这里/我正出现在这里”，这是否模糊了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区别呢？

安东尼诺·费罗：

如果你跟我的一些朋友一样，有个儿子住在瑞典或者住在新加坡，那么每周通过视频聊天软件与他见几面，就会是很普通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对于分析师来说，这种变化没有什么不同。曾经人人都要有一台座机，但是现在最流行的交流方式是文字短信。我认为，设置里面有些部分、有些基本结构是不变的，而文化这个部分是不断变化

的。如果100年以后，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全息影像，可以随便发送到任何地方，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来做分析，这没什么问题。

如果有一个患者发短信告诉我他会迟到15分钟，我会回复“好的”。当然我不会通过短信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我也不会通过电话对患者进行诠释，但我可以回复他“好的”。或者，如果有人第一次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我会回复：“尊敬的先生，你能在周一至周四之间的某天晚上9点以后打电话给我吗？”这并不触犯什么禁忌，如果你使用得当的话。我不会像某些过分多虑的分析师那样，把一切都看成是罪恶的。就像克里斯托弗神父^[3]：所说的那样：对纯洁者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

卢卡·尼科里：

说到罪恶，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段时间以来，我做了很多公开演讲，所以我比以前更经常被大家看到，甚至是被一些患者看到。另外，在摩德纳或帕维亚这样的小镇上，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会变得相互熟悉起来，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分析师不再是一面镜子，而是故事的共同创造者，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考虑到彼此熟识、分析之外也难免碰面，对于保密性的绝对要求是否变得不那么要紧了呢？我并不是说要取消所有隐私，不过在不干扰工作的情况下，彼此多一点点了解，是否能够促进某些故事的创造呢？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

安东尼诺·费罗：

让我们看看我们所说的“熟识”是什么意思。显然，我会阻止一个年轻的同事在周末去跳艳舞，至少不要在他居住的城市跳。如果是在城镇广场遇见患者，或者你们在同一家咖啡馆、同一家书店相遇，互相问声“你好”“晚上好”，我不认为这些是罪恶的接触，这些是在一个小镇上的偶然邂逅。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样的熟识。如果你（和患者）加入了同一家网球俱乐部，里面有一万名会员，这有什么问题呢？或者你们在城镇广场或者喝咖啡的时候遇见。当然，如果关系过于频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限制故事的创造，产生一些过于真实的故事；因此，就会污染分析场域，阻碍原发的强有力的叙事。如果有人骑着马穿过帕维亚，还吹着小号，他要么是疯了，要么就会被认为是一名号角骑士，那样他就太显眼了。当然，在担任公职这个问题上（比如某位分析师同时又是当地警官），分析师需要量

力而为。Cum grano salis^[4]，常识和诚实是试金石：最好不要认为每一件新奇的事情背后都隐藏着罪恶或者破坏设置的东西，但是同时要保持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宗旨是要允许尽可能多的故事可以生发出来。

卢卡·尼科里：

我们一直在谈论罪恶。我必须问你一个精神分析的基本问题：在分析中，人们应当使用语言，而不是使用行动。究竟是谁在行动，常常引发矛盾看法。

然后，关系视角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了，然后托马斯·奥格登带着他的“诠释性行为”（interpretive actions）掺和了进来，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博洛尼尼（Bolognini）的诠释 - 行为（interpret action）。现在又有人在讲设置是可以改变的，要采取适合“特定”患者的行动，然后现在我又发现费罗老师还会躺在躺椅上做分析……

安东尼诺·费罗：

我这辈子就那一次！

卢卡·尼科里：

这辈子就那一次。所以，分析师的判断力显然扮演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现在我请教你：在什么样的程度内，你可以在分析中采取行动，你需要谨记哪些边界？

安东尼诺·费罗：

我会说：对患者来说，他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对分析师来说，他有最低的行动自由。患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谢天谢地，患者们不知道其实他们可以从家里带一些玩具来做分析，他们可以坐在地板上玩耍；成年患者通常不会这样做，但其实他可以这样做。如果某位成年患者带来了一堆玩具士兵，想玩这些玩具，我不认为分析师有什么拒绝的必要，这是他的权利。我们不会对他说：“不行，你不能玩！”那是他的游戏、他的梦想、他的交流方式，或者患者可能会拿过来一些白纸、画一些漂亮的图画，用这些东西和我们交流。这当然可以。

不过，真是谢天谢地，患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躺在躺椅上的患者不会看着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比坐在地板上或者伏在桌子上看着他画的画，要舒服得多。那样会很累人的。所以，患者有在合理的限度内表达自己的自由。我给患者最大的行动自由，如果他想在桌子底下做分析，也许我会叫他“汪汪”，因为他表现得像一只狗狗卧在狗窝里，或者第二天我们就假装是在七个小矮人的小屋子里。可能性很多，取决于当时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认为分析师没有这种自由，分析师的行动自由应该受到严格把握，避免过度行为。解释性行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行为，但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我会非常小心，那不是一条捷径。根据常识，我会让分析师稳稳地坐在他的椅子上，尽可能少地采取行动。我记得我和尤金尼奥·加布里（Eugenio Gaburri）在某次培训的最终考核中，否决了一位精神分析候选人的申请，那是少有的几次否决之一。那位候选人的病例是一位怀孕的患者，她走进咨询室，绊了一跤，跌倒在地，这位候选人写道：“当然，我站着一动不动，避免跟她有任何身体接触。”

这可不行，那是一位怀孕的女士，或者即便没有怀孕，患者就在你眼前摔倒了，你却袖手旁观？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这不是分析中立性。这位分析师应当被留下来，好好问问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那样做是否安全。如果一个患者正从窗户跳出去，你当然要抓住他的脚，或者如果患者跌倒了，你应该扶他站起来，或者如果患者有心脏病发作的征兆，你应该关闭设置，赶紧叫救护车。

卢卡·尼科里：

这种开启和关闭设置的观点非常有趣：它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分析师的两种不同的操作模式。如果我们把外部现实抛在一边，那么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认真地”对待外部现实。

安东尼诺·费罗：

是的，不过当我们认真对待现实的时候，需要先把设置关掉。只有当设置被关闭的时候，现实才能进到治疗室。假设发生了地震，那么继续待在治疗室里试图诠释孩子从母亲的乳头上被抱走时所感受到的震惊，这就非常荒唐了。即使没有地震，这样诠释也是荒唐的。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发生了地震：我们该对患者说些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稍等一下，如果有第二次震动，我们就跑出去。在这个时

候，我们关闭了设置，我们不再是分析师和患者，我们是两个害怕的人，必须逃离那个房间，到安全的地方去。

卢卡·尼科里：

分析师以非常态的、具体的方式照顾到患者，确实很多时候患者反而会记住这些罕见的情况，视之为治疗的宝贵时刻。当然，分析师不能经常做这些事情，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非常规办法。

安东尼诺·费罗：

如果一个患者流着鼻血走进来，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不递给他一块手帕或者毛巾吗？

卢卡·尼科里：

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关闭设置，但是我们不能关掉自己！

安东尼诺·费罗：

是的，我们不应该关掉患者。你会拒绝给一个在冬天全身湿透的患者一条毛巾吗？这些都是与常识有关的事情，我决不会把常识和礼貌抛在咨询室之外。

卢卡·尼科里：

一个患者告诉我他很冷。我是应该把这诠释为他对我们之间的隔阂的感受，还是应该打开暖气呢？

安东尼诺·费罗：

如果我有暖气的话，我就会打开暖气，毫无疑问。至于我当时的想法，那是另一回事。当然，事情并不止于此。如果我们在咨询室，为什么我不打开暖气呢，如果我有暖气而且我也用暖气的话，当然，我会思考，为什么患者会在今天下午两点半的时候请我把暖气打开，而不是昨天呢？他在表达什么，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他累了？他是不是在告诉我他感觉不舒服？还是在告诉我他感觉很冷？我不会把这些猜测一股脑都说给他，可怜的家伙，我会试着理解：他想用这个请求告诉我些什么呢？

一个患者跟我说：“我快渴死了！”想象一下，如果我说：“你是不是在告诉我，因为你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我了，这次治疗就像是一汪绿洲，你穿越长长的周末沙漠而来，所以你感觉自己快要脱水了？”我不会这样大惊小怪，我会直接给他一杯水，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西西里有一句俚语，可能不适合放在一本书里面。这句俚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隔着衬衫摸屁股”。如果玛丽亚要隔着衬衫才能触摸自己的臀部，那就意味着她不能直接用手去触摸，她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带着白手套，她无法进入亲密关系，她总是需要保持距离。我不认为分析师也可以“隔着衬衫才能触摸自己的屁股”，分析师不能有联结恐惧症。他既不应该害怕情感接触，也不应该害怕身体接触。如果一个患者在分析结束的时候亲吻你的脸颊，你只需要带着微笑欣然接受。我肯定不支持太多的恐惧回避倾向。

[1] 拉丁语，语出希罗多德，字面意思为“我说出我所听到的话”。

[2] 这一内容和其他一些问题来自吉尔·肖代-高曼（Jill Choder-Goldman）所写的《全方位视角：安东尼诺·费罗采访录》（Global Perspectives: an Interview with Antonino Ferro）一文，发表在《精神分析视角》（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杂志上。

[3] 他是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著的《未婚妻》（The Betrothed）中的一个角色。

[4] 拉丁语：带上一粒盐，带上一一点常识，再带上一一点怀疑。

第4章 理论问题

卢卡·尼科里：

我们正在讨论分析中立性和我所说的分析自然性之间的关系。在古典理论中，分析师传统上是中立的，就像一面镜子，从中患者可以看到自己的反映，看到自己的移情性要求、投射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添加的任何东西，比如我们的比喻、我们的鼓励或者我们个人本身，都会变成一个额外的变量，危及系统的平衡，侵占患者的各种空间。自从各种关系模型的出现，事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在来看，分析中立性还有什么优越性呢？我们如何能够重新思考分析中立性，使其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过时的东西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觉得分析式中立这个概念太荒谬了。这就像是我们幻想着可以自我受精，或者幻想通过眼神交流就可以怀孕。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在许多地方“弄脏”自己。我发现两个人以中立的方式在一起这个想法是荒谬的，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有一位镜子一般的分析师，这就像是有一面镜子挡住了车库的入口；你本来要把车子停在里面，但是如果镜子后面也没有给你留空间的话，你该如何停车呢？

患者觉得需要有一个栖身之地，需要一个能够容纳他的心灵的地方。分析师必须让自己能够被患者的焦虑、情感所渗透。为了允许渗透，他应当做到虚怀若谷。你怎么可能进入一面镜子里呢？这只可能发生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这样的故事里。^[1]

所以，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认为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在两个人见面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开始共同建立某些东西了。如果分析师是中立的、灰色的，也会把灰色的丝线编织进患者的心里。如果分析师穿着一件红色或蓝色毛衣，那会更生动一些，这些色彩也会编织进患者的心里。中立不是一种色彩，灰色也不是一种色彩，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与患者一起织布的时候，即便是灰色的分析师也会把患者的丝线与他自己的灰色丝线交织在一起。

卢卡·尼科里：

我猜经典教科书中关于中立的定义并不能让你满意。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要对患者的不同需求保持中立，这个理解对我来说似乎是有用的，但是现在我也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面对患者的心理冲突或者关系博弈，分析师应当保持中立。不管患者是和他的妻子继续在一起还是分手，我对这个问题持中立立场，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对患者来说是更好的。不过，在这方面，分析师是不是真的中立或者必须要中立，我不确定。

安东尼诺·费罗：

但是，分析当中那位妻子（指的）是谁呢？

卢卡·尼科里：

我似乎看出来一些端倪。

安东尼诺·费罗：

在分析中，如果我们考虑的都是具体的事件，那么我们就成了过于实际的分析师了。假设你见到你的朋友马克，他跟你说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和露易丝分手。然后他又跟你讲了露易丝做的种种事情，然后你得出结论：路易丝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或者你跟他说露易丝对他很不公平。在这样的交谈氛围中，我们谈论的是人与人之间具体的、实际的事件。

如果我们有了分析工具、分析设置，那么我们的分析装置就会激活，这就像是在一家剧院里，灯光熄灭了，声音安静下来，从那一刻起，你只能听到低语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的分析会谈就开始了。分析一旦开始，患者的妻子就不再是患者的妻子，她是这个分析场域中的一个角色。通过谈论他的妻子，这个患者其实是在谈论什么呢？我们暂且未知。或许是患者感觉被分析师拒绝的那些部分，或许是他讨厌的分析师的那些部分，或许是他无法觉察、无法接纳的他自己的那些部分，这些部分被他称之为“我的妻子”，都是有可能的。当精神分析设置被启动以后，我们就不再处理具体的人了，我们处理的是角色，所以患者的妻子就不再是患者在现实中的那个妻子了。

显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妻子是谁。比如，一个患者抱怨说：“我的妻子很暴躁，总是发脾气，易怒。”很明显，他所说的是一个

失控的事物，可能是来自分析师，也可能是来自患者，无论如何都是发生在分析场域中的事物。所以，我们必须处理这个失控的方面，需要考虑他如何才能把这部分整合起来。^[2]

让我们假设有一位患者，他不会只是在谈论外界现实生活。他告诉我他患有早泄。他实际上并不是在和我谈论早泄问题，我一点也不关心他的性事，他想告诉我的其实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些情绪会四散喷射。或者相反，如果一个患者告诉我他患有射精迟缓，我是否应该真的关心他在被子里的行为表现呢？他想说的其实问题是，他不能让自己自由自在，他总是生活在一种过度自制的状态。所以我会很想看一下在分析场域中，他的这种过度自制会有哪些表现：除了射精迟缓，他的叙述风格怎样呢？这种过度自制或许是强迫症状的一个方面，我们如何才能让他放松下来呢？

背后的故事和表面讲述的故事往往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走进我们不知道的事物。只有走进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射精迟缓这个问题。假设这个患者为了继承遗产而想杀死他的祖母，那么我们就可以建构这样一幅场景：这种杀人的冲动让他感到恐惧，他试图回避这种冲动，症状是他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症状是个体呈现自己的一种方式；显然，真正的问题远不像症状那么简单，症状是某些未知事物的浮现。

卢卡·尼科里：

如果我们把那些人看成是一些角色，那么分析师的自我暴露也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了。关于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的个人经验是：尽管患者看起来对我们的生活似乎充满兴趣，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想去了解我们的事情。相反，他们想知道的是我们能否理解他们。也许他们想知道我们能否扮演某个特定的角色，他们能否在当下场景中与我们这个角色为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把自我暴露看成是向患者传达我们心理耦合的结果呢？看成是在揭示我们的思绪、情感和遐想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自我暴露也是我们通过扮演一个当下所需的角色从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方法。实际上，自我暴露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应当把它放到整体情境中来看待，而不只是用分析师生活中的事件来

回应患者的具体事件。它可以是完全虚构的。假设有一个患者担心分析师太过脆弱，他讲述了他多么害怕一条狗。分析师或许可以说：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意思是我习惯了和狗打交道。分析师或许也可以说：“哦，我相信这是条好狗，小时候我很幸运，我爸在家里养了两只多伯曼犬、三只那不勒斯獒犬和两只斗牛犬。”这些都是虚构的，但是有助于告诉患者“你看，你的狗真的吓不倒我！”我不知道我的表达是否清楚？这真的完全变成另一回事了。这是分析会谈中的一场梦，一场共同构建起来的梦。

卢卡·尼科里：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在收集要去请教你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患者。他坚信在几个月前的某个时候，为了取消治疗，我对他撒了一个谎。还有一位我的同事，她最近告诉我，在一次强度很大的治疗之后，她哭了。后来一位患者看到她的脸红了，就问她是不是感冒了。我的这位同事回答说，只是有点过敏。根据你刚才告诉我的看法，我想请教你关于谎言、虚假和自我暴露之间的关系。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如果分析师说谎，他就打破了诚实这个契约。但是，我们需要搞明白：当说分析师在说谎的时候，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是在讲故事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先引用一句西西里谚语：U fuiri è virgogna ma è savvamentu 'ivita，意思是说：逃跑虽然不光彩，但有时也是救命的法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为一家公共戒毒机构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关于美沙酮的争吵，那简直是一团糟。下班回到家里，那个时候我住在一栋公寓楼顶层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里，我听到了敲门声便去开门，门口站着几个鬼鬼祟祟的人，问我费罗博士在不在家。旁边那些家伙还嚷嚷着要如何把费罗给揍一顿，谢天谢地我说：“哎呀，他不在，费罗博士出去了，他去科尔索·加里波第那儿玩桌上足球去了！”

当然，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玩过桌上足球，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相是赤裸的，谎言是粉饰的。假设你对某人说：“今天我看到你开车经过科尔索·加里波第。”如果这个人没去那里，他可能只是会说他没去那里，他去了马真塔大街。但是，如果他真的去了那里，不过（按道理）他不应该去那里，假设他的前女友住在那儿，

他可能会跟你说他在马真塔大街乘坐32路公共汽车，还遇到了好几年没见过面的佩皮娜姨妈，还看到一个满脸黑胡子的警察。也就是说，谎言往往非常华丽。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我们可以撒谎吗？当然，谢天谢地我们可以撒谎。正如比昂所说，说谎者也是一个思考者。谎言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设想有一个孩子偷吃了果酱，然后被问到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你偷吃了果酱吗？”假设你的祖母脾气火爆，要是你敢偷吃果酱，她就会揍你一顿，那么承认是你偷吃的就不明智了。这个谎言可以帮助你减少生活中的暴力、迫害。假设某位女士的丈夫嫉妒心很重，如果她去逛内衣店的话他就会打她，那么她就会说自己去了杂货店。在我看来，这就像是自我防御。

说谎作为防御，跟我们使用的其他任何防御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使用兴奋型、躁狂型、回避型、全能型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防御一样，我们使用谎言来应对那些我们无法承受的东西。那些事物超过了我们的承受极限，我们就用谎言来自卫。当我们不再害怕那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继续躲在谎言背后了。

卢卡·尼科里：

说到防御，最近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心里会琢磨一些可以放进这本书里的点子。然后我碰巧想到了防御机制。我问我自己：“防御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防御的是焦虑……

安东尼诺·费罗：

……无法忍受的焦虑。

卢卡·尼科里：

没错。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比喻体系，因为传统观点是一种军事比喻，防御由阻抗和攻击构成……

安东尼诺·费罗：

还有人在用那套东西吗？

卢卡·尼科里：

显然是的。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心理防御，比如，防御作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模式。我们是否应该考虑防御积极的、交流的一面，并修改这个比喻体系，从而促进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呢？

安东尼诺·费罗：

有时候对患者来说，分析会变得很无聊，他们会说精神分析真是一门老掉牙的学科，有股子陈腐、发霉的气味，闻起来就像老奶奶的衣服。因为我们还在使用一些早已过时的理论设备。这就像在今天的手术室里还要使用1902年生产的手术刀，其实电刀早就被发明出来了，如今我们甚至还有激光手术刀。许多概念已经属于历史了，曾经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有价值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它们了。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精神分析的历史：在弗洛伊德之后，我们有梅兰妮·克莱因，她应该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因为她指出内在现实和外部现实一样真实，而且她展现出不可思议的勇气：在伦敦遭受空袭期间，V2火箭弹在她工作的房子上空飞过，她还能够继续诠释她的患者理查德所画的画，把V2火箭弹视为理查德想要攻击母亲的乳房。当炮弹从你的头顶飞过，只有疯狂的人才会说那是对乳房的攻击，对吧？

有一些革命性的观点。想想温尼科特或者比昂。然后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无用的废品，那些是我们不再需要但是仍然随身携带的概念观点。由于这个原因，精神分析变得令人厌烦。分析师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分析师不会和你握手，分析师不会祝你复活节快乐，分析师除了诠释什么都不做，分析师知道一切但让你感觉自己很蠢，分析师用嫉妒或者另外一些他固守的概念解释一切问题。精神分析需要卸下这些重担。分析师应当是一个只拿着手提箱就去旅行的人。你知道那种可以手提的小行李箱吧，就是那种可以带上飞机放到头顶行李架的小手提箱？那才是我们应该用的行李箱，而不是装满了两个世纪前的精神分析工具的十几个大箱子。轻便的行李，拎包就走。你知道西方电影里面的牛仔吧？他们都有些什么呢？一匹马，一条套索，一把温彻斯特左轮手枪。有时候还有一个平底锅和一些豆子，仅此而已。一个带着一整套行李的牛仔，那是闻所未闻的。

卢卡·尼科里：

我立刻想到了几个问题。首先，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机构是否已经彻底放弃了维持内部凝聚力的所有尝试，并且为理论的变迁而哀悼？临床医生会去阅读过去10年的文献，以及一些经典著作。精神分析师则要追溯本学科的起源，不得不阅读弗洛伊德、费伦兹、亚伯拉罕、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比昂、科胡特、格林、拉普兰什和彭塔利斯、梅尔泽、罗森菲尔德、博拉斯、海曼、埃切瓜扬、奥格登、克恩伯格、奥拉伊格纳、米切尔、加巴德、麦克威廉姆斯、巴兰哲，如果他们足够勇敢的话，或许还要读拉康。这样一个片面的清单，其实还遗漏了许多精神分析学者。我没有列出意大利精神分析学家的名字，因为他们可能有几十个之多。只有学习了这些人的理论之后，精神分析学习者才能试着追上当代精神分析理论，与此同时，这些理论也在迅速发展。

似乎每个人都在构建自己的个人理论，但是我们难道不是在冒险让大家置身于混乱之中吗？让大家难以找到彼此交流的桥梁吗？我不知道，也许这是一个契机？因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会像自闭症患者那样，每个人都迷失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很难交流，很难在观点上联系起来。每个分析师都有自己独特的对于理论和学者的移情，因此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崇拜者，不能弃之不顾。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把所有观点都保留下来，还是要投票决定压制哪些观点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们就像一个两百年来没有清空过屋里衣柜的家庭，就像某些精神病患者那样不断地在囤积、囤积，所以我们有属于精神分析历史的概念，但是都已经过时了。出于这个原因，一位分析师在旅行的时候还要拖着24节车厢，车厢里装满了已经没用的垃圾。

卢卡·尼科里：

让我们树几个敌人吧：请告诉我三样我们需要丢弃的东西！

安东尼诺·费罗：

弗洛伊德的著作。

就今天的临床应用而言，它是没有用的：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不能帮到你的临床工作。如果你在读弗洛伊德的著作的时候，关注他所

的方法，你就会发现事情不一样了，弗洛伊德总是敢于做出改变。如果我们总是说“这是弗洛伊德说的”，那么我们对他就太不公平了。不是那样的，他是说了一些精彩的东西，但是他留给我们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是他的方法。除了一些一般观点，比如梦的重要性、潜意识的重要性、性的重要性，我认为他提出的几乎所有概念（在现在）都跟他当初所理解的不一样了。如今，我们许多人已经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去理解潜意识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性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了。所以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必须要去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了，除非因为我们就是单纯喜欢，热衷于了解我们祖父母那个时代的历史，或者想去读一些有趣的临床案例，但是千万不要照着那些案例对我们的患者做同样的事情。《狼人》（Wolf Man）这个案例当中提到一个梦，说窗外有一匹狼，它的耳朵是竖起来的。患者讲述了他小时候做的这个梦，以及他是如何看到原初场景的。但是今天看来，患者想表达的意思显然跟弗洛伊德的诠释是不同的，“我一想到你就在我身后，耳朵还竖着，好像随时准备把我撕成碎片，这让我感到很受压迫！”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弗洛伊德解梦的方式，去寻找梦的凝缩、置换、象征化，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现在谁还会按照这种方式释梦呢？今天，我们释梦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卢卡·尼科里：

那么，假设你是圣马利诺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你必须要主持一项培训工作，你是否会建议总结一下弗洛伊德的著作呢？我想到了奎诺多茨（Quinodoz）写的《阅读弗洛伊德》（Reading Freud）和另外一些人写的综述。

安东尼诺·费罗：

我曾经开玩笑地假设自己是芬兰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那个协会大约有40个会员，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头脑发热，显然也没有我们这么热情。我会让他们去读弗洛伊德的临床病例：他们是一群有意思的人，因为他们来自另一个时代。当弗洛伊德去拜访那个可怜的18岁女孩的时候，他谈到她对他的性的感受，那个女孩梦见了一场大火，然后中断了她的分析。如果在21世纪初，一个心理医生告诉一个18岁的女孩“你对我有渴望！”那么这个女孩恐怕是不会梦到房子被烧的，也不会逃跑或者停掉分析。这些事情是如此明显，我们却视而不见，这真是让人不解。所以，如果我是圣马利诺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我

会让他们读一读让·米歇尔·奎诺多茨的优秀著作，因为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学科起源的基本知识，并培养一些对历史的品位。奎诺多茨写得非常好，他阐述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在后来是如何演变的。正如我所说，我会让他们读读弗洛伊德的临床案例，就是这样。我会花1/10的时间在弗洛伊德身上：这似乎已经足够了。然后我会让他们读一读温尼科特，因为他非常活跃、非常重要，他讲的东西仍然适用于当下的临床实践；也不该漏掉克莱因，因为她提出“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一样重要”这样革命性的观点。然后，还有比昂，因为他的方法很好。但他的工作很糟，如果你读过他写的《对联结的攻击》（Attacks on Linking），你就会明白他并没有脱离克莱因。从他的工作方法来看，他仍然是克莱因主义者，他对患者说了很多荒唐话。他曾经对患者做过这样的解释：患者说看到了某人的手，感觉有人在用刀子刺自己。比昂对患者说你有幻觉，而不是去尝试理解他所说的什么话让患者感觉被刺伤了。但是比昂也主持过许多研讨会，他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工具，比如阿尔法功能，他也给了我们许多启发，让我们能够发展出新的理论，进入未知的世界，格洛特斯坦也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个“麻烦制造者”奥格登，我称他为“麻烦制造者”，是因为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重启思考。

不过我要重申，我会带着一套非常轻便的行李去旅行；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分析师，我认为他应该做过一个长期的、足够好的分析，之所以说“足够好”是因为没有完美的分析存在。他应该做过一个很好的分析工作，用锄头锄地，或者用拖拉机；使用什么工具其实不那么重要，因为在分析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比我们已知的事情要多得多。精神分析研究正在探索这些工具。那是我们的未来，去找出分析为什么有效。不过，随着我们发现得越多，我们就越能够放弃祖母的羽毛帽。诸如“阴茎嫉妒”这样的观点是荒谬的。说到这个，有个关于两个小孩的笑话，你听过吗？

卢卡·尼科里：

跟我讲一下吧。

安东尼诺·费罗：

有个男孩走到一个女孩面前，给她看他的阴茎，这个男孩感到很自豪，对女孩说：“看，我有这个，你没有！”女孩不慌不忙地拉下

她的内裤，说：“是的，但是有了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这个笑话应该足以消灭阴茎嫉妒这个概念。阴茎嫉妒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在1892年的时候，女性可能会嫉妒男性所享有的自由，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诸多好处，但是今天考虑阴茎嫉妒还有什么意义呢？

卢卡·尼科里：

另一方面，有很多分析师乐意去做不同形式的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类似，但又不一样。在一些地区，人们会把弗洛伊德理论作为基础，但是使用有法国传统的操作技术，所以他们所做的精神分析与你我不同。这个时候，人们不禁去想，是不是真的需要做一些临床研究呢？无论是在患者的帮助下，还是通过分析师的观察，通过严谨的测试，甚至使用神经成像方法，总之经由这些研究来看一下特定的技术、概念、观点在临床实践中是否有用，以及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我担心在诸如此类的科学研讨会上，我们的讨论最终搞得会像政治辩论那样。每个人都带着有趣的想法和经验，还附带着许多案例作为例证。但是这有没有变成意识形态的玄论的危险呢？我们成了一群乐于自证又相互竞争、分裂的单子（monads）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不认为“法国式”的分析是没用的；我要说的是，精神分析具有一种使人变革的潜力，即便我们使用的是最古老的工具，最终也会产生效果，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作为患者）我如何感受到被倾听、我如何感受到被理解、我的投射性认同如何被分析师的心灵所接受，以及分析师是如何改变它们并以思想的形式将它们归还给我的。重要的是，这两个心灵一起在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不知道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尽管有些分析师很笨拙，但很多分析仍然有效。

如果我们要谈论一下政治和精神分析，那么我认为这两个学科仍然处在中世纪，我们仍然处在那个贵族当道的时代。有许多贵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地。

卢卡·尼科里：

或者他自己的场地。

安东尼诺·费罗：

或者他的场地。每个贵族都有自己的领地，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人胆敢在国王或贵族的领地上猎鹿的话，他的下场会是什么^[3]。精神分析也类似。甚至有的地方整个地区都是一个特定的取向：我们知道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师会做什么样的分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神分析师又是什么样的风格，诸如此类。

所以，在精神分析世界中，地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巴黎精神分析协会的精神分析与英国的精神分析是完全不同的。

做研究的主要困难是缺乏适合的研究工具，确实如此，我认为我们仍然处于流行病学研究的水平。我们还没有开发出适合的工具，我们现在拥有的工具相当粗糙。找到一些新工具会大有好处。

然后就是这个大麻烦了，尽管我很希望每个人都能把精神分析看成一门科学，但我仍然认为从某个特定的专业角度来看，精神分析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门艺术。我相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科学领域。一位资深血管外科医生当然属于科学领域，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血管外科医生可能会实现一种飞跃，让他成为一名独特的手术刀艺术家。尽管他的临床操作绝对是实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分子生物学家、外科医生，甚至在硬科学领域，也会出现一个变化进程，使得他们与艺术接壤并且相融。我认为在有限几个幸运的时期，这也在精神分析中发生过，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找到能够评估这些艺术方面的定量工具就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困难，但愿我们有一天会开发出新的测量工具！

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认为，所谓的精神分析研究就是去计算分析师在分析当中使用“分离”这个词的次数，然后试图证明“分离”这个词使用率高的分析比使用率低的分析更有效。像这样的研究水平太粗浅了，所以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做一些更有意义的研究，能够捕捉到分析过程的核心所在。

这种有意义的研究并不容易，因为很难在分析中插入一个观察者，更不用说我们到底要去观察什么东西。我们是否应该像托姆（Thom）和凯奇勒（Kchele）那样，对分析进行录音录像，再对此加

以研究呢？不过，有录音录像的分析和没有录音录像的分析还是不同的，对分析师、对患者来说都会有所不同。

我仍然认为，呈现某次分析的最好方式是在这次分析结束后重新把它写出来，或者在分析当中做些简要笔记。尽管相对于分析会谈的实质“0”而言，这些记录不可避免存在偏差，但是毕竟由此我们可以研究患者（基于“0”）的叙事衍生物。这和督导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我把某次分析录了音，我不得不用录音时同样的时长来回顾所有这些材料；相反，一份事后重述的案例报告是经过了“过滤”的，也就是说，过滤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保留那些最重要的内容，这会更容易进行督导。

卢卡·尼科里：

所以，我认为你所触及的核心主题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应当为未知所留下的空间，以及我们必须牺牲和放弃的东西：就像分析会谈是如何被“过滤掉”的，精神分析认识论的关键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去“过滤掉”那些理论？

安东尼诺·费罗：

我想再补充一点，用一个更有力的比喻：我非常害怕瘫痪和石化，我把分析师想象成那种带甲壳的动物；我想象着他后背上驮着一幅甲壳在爬行，这幅甲壳就是他的房子，代表的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而且我不喜欢想象他肩膀上还扛着沉重的钙质结核。我不希望分析师是这样的物种，我希望分析师这个物种能够放下那些无用之物，向前进化。

现在，当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在摧毁帕尔迈拉纪念碑的时候，世界各地有许多精神分析师正在“全速倒车”，试图回到幸福的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因为未来让我们感到害怕；新鲜事物让我们这个种族感到恐惧，新物种让我们感到恐惧，我们不了解的一切都让我们害怕，部分原因是当我们面对新事物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在的“异己分子”（alien elements）也被激活了。

我不知道，我是个好人、中产阶级、来自一个好家庭……那么我身上怎么会有“异己分子”呢？

谁想了解那些东西呢？我为什么要认识它们？有什么原因让我必须要和它们打交道吗？

如果有人来给我一点安慰，让我感到安心，那我就可以回去继续做一个图书管理员：每个星期六晚上和我的妻子一起吃顿饭，抚养那几个日后也会成为图书管理员的孩子，那么我为什么非要去触摸那些东西呢？

毕竟，分析应该是这样的：保持连接，不要让城市的道路堵塞，不要设置交通禁令，能够在我们头脑中的街道之间自由穿梭，并且把心灵当成一个不断拓展的存在。

所以，激进主义者身上有些东西值得关注。如果我们继续盲目崇拜我们已知的东西，我们就会变得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在这里，我想谈谈美国人现在是多么幸运，因为，虽然有人批评美国的精神分析，但是当今美国的精神分析比那些还在跳华尔兹的地方的精神分析更加鲜活，尽管华尔兹是有它的魅力的。

我最近去过斯托克布里奇，那里有世界上最后一个对严重患者进行全面治疗的精神分析中心。我必须说，他们完全不惧怕新鲜事物，他们非常容易就可以接受新东西，并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我认为这种开放性是因为：当我在斯托克布里奇的时候，同事们为我所住的酒店感到骄傲，酒店名字叫做“红狮酒店”，建于1770年，就像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

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领域并没有被已知的东西完全占据。这也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当要搬到旧金山或纽约去生活的时候，他们只会带着轻便的行李，而把那些旧家具存放起来。他们只带几件衣服，骑着自行车就能踏上旅途，而他们的家具就被留在某处。

与之相反，我感觉我们欧洲人很难脱离我们的模式，很难顶撞我们头上的贵族。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大佬对理论、对人仍然握有“生杀大权”。

卢卡·尼科里：

我们在谈贵族，权力在贵族家族内部世代相传。我们的分析师、督导师就像是我们的“分析之父”。你怎样才能不回到封建时代，又

成为一个分析师呢？

安东尼诺·费罗：

首先，我认为要成为一个分析师，你需要完成一个好的分析、一个长程的分析、一个有趣的分析：在我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督导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流派的工作方式：我不希望有两个完全一致的督导师，我希望这两个督导师来自完全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他们可以向我讲解各自的工作模式之所以有用的原因，然后我会做出选择。

也许我甚至会花半年时间在不同的督导师那里做督导，尝试不同的味道：樱桃味，还有芒果味。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品尝异国水果，顺便提一下，我还记得当一些从未见过的水果进入意大利超市时的那幅场景。我们必须学会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心。

其次，我会简化一些程序，比如，我们意大利精神分析协会要求受训分析师要接受两年的督导，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督导所针对的患者在这两年内是否不得更换，只能是一个人。我们的理由颇为复杂：我们说督导下的分析必须在同一个患者身上至少进行两年以上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分析过程的展开。但是，我认为在单独一次分析中，我就可以看到这位受训分析师是如何工作的，单纯这一次，或许我作为督导师就可以帮他做得更好一点。比如，某个受训分析师来找我做督导，他几乎从未听过我谈论“场域”这个概念：我一般不会对督导中主动使用这个概念，除非后来他对这种理论的热情被激发了起来。显然，他也不会听到我谈论移情——反移情这些观点。他将听到我谈论的是：在分析情境下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事情，那里只有他和患者，而我则帮助他使用手中可以使用的工具，即使他并不知道这些工具的名字。

[1] 指刘易斯·卡罗尔1871年所写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一书。

[2] “我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坚守一套理论（整合在一套理论之下）。有时候，你必须像蜥蜴那样牺牲掉尾巴来救自己。所以，有时候整合和分裂同样重要。也许在前进的路上我们不得不失去自己的某些方面，就像蜥蜴放弃它的尾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进化。”

（安东尼诺·费罗）

[3] 英译者注：指的是歌手法布里齐奥·德安德尔（Fabrizio De André）创作的传统民谣《格奥尔迪》（Geordie），这首歌在意大利广为流传，其中几句歌词如下：啊，我的乔迪会被吊死在金链上，那条链子并没有多长，他只不过偷了国王的16只御鹿，把它们卖到了勃亨尼那个地方……

第5章 从弗洛伊德到比昂

卢卡·尼科里：

前段时间，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许多分析师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重演了精神分析的历史。就像个体发育重演种族进化。他们首先承认了患者渴望被理解这一关键需要：我必须理解患者，并帮助他这样做。因此，洞察力、博洛尼尼所说的“与自我的分析”

（analysis with the Ego）以及个人历史重建的作用，这些是至关重要的。再后来，重心开始向其他方面倾斜：患者需要感觉到自己被理解，所以焦点便转向了温尼科特讲的“抱持”、比昂讲的“合一”

（at-one-ment）和“负性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以及博洛尼尼所谓的“与自体的分析”（analysis with the Self）。当然，情况并不是那么一刀切，也许我所描述的只是我的个人历程，但我认为新手分析师应该思考倾听所蕴含的治疗价值。

安东尼诺·费罗：

如果我们跳过第一部分，直接从最后一部分开始（开始学习精神分析）怎么样？

卢卡·尼科里：

那就太好了！

安东尼诺·费罗：

假设开始接受分析训练的时候，我们先学习奥格登、布罗姆伯格和格罗特斯坦，然后回过头来，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再研究一下弗洛伊德，这样安排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视角倒置过来，因为你必须给一个分析师一些可操作的工具：如果他在七点半和患者有个会谈，我为什么要告诉他1912年的时候人们是怎样诠释梦的呢？告诉他奥格登或者其他如何诠释梦不是更有趣吗？所以，让我们先学习奥格登、格罗特斯坦、布罗姆伯格，每个人都选择他感兴趣的学者，然后我们再学习更早期的学者。

卢卡·尼科里：

有些人会反驳说，如果你不熟悉弗洛伊德，你就不能理解奥格登。

安东尼诺·费罗：

我知道，有些同事会反对把方向这样倒转过来，他们感觉这样会把训练搞得支离破碎。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问我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是否还在使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我确实还会无意识地使用一些概念，我当然会使用“设置”这样的概念，我也相信梦是很重要的，但它并不比其他形式的交流重要多少，我不知道除了这些，我还会使用他的什么概念。关键是我对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更感兴趣，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走进潜意识；但是说真的，谁真正看到过原初场景呢？

卢卡·尼科里：

所以，既然你不想谈论原初场景，那我们就来谈谈精神分析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必须帮助患者修通他的冲突，修通他的丧失，修通移情（或者我们称之为的其他概念）。不过，如果一定要我描述一下“修通”指的是什么，这就比较困难了。稍微想了一下，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意象是一头奶牛，它站在草地的中央，把草叶咀嚼成草浆，然后吞下去，或者是一片阿司匹林分散片，要把它溶解在水里，分析师就用勺子搅拌这杯水，充当一名“修通协助者”。这些比喻或许不错，但我们应当可以更加具体地描述这个让我们忙碌数月、持续数年的心理修通工作。许多书中都没有具体的描述，通常是一些笼统的说法，比如“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修通这个问题”。心理修通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相信，对于有些经验的分析师来说，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就能对患者的问题有个基本了解，明白他大致的生活形态。当一个患者走进来说：“我的姑姑是一个修女……我小时候，她不许我玩芭比娃娃……我加入了女童子军……”^[1]你就知道了她是一个内心分裂的康康舞者。这个（内在的）康康舞者^[2]去了哪里呢？

所以，分析工作的开端可能会耗费很多时间，目的就是去寻找那个康康舞者。这个过程就是要打开那个被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世界。患者带着防御机制不得不到红磨坊走一圈，这就像一头牛被带到屠宰场，因为患者不得不杀掉他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这个小女孩从没玩过芭比娃娃，她的姑姑是个修女，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向上帝许下诺言。到她能够走上红磨坊的大街，在那里闲逛一会儿，然后还能跳一段康康舞，甚至琢磨着去调调情，这中间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然后，走着走着，其他的世界也将打开，那些是我们先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世界：在红磨坊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也许这个舞者会和飞镖表演者乱搞一气，然后她又会抛弃他，再和一个警察勾搭上，她或许会成为一名妓女，又或者会加入救世军。真正重要的是患者能够打开自己，进入一个个全新的世界。在第一次分析会谈中，我们或多或少会知道，在分析的初期阶段大概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至于往后还会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我认为真正重要的还是能够打开，能够进入那些被阻隔的世界。

卢卡·尼科里：

现在我不知道应不应该问你关于“无忆无欲”（Bion, 1967）这句名言的问题，因为这看起来有些多此一举：也许这句格言已经被如此多地使用，以至于它成了祖母的羽绒帽上的另一根羽毛。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更奇怪的问题：我们能放弃自由联想吗？

安东尼诺·费罗：

当我们能够认识到并没有什么“自由的联想”的时候，我们就能放弃自由联想。我们有的是受约束的联想（obligated association），我们的心智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在把各种各样的叙事衍生物联系起来，编织成清醒梦（waking dream），由此清醒梦便被构建了起来。清醒梦在我们心中形成而不被我们所觉察，受约束的联想就源自这些清醒梦。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错误地把受约束的联想当成自由的联想。

卢卡·尼科里：

我换一种说法再问一下：我们能不能放弃自由联想这个临床技术呢？或者我们应该暂时保留它？

安东尼诺·费罗：

我会放弃任何先入为主的方法。我重申一遍，我认为自由联想的方法已经被受约束之梦（obligated dream）的方法所取代，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下，特定的患者和特定的分析师，他们必定会做出那个特定的梦，他们根本就不是自由的。我认为清醒梦是这场变革的关键，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历史会以法国大革命结束！

所以，这是一场变革，我衷心希望在40年内再发生一场新的变革，就连分析场域这个概念也被人们忘记，没有人再去考虑这个概念。不过现在，比昂（Bion）所带来的伟大变革还没有在精神分析思想中生根发芽。人们对待比昂就像对待帽子上的一根漂亮羽毛，任何人只要引用他的话，好像就会显得自己很了解比昂。

不过，正如我一再提到的那样，比昂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概念，即有一个心理过程不断地改变我们从现实中接收到的信息，从而使现实不断地转化为我们头脑中的电影序列（movie sequence）。我们对这个过程还知之甚少，但是它在每个人的心中都在发生，这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性。我们不知道其他物种是否也会这样做，但我要说，我们人类是做得最多的物种；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将感觉流、刺激流转化成一一系列的象形符号（pictogram），转化成尚未可知的梦的序列。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都取决于这个尚未可知的象形符号构成的梦的序列：我们攀附在这样的象形符号序列上，就像曾经我们的祖先攀附在树杈上。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东西，所以没有什么自由的联想，而是有一种方法，让我们去承认梦的重要性，去发现这个象形图文序列的重要性，这样的序列不断地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所有可能的故事都来源于此。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可能的叙述，但它必须与我们头脑连续生发出来的梦的序列保持一致，所以我们的自由是相对的。

卢卡·尼科里：

但是，现在请考虑一下假期过后我要去看的一位患者，我同意每周和他做两次分析，因为对他来说，每周三次有些太冒险了——我必

须制定一条基本规则，那就是要出声地思考，尽量不去挑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是在做自由联想的事情了。

安东尼诺·费罗：

为什么？

卢卡·尼科里：

那请给我另外一个选择，因为我必须去见那位患者！

安东尼诺·费罗：

我会微笑着向这位患者问好，而不是第一次见面就对他说“听着，我得告诉你，当我们开始分析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躺在躺椅上，这有时候会让人感觉更自由，分析也做得更好”。我不会给患者任何指令，我不会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为这等于是做“弃绝撒旦”这样的事情！^[3]我为什么要弃绝撒旦？为什么我要告诉你我脑子里在想什么？这项所谓的基本规则会把分析置于险境。如果患者想玩他口袋里装的硬币，我们是不是应该禁止他呢？不应该，当患者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给他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当然表达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表达还要取决于患者所身处的梦的序列。所以，当患者来了以后，我会告诉他：“请随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躺在躺椅上。”然后我会等待。如果他不说话，在三四分钟或者五分钟之后，我会问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没说话呢？”

卢卡·尼科里：

因为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安东尼诺·费罗：

好吧，让我们来说详细一点！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开头，“能告诉我一些事情吗？”如果我们对患者说“你必须告诉我你脑子里想到了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现成的指令。它看似自由，但它其实并不是开放性的，而是极具封闭性的。那就等于是你开口就告诉他：“听着，除此之外，你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嗯！你在想什么！根本别想去做别的事情！”

卢卡·尼科里：

没错！

安东尼诺·费罗：

如果一个人想要哭、想要笑、想要自慰、想要玩他带来的玩具士兵，为什么我们要压制他的表达自由呢？当然，表达的自由是“相对的”，至少在社会意义层面是这样的。因为除了社会意义，他是在按照他的清醒梦的思绪所驱动的方向在前进，因为我们无法跳脱我们清醒梦中的思绪。我们是在不间断地拍摄一部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影片。我们无法感知到这部影片，我们无法听到它的声音，因为它位于接触屏障（contact-barrier）之外，而后经由叙述性的衍生物（narrative derivatives），我们才得知有这样一部影片。在这部影片逐渐浮现到意识层面的过程中，那些原始象形图文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这就像小孩子们玩的“传话游戏”。

所以，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处于一种被迫害的焦虑状态（一段“某人是危险的、有威胁的”象形图文），也许他会把它当成一部惊悚片来讲述：有一个危险的人正拿着刀子追我。或者他会把它当成一件日常事件来讲述：“昨晚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一艘以色列潜艇在追逐……”或者他还会把它当成其他类型的影片来讲述，至于哪种类型，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作为分析师尚未完全理解的是清醒梦所具有的强制性。按照当今我们对比昂理论的理解，梦不再是我们工作的中心，真正重要的是阿尔法功能（alpha function）是如何制造出第一批乐高积木的，也就是说，那一台机器是如何生产出绿色的、红色的、蓝色的乐高积木并创建出一套强制性序列的。在此之后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让我们来玩吧，伙计们！”从那一刻起，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所有的游戏都是可能的，也是允许的，但是有一点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为了玩，我们需要那些乐高积木。我们的心智还不能用另一种方式来玩——现在我们的心智唯一能玩的游戏就是玩乐高积木。

所以，这里存在一种强制性属性，即机器不断地转化现实刺激，给你提供一系列砖块。

看到书架上那本书脊是黄色的书了吗？也许现在阿尔法功能正在析取黄色这种颜色，创造出了一块黄色的乐高积木，然后那边还有一本蓝色的书，阿尔法功能析取了蓝色，然后制作出了一块相应颜色的乐高积木。序列来源于对现实的析取。一旦你获得了足够数量的积木，你就可以使用它们了。所以，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拥有许许多多的乐高积木，然后他就准备好了去拼出他想要的东西，限制在于这台神秘机器所能提供的原料。这是比昂最伟大的发现，我认为这是继发现潜意识之后，精神分析最重要的发现了。所以，阿尔法功能就是不断地制造出乐高积木，除非若干世代后人类这个物种又发生了进化飞跃，否则这台机器将按照同样的方式一直运转下去。如果人类又发生了进化飞跃，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眼下看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10万年里，我们这个物种将继续生产源自黄色方形、绿色圆形的乐高积木。然后我们发现自己拥有一个装满了积木的篮子，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了，但这仍然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因为游戏取决于已经被生产出的积木的种类。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彻底改变了精神分析的思考方式，分析师应该对此感到高兴，虽然大多数人不愿意听到它。

卢卡·尼科里：

但是如果我不喜欢比昂，我只是不喜欢他，仅此而已；如果喜欢温尼科特，那么为什么精神分析的未来还要取决于那些乐高积木呢？为什么还要排斥自由联想呢？

安东尼诺·费罗：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精神分析！这里必须要有自由，分析师可以自由地选择理论模型，可以自由地抛弃比昂的所有著述，为什么不能有这些自由呢？人人都应该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

两者的区别在于温尼科特并没有建立心理模型，温尼科特是一个伟大的临床医生。在我看来，比昂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临床医生，至少在他写《从经验中学习》（Learning from Experience）这本转折性著作之前：他的工作方式让我觉得难以信服，因为他并没有摆脱克莱因的理论；可怜的人，这不是他的错。但他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比昂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令人震惊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许多人还并不知道，但这个元心理学为我们开启了新的大门。

比昂的理论模型让我们在知识上迈出了一大步，从畜力时代到了蒸汽时代。从这种新的元心理学中衍生出一系列完全不同以往的临床技术，所以如果某人不了解比昂的理论模型，那么他也无法掌握由此而来的新技术。比昂是个天才，在弗洛伊德之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天才，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可以忽略他吗？当然可以。

卢卡·尼科里：

现在我想向你请教一个不那么“挑衅”的问题，或许也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问题。我理解除了所有的技术变迁和理论背景之外，我们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元心理学结构。基于或多或少的潜意识缘由，分析师会选择其中一种。基于各自的选择，他们又衍生出了各自实践精神分析的具体方法。在当下这个变迁的时代，那些采用了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人们如何放下一系列原来的假设（比如挫折作为欲望的驱动力），转而接受诸如“节制的负面影响”“沉默作为移情的驱动力”等观点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觉得这些说法非常可笑，我希望这些观点给我带来的“欢乐”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没有冒犯到那些仍然认同“挫折引发欲望，欲望又触发行为”这类观点的人。

我已经做了40年的分析师，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那些观点。我不明白那些观点是在说什么，我也不感兴趣，但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分析师。

那些概念从来没有影响到我，影响我的是另外一些观点，所以我想说：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心理模型。有一种源于比昂的元心理学，它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完全不同，而且两者没有可比性。自我功能与阿尔法功能之间有什么异同点呢？

卢卡·尼科里：

呃……

安东尼诺·费罗：

没有！这不同于比较两种拉丁语系的语言：“I”在法语里面是“Je”，在意大利语里面则是“Io”。

没有可比性。如果我们完全接受比昂的理论模型的话，那么它与其他任何理论模型都是不兼容的。但是没有人真正地了解它、接受它，这就是悲剧所在：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认真考虑过比昂的理论及其带来的变化。我想到的有格罗特斯坦，还有奥格登，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科拉奥（Corrao），他离我们还不算远。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人都把比昂当成帽子上的一根羽毛。相反，比昂的理论是一个很有力的模型，与其他模型都不兼容。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基本面出发，也就是以（不同的）乐高制造机为基础，那么我们就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元心理学，从这台制造机里面又会产生相应的病理学，病理可能是缺乏制作积木的塑料原料或者生产的积木过多。由此，临床技术也会发生相应的变革。

关于温尼科特，大家有一个共识：他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他没有什么特别凸显的理论，因为他有一点弗洛伊德风格，有一点克莱因风格，有一点温尼科特风格。开玩笑，我们可以说温尼科特就像红十字会一样。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儿科医生，所有人都喜欢他，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叔叔。

比昂可不是这样。理论上的比昂和临床中的比昂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后者远不及前者，在临床中他是非常严苛正统的克莱因主义者：他是被这么教导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在理论工作和临床研讨方面，他是一个天才，通过督导，他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他曾说过一段绝妙的话，具体细节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说如果能够通过咽喉一直观察到人体消化道的末端或者反之，那就太棒了。比昂就像毕加索，毕加索能够打破具体的形象，因为他在画布上描绘的面孔会同时呈现出从右侧、从左侧、从前面能够看到的形象。就像比昂一样，毕加索在具象艺术方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然后，我们可以说：“我不喜欢这样。”这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以这种方式工作的人站在考核委员会面前，他被问到欲望的挫折体现在哪里……他甚至可能都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他们说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卢卡·尼科里：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

安东尼诺·费罗：

……接受至少有两种元心理学。

卢卡·尼科里：

确实如此。如果你需要建立一个训练模式，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很难被整合：要么你忽略它，要么像二战后的柏林那样把那些东西分裂开来。

安东尼诺·费罗：

要么把那些东西分裂开来，这就像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为了解决安娜·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之间的争端所做的那样。不管你怎么说这些英国人，他们还是如此的严肃认真。当他们发现没有达成一致的余地时，他们就组建了三个分析团体：一个是古典学派的，一个是克莱因学派的，一个是独立的中间学派的。现在他们的人数减少了，所以他们又回到一起了。

我们假装临床上的思考可以弥合理论上的差距，那些加入到学院或协会的人尽力地避免冲突，特别是如果他们是少数派的话，比如那些认同比昂或者分析场域理论的分析师。所以他们可能会把自己包装成更加经典的样子，强调移情——反移情这个轴，提出一些梦，做出两三个诠释，之后的事情就会容易很多。他们可能还会提到一些关于性的说法，只是为了避免引来太多的目光。然后，我们可能会问性和分析有什么关系，但那会是另一个尚未解决的复杂问题。

卢卡·尼科里：

我们应该给那些主要接受了弗洛伊德元心理学训练的读者一些什么建议呢？在我们这本书的第5章之前，他们可能占了70%、80%的人数。他们或多或少在琢磨：“如果整合这些理论不像在帽子上插根羽毛那么简单，那么在我40岁、50岁甚至60岁这样的年龄，我还要开始探索比昂，然后重新找到工作的路子吗？”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我们应该像乔·斯奎罗唱的那首俗气的歌那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女人，除了一双腿，我们还有别的！”我会说：“除了弗洛伊德，还有别的。”你可以超越第一个打动你的东西。

卢卡·尼科里：

但问题是需要在多深的层面去改变自身内在的理论结构，不仅仅是阅读安东尼诺·费罗写的一本书，而是接纳一套似乎与自己原来所持的模型相抵触的理论。

安东尼诺·费罗：

没错。我再说一遍，它不能被整合，它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卢卡·尼科里：

要么接受它，要么放弃它。

安东尼诺·费罗：

要么接受它，要么放弃它。我对它感兴趣，或者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只是希望它不要被排斥。我被允许担任意大利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这也许意味着它不会被自动禁止。也许吧，我不确定。

还有一些我崇拜、我喜欢的大咖，他们试图整合这些模型，这是我做不到的。在意大利，安娜·弗伦塔（Anna Ferruta）正在尝试这样做，朱塞佩·西维塔雷（Giuseppe Civitarese）也在试图调和弗洛伊德与比昂之间的矛盾，致力于研究弗洛伊德和比昂有关幻觉症状转化的观点。现在，他已经完全是一位“场理论”支持者了，我想他会是那个把场理论继续推进的学者，除非他又开辟了其他的思路。

然后，我希望在未来分析场域这个概念也会自行消失，然后会有一个新的概念，它可能跟分析场域概念是一脉相承的、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但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工作，让人们尽可能少地遭受心理痛苦。

卢卡·尼科里：

比昂的理论显然更加宽广，站在比昂学派立场上，批判弗洛伊德式的“宗教礼拜仪式”，同时牢牢抓住自己对比昂元心理学结构的理解，这是否可行呢？

安东尼诺·费罗：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已经出现了后比昂学派（post-Bion）：我们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后比昂时代的元心理学，也许还有一次飞跃，这可能是巴兰哲（Baranger）最初提出分析场域理论（1961~1962）以来的第四次飞跃，是比昂思想与分析场域概念的交叉产物，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当我们把后比昂学派思想与第四代场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比昂曾经所谈论的那个精神分析了。与比昂思想结合起来的场模型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不断增长的领域。那么，在这个领域里，不是说你就只能一门心思地种甜菜而不能种别的作物。在甜菜之后，你可以种一茬樱桃，还能种别的，然后我们就看看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担心现在大多数人更喜欢这片菜地上种些“正统的果子”。^[4]

卢卡·尼科里：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给你读一段话，这是昨天我的一位广场恐怖症患者说的一段话，但是让我们假设它是“精神分析”这个人想对我们说的一段话。

“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回避我最喜欢的事情：我曾经喜欢和别人待在一起，做些傻里傻气的、新奇的事情，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听音乐会，和很多朋友一起去度假。现在，我故意放弃了这一切，这真是荒谬。这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去改变一些事情。即使是在一些小事情上，比如和我不认识的人闲谈几句，或者和一起买咖啡的人随便聊聊，反而这些比我在工作中完成一些困难的任务更能让我感到满足；但是，我总是无法做到自主去结识新朋友，实际上我总是去同样的地方，我从来不去新的地方，就好像我的潜意识迷惑了我，让我以为见到了不同的人，我会避开那些容易结交新朋友的地方。”

精神分析是否也得了广场恐怖症呢？

安东尼诺·费罗：

嗯，我认为在分析候选人参加训练的第一年里给他们读这个小故事，也许比告诉他们“永远不要使用患者自己提供的比喻以外的其他比喻”要更有用，比执意把所有已知的东西堆放在他们肩膀上、压扁他们，要更有用。我认为这将为候选人开辟新的道路：我认为这位患者的描述非常漂亮，特别是如果把它当成精神分析想要倾诉的心里话。

有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也许现在是时候讲出来了，那就是移情/反移情这个轴心（transference/countertransference axis）。移情/反移情轴心让我想到了“罗马——柏林轴心”，^[5]我们都清楚地记得罗马——柏林轴心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我不想再听到关于移情/反移情的事情了。

首先，正如比昂所说，只有我们去见分析师，让他分析我们的反移情，我们才能得知我们的反移情，所以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反移情是什么。

其次，我认为只有当这个“镜像”的轴心与一个特定的理论模型连接起来的时候，它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尽管我认为这个理论模型已经过时了。我认为这就像是抗伤寒血清：我非常尊重（发明了）抗伤寒血清（的人），过去这种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得了伤寒，我们就给他开一些抗生素，过几天他就好了。我的意思是，某些概念曾经是有用的，比如，如果我们从关系理论出发，许多概念仍然是有存在价值的。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分析场域”这个概念，它都没有空间去容纳那些老旧的轴心、过时的公理：既没有移情，也没有什么反移情。这里有的是一种多群体的状态，不断地变化，就像海浪一样，处在永恒的转化过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抛下移情/反移情这个轴心。

概括起来说，让我恼火的是精神分析身上的一种历史性，许多同事都和我有同感：这种历史性指的是把真实的东西一直看成真实的，就好像精神分析和分析师有某种特性，导致我们就像阿米什人一样，拒绝使用汽车或者手机：我们执意要求骑马、坐马车、带黑帽等。这就像我们在研究微生物学或者任何其他医学的、科学的分支，或者我们在研究艺术，但是我们又拒绝承认进化、变化；理所当然地认为，本我在哪里，自我就在哪里（where id was, there ego shall be）：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了。

一旦我们明白了一些事情，我们就不应该继续执迷于那些事情了：我们应该对下一个我们还没有明白的东西感兴趣。固守那些我们已经搞明白的少数事物，把它们当成至理，这种行为可能是最为反动的。但不是反物质的那种“反”，反物质是了不起的存在。我们所说的这种行为是反知识的、反未来的、反探索之美的。我们已经谈到了俄狄浦斯带来的光污染，这种污染阻碍了我们看到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是时候把俄狄浦斯调暗一些了，好让我们观赏到其他的星系，所有其他的情绪、情感构成的情意丛，它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还有更多的变化。我们不应该一直盯着猎户座，只看着那颗星星；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猎户座是什么样子。但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其他星座。当然，我们星空下的星座似乎有几十个，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整个宇宙，我们可以发现数以百万计的星系。

所以，在已知的事物之外，正是精神分析的魅力所在，科学的魅力所在，那里是无限的未知的深渊，而我们应该潜入其中的正是这个深渊，我们可以疯狂地享受它；但与此相反，我们把自己困在了已经知道的东西当中，反而咒骂那些敢于说些新鲜话的人。

这件事让我很生气。

[1] 英译者注：大多数意大利童子军运动是由宗教发起的，通常隶属于天主教组织。“参加了童子军”意味着曾经接受过宗教教育。

[2] 意指电影《红磨坊》的女主角。——译者注

[3] 意指把分析过程变成了宗教仪式活动。基督教信徒受洗时需宣誓“弃绝撒旦”。——译者注

[4] 英译者注：原文ortodossia不是一个可以直接翻译的词汇，是原作者自造的词汇，orto在意大利语中指果园，ortodossia指正统。

[5] 指二战时期的法西斯轴心国。——译者注

第6章 轻装简行

卢卡·尼科里：

既然我们要长途跋涉，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携带轻便的行李，至少得让我们试着仔细斟酌。我们的文章中有几个成功的概念，因为使用频繁，最终总是被提及。有时候，它们变成了能够开启任一扇门的万能钥匙。沉思（reverie）——多么诗意而动人的概念，它本身的命运正是如此。“我有一个沉思！”仿佛这就是个（神的）显现（epiphany）。但它到底是什么呀？

安东尼诺·费罗：

我将会从格洛特斯坦（Grotstein）在阐释这一出自比昂的概念时所说的话开始，随后如野火一般蔓延至所有的精神分析概念，因此沉思即是那些涵盖性概念（umbrella concepts）之一，稍候一会儿即可表示万物，包括它的对立面。有点儿像是“投射性认同”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所以我们无法相互理解。我提倡要非常严格地使用这一概念。首先让我们尝试在临床上进行描述，接着再来看看它的理论渊源。临床上，我认为沉思是一个意象（image），咨询室里，在分析师头脑中持续不断呈现，并且令人烦恼。我们要翻新（retreading）一下我们所提及的分析师的情况，只有当他在某种设置下有一个患者的时候，这个分析师才会存在。持续和烦扰

（insistent and grating）是两个重要特征。起初，这件事情便使得分析师感到困扰：他想知道它为何会在脑海中出现，继而试图要摆脱它，因为它很烦人，它干扰了你可以随时倾听以及接受的心智状态。这是一种真正强加于分析师的东西。并且分析师会发现，这种强加自身影响的意象通常都与他自己所处的分析情境有关。让我们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我曾其他地方讨论过：我当时和一个患者在一起，在某一时刻，一个帆船的意象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出现，是那种在玻璃瓶中的微缩帆船，或者我会觉得说是它在施加自身（对我）的影响。因为它令我不安，我便尝试将这个意象从我的脑海中驱逐出去，在第二次接着第三次回到我的头脑之后，我才屈服：“哦，好吧，我没办法赶走这个意象，那么，当然它就一定是有意義的。”在这一点上，只有当我接受了，我才能够对其进行思考；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这个意象描绘了一种在分析过程中所经历的情境，它基本上描述了一场僵

局（impasse）。瓶子里有一艘帆船，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并没有进行旅行。它代表了康拉德^[1]（Conrad）曾描绘过的情境之一，在他的描述中这艘船发现其所在之处没有风，它自己也在风平浪静中一动不动，没有前往任何地方。在思考那个意象的时候，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那即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陷入了分析的困境，我们陷入了僵局。这和隐喻（metaphor）有很大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隐喻是我使用了意识到事情的意象，最好是和患者分享它。例如，如果我已经意识到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处于僵局，我可以使用隐喻：“在我看来，我们的处境类似于康拉德描述的那样，船在海上漂浮，却没有风。”这样我就用了一个隐喻来共享，并且将一个我已经意识到了的隐喻性的意象转入叙述。

沉思的关键在于它为我带来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差异。

但是沉思这一概念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其后有着一个特定的理论模型——即比昂的理论模型，据此我们有着一个日间梦（daytime dream）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阿尔法（ α ）功能，也就是白日梦（diurnal dream）的母体（matrix），不断地产生意象。这些意象构建了清醒梦（waking dream）的梦思，这反过来又将构筑我们的思想和梦的乐高积木，而沉思是这样一种现象，借此我便能够触及这些来自我们感官感觉经由功能塑形而成的砖块，以及我们每个人所不停建构的心灵。所以严格意义上，在一个治疗小节中只有当我正在建构并对一系列象形符号（pictograms）——元素的集合并不知晓时才是沉思，某一刻，其中一个象形符号成了我所接触到的东西，而不再对我隐藏。如此，我目睹了自己精神生活之窗的开启，这给予了我一把理解的钥匙，让我明白在我与患者一起生活的故事里，在那一刻发生了什么。这就像是能够打开一扇窗户，梦的思想在此成形，通过这个开口，我们看到了正在形成的电影的框架。因此，我可以推断出一组关于正在发生之事的有用信息。这一面向与比昂的思想——清醒梦思（waking dream thought）的概念紧密相关。此外，因为这一概念指涉了精神分析很多其他的面向，因此对于沉思的理解如同任何时候想到的所有事物，变得非常广泛了，一切都是沉思，万物皆是梦般的状态。然而沉思与此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一种非常具体的东西。

卢卡·尼科里：

你提到了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这也是当前精神分析的另一个大问号。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至少要读10遍，自己才能得到部分的把握，而我的同事们可以很轻松地谈论这个，我对他们的羡慕不止一点点。在极端情况下，患者几乎可以像操控木偶一样控制分析师：“患者让我感到愤怒，接着是无聊，然后他把我弄得麻木了，结果我就睡着了。”

在训练课程中，投射性认同被当成是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所描述的那样，像是具有强大而原始的防御机制。随后，比昂以及后来几代的学者发现了它的交流功能；如今在某些例如关于分析场域（analytical field）的文本中，它似乎被描绘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连续函数。难道果真如此？

安东尼诺·费罗：

即使投射性认同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一个最终汇集一切的“涵盖性概念”。我还是会对其稍加限制。起初，我有一个关于投射性认同的强烈想法，认为投射性认同发生于一个具体时间，比如午后两点一刻。然后会有投射性反认同（projective counter-identification），这个受到投射性认同的人会有怎样的体验，他又如何将其修通，等等。现在，我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会更多地将它看成是从一个心灵（mind）到另一个心灵微转移/排泄（micro-evacuations）的连续交换，既是从患者朝向分析师的，也是分析师朝向患者的。这里我们需要用一点俚语（slang）：β元素，即感觉，不断地从一个心灵向其他心灵行进，我们可以称此为旅行（travel）投射性认同，这个过程越强、β元素越多，就像是小型飞机，寻得一艘航空母舰降落。如果它们找到了一艘航空母舰，那就意味着分析师是具备接受能力的，它们可以降落，如此它们（感觉）也将找到一个情境，可以在其中被代谢和消化，这样就可能会有一个沉思，作为投射性认同的结果。我们已经讨论了沉思，它主要是沿着视觉轴（visual axis）运行，我们几乎也都是沿着视觉轴在运行。请记住，所有与梦的工作有关的事物（阿尔法元素的形成，以及在那个时候将实际的情感状态融合在一起的意象）实际上是根据所有感官器官运作的。我们不仅要讨论象形符号，亦即视觉意象，也要涉及听觉符号、嗅觉符号、动觉符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将正在处理的所有感官都考虑在内。有一些人，比如音乐家，他们更经常在听觉登记（register）上运行，而不是视觉；然而，我之所以在谈论视觉登

记，是因为我想说，我们99%的人类是在视觉登记上运行的。但是为了完整性，我们应该每次都要记住去说到象形符号，嗅觉、听觉，等等。

卢卡·尼科里：

在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我将尝试通过一项“空运”（airlift）行动来拯救弗洛伊德（Freud），他正在从这场讨论中消失。为了衡量我们的处理水平，我们可以说，元素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事物表征（thing-presentation）有关系吗？

安东尼诺·费罗：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不喜欢对不同的模型进行比较，有些同事非常喜欢谈论连续性，但我更喜欢指出间断点。弗洛伊德主义模型有其自己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我不认为提出例如，“自我与 α 功能的区别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很有用。当然，你提出的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事物表征”与“象形符号”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把每一个模型当成仿佛它是自己独自起作用的。这就像在问德加（Degas）和我最喜欢的画家毕加索（Picasso）之间的联系。我只是不好奇罢了。我更喜欢追求毕加索的世界以及德加的世界，而不是去探索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和德加画作之间在风格上的相似性，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卢卡·尼科里：

让我来利用一下你对毕加索的热爱：在巴塞罗那，有一个专门为他设立的博物馆，在前面几个房间里，我所看到的年轻的毕加索是一位卓越的古典肖像画家，一位伟大的学术画家。所以他选择把那些他知道得很清楚的专业路线放置一旁，将自己投身于一种新的风格，所以他为奥格登（Ogden）关于忘记精神分析去和每个患者一起发现未知的说法，提供了一个直观的例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遗忘“学院派”精神分析的操作只能在习得它之后才能完成？习得一种经典模型对于接下来离开它继而走得更远是必要的吗？或者并非必要吗？

安东尼诺·费罗：

恐怕来点儿西点军校^[2]（West Point）是有必要的。然后你就可以从那里走向其他路径和道路了。这里，我不认为西点军校就需要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模型。我接受过西点军校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克莱因主义模型。我们通常把元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等同起来，谁说的？元心理学可以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克莱因主义的、比昂学派的，等等。

我认为为了能够脱离它，一个正式起步的成员资格恰恰是需要的，所以我喜欢在毕加索（博物馆）的前几间展室内放置一些较为经典的画作。当然，毕加索正如比昂一样，后来经历了发展。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有一个包含98%克莱因主义的比昂。然后他继续解放自己，不知怎么就背叛了克莱因的教诲，以一种绝对是灾难性的方式进行了创新。但是在他的工作上，比昂与其患者直到结束仍旧保留着克莱因的方式。然而，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向我们介绍了全新的、以前不可想象的工具，如 α 功能、清醒梦思、清醒梦。然后他在其圣保罗、纽约、洛杉矶的督导研讨会上制造了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我们可以在他的工作中真正地看到一个天才，他已经完全颠覆了以前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一些非常正统的克莱因主义者声称，1962年之后比昂疯了。他疯了，因为从1962年起，他不再是一个克莱因主义者，一条全新的路径开始闪耀。

我想要找一个培训机构，在那里他们教授浓厚的比昂主义心理学，但是20年后，它也会遭受背叛，经历过时，以及被人摒弃。真正重要的是步伐的观念：我们曾经迈开的步伐将我们带到今日所处的位置，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采取更多有望的措施来把我们再次引向其他地方。正统的想法反而是与之相反的，它是我们都认同的已知事物。例如，没有哪个法国分析师的工作不把性别以及代际间的差异作为重点的。实际上，除了在美国，很少有著作不在前5页中大量引用弗洛伊德，我认为这就是正统故步自封的绝对代表。

卢卡·尼科里：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比昂的心理学。虽然诸如诠释（interpretation）、洞察（insight）、修通（working through）等词汇都属于分析性语言，但对比昂来说，转化（transformation）是很晚才进入精神分析争论的。我搜索了主要国际期刊的档案，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除了广义上的转化，这个词并不存在。在意大利，

人们差不多在八九十年代才有所谈及。在你看来，转化在当代精神分析中的作用，以及它与诠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想说的是，诠释总是一种解码（deciphering）过程，也就是说，患者说了一些话，分析师诠释说：“你认为你告诉我是这件事，但你实际上告诉我的是另一件。”所以他是在破译（deciphered），他给出了一个解码密钥，从完全荒谬的解译到不那么荒谬，这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我想到了督导中一些极端的案例，患者说他喜欢在早上用牛奶浸泡他的饼干，这就意味着他想和他的女朋友做爱。因为转化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是内在固有的，所以这里与比昂（的思想）就发生了强烈的间断。在经典思想中诠释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与洞察有关：你在向我诉说的是这件事，但实际上你告诉我的另有其事；我来让你意识到这一隐藏着的无意识信息。与此不同的是，比昂的思想充满转化的观念，不仅是在分析小节的情境中，并且在此之前，治疗行为实际上也是 β 元素的转化，即对感觉、一团团的感觉、原始心灵（proto-mental）碎片的转化，成为 α 元素，即朝向意象的方向转化。精神分析工作基本上就是这些原始情绪（proto-emotional）、原始象征（proto-significant）、“原始的一切”之状态，进入意象中，接着是叙事（narremes），进入叙事的集合也就是在叙事中转化，并且通过这些过程我们促成了思想和情绪的建构，也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建构。对于比昂而言，转化元素在分析小节中也非常重要。患者因为胃疼而进入分析，然后在小节的尾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并不会出现如“你的肚子疼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般的解释，也不会存在发现以及洞察，但是胃疼的情况会有所消退，并且取而代之的是你有了一些意象、建构、传说和故事。所以，你不再胃痛，而是以“说你杀了一个人”结束了这一节谈话，或者你做过一个梦，在梦里你杀死了一个人，一个正在缠着你让你感到烦扰的人。没有理由去说，是这个分析师，或者父亲或母亲进入了这个场景，相反你拍了一部关于某人想要杀死其他人的电影，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卢卡·尼科里：

原始情绪， β 元素：在临床实践中，难道它们不会遭受风险，变成某种模糊的概念，成为一个人头脑中（或者在这一场域的角落里）上演的一箩筐坏事吗？

安东尼诺·费罗：

好吧，我认为 β 元素、 α 元素和（对于）破坏性的措辞可能是我们与自己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试图让那些属于我们的在我们内心深处糟糕的内容变得更系统有序一些。所以，我认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方面，通常是出于防御的原因，也常常是与痛苦有关，但那是分析必须要处理的。因为这些有效运转的，或者运行无效的，这些糟粕重灾区是我们最需要去处理的。我们必须能够梦到它们，通过做梦，使之发生转化。

卢卡·尼科里：

我真的非常喜欢弗洛伊德的座右铭，在其多义性和歧义性上很是绝妙，而有时意大利语的翻译会忽略掉这点，如“它在哪里，我也在哪里”（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本我（id）之所在，“它”（it）亦存，而我（I）、自我（ego）也将同在一处：这个“我”既作为身份认同（identity），我自己，也是精神上自我觉知（self-conscious）的自我。换句话说，我需要更多地了解我自己、我的欲望和我的冲突：要紧的是一种有意识的知晓（knowledge），一种自我表征。我不知道，想问问你们，在他所描述的这个转化的游戏中，转化能力的发展是否与对自己的有意识的知晓有关，或者说，吊诡的是 α 功能的发展是否可以让患者感觉更好，而不伴随在意识层面对他自己产生更多的发现。

安东尼诺·费罗：

如果极端一点来考虑，我认为分析可以导致患者开发自己的思考工具，学会在遭受原始情绪状态轰炸的时候使用它们，让自己感觉更好，换句话说，我认为患者是能够不断转化原始情绪和原始感觉状态，把它们变成更容易理解的东西的。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意识增强的逻辑结果，但这只是部分原因。我认为，洞察力失去了它的核心重要性，而这恰恰有利于我们促进转化，并且有利于获得让我们以更好的方式在心智上发挥作用的工具，而不是对我们的了解。并不是说每一个受到比昂或者其他人启发影响的精神分析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每一种分析都会奏效，因为即便对此并不知晓，分析师和患者也会修通，代谢并且将 β 元素转化为意象。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人们所谓的科胡特或者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中，存在着一个持续的转化，它并非开启这个（转化）过程的历史重建，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支

持这些转化的方法。事实上，我认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基本上是指自精神分析开始，给在咨询室里发生的事件命名。投射性认同并不是从克莱因开始的，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沉思：这些过程从两个个体保持着一种治疗距离，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的那个时刻起就在那儿了。精神分析研究就是在找出上面提到的两个人在那间屋子里除了交谈以外，还做了什么事情。

卢卡·尼科里：

一个房间里的两个人处于一段关系中，关系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克莱因及比昂学派的方法都会认可这个议题的中心（地位）。那么在你看来，这些工作模式的主要区别和相似之处是什么？

安东尼诺·费罗：

考虑到技术方面，我认为存在一些差异，而且是非常明显的差异。克莱因模式要求一种更加主动和解释性的方法。实际上它所期待的是对于身体幻想的解释，和一种持续的关于移情的诠释。比昂模式一开始也接受了移情诠释的中心地位。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即在分析场景中有两个主角（protagonists）。在所有这些模型中，我认为共同特点是分析关系的中心性，即使在克莱因和比昂模型中，关系是从内部幻想的角度来评估的。然而，不止有一个人存在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被看成两人心灵（minds）之间交流的结果。

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比昂放弃了分析中立的概念，从那时起，任何转化的起始点都暗示着两个心灵在工作中的相互作用。

相比关系模型，我更熟悉克莱因和比昂的工作方式，但我认为（在它们之间）有几个共同的见解。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并不是过去或者童年期间发生的事情，而是分析小节的“此时此地”（here and now）中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并且转化就恰好发生于“此时此地”。

[1] “内莉，一艘游弋的小帆船，摆动着她的锚，但船帆未见鼓动，她是静止的。洪水来了，风近乎平静，她被困在了河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着潮水转向的时候。“泰晤士河（Thames）的近海河道在我们

面前延伸，就像一条漫长的水道的开始。海面上，大海和天空毫无缝隙地融合在一起，在明亮之处，驳船古铜色的船帆与潮汐一同飘（漂）动，似乎是伴着浸渍过的精神之光，静止在红色的帆布上，急剧地达到顶峰。”——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2] 西点军校，在纽约州，美国军事学院所在地。在战争电影中，它成了著名的训练基地。

第7章 分析场域

卢卡·尼科里：

多元化的语言与精神分析模型是当代精神分析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我们的读者在地域以及理论取向上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谈论你个人正在研究的模型之前，你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看待精神分析中的多种声音的吗？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精神分析中若只有一种模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许多模型，我们也都知道这些模型是什么，并且我认为这些模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利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模型，并且可以以此与他人进行讨论。我想这样的讨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就这方面来讲，我认为我找到了一种快速识别对话者内部模型的简单方法，就是去观察分析师是如何思考所谈到的角色的。这些角色可能会被看成真实的人，实在的、活着的、有血有肉的，那我们就在使用更加传统的一个模型；它们可能会被视为内心的角色，居住在患者的内在世界，那我们是在一个典型的关系模型或克莱因的模型里面；也有可能被理解为情感的全息图像，理解为两个心灵的功能，理解为那种允许我们在一个小节过程中分享梦的演员们，那我们就正处在场域模型的各种理论公式中。

卢卡·尼科里：

新手分析师可能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我们正在讨论的众多模型中，一个有经验的分析师是如何从训练阶段开始，然后在职业成熟阶段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的。费罗的分析场域扎根于何处？

安东尼诺·费罗：

很幸运的是，我的分析师与督导们遵循不同的模型。因为模型不同，曾经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对于一个特定的交流过程，有时用某种方式解释，有时又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释。只有我自己经历了这些才能理解，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参照点。然后，努力学习和

理解各种各样的模型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重要，故从一个模型开始，比如我过去不知道的比昂学派，我又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克莱因模型，然后又遇到了温尼科特学派，经历了弗洛伊德学派，直到最后我发现了我自己的模型，这可能会被形容为比昂的理论中的“从相遇中浮现（emerging from the encounter）”，这就是后来我和其他同事所发展的场域的概念。

在我的训练中，我遇到了场域这个概念，但只是擦肩而过，直到后来我将此模型与比昂的理论联系起来。我记得在波士顿的比昂会议上吉姆·格洛特斯坦（Jim Grotstein, 2009）有一篇伟大的著作，那次会议之后我就正式宣布了比昂理论与场域理论的合作。自那时起之后的许多年，这两个概念就一直在发展，互相结合产生了一些我认为很有趣的观点。当然，我的模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更接近于叙述学，它是很好的灵感来源。尽管叙述学是精神分析之外的一个领域，然而它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概念，且使其更全面，角色在叙述学中有悠久的历史，从更传统的观点来看，角色相当于人，然后以角色为故事的驱动力，最终由文本的读者和作者共同建构角色。

卢卡·尼科里：

在与比昂的理论结合之前，场域的概念发展于阿根廷，巴兰哲夫妇（Barangers）对此进行了研究。那它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

安东尼诺·费罗：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45）的思想涉及了场域这个概念，但是它本身的起源更加古老。巴兰哲夫妇首次将此概念应用在精神分析中。他们对分析小节中人们如何形成盲点（blind spots）很感兴趣，巴兰哲夫妇称之为“堡垒”（bastions），这让我感到激动不已。这些是通过交互的投射性认同形成的阻抗：患者不是唯一需要对阻抗的形成负责的人，这是与分析师无意识的共谋。这些盲点需要分析师特别注意才能被解决。

我发现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这些壁垒是由分析双方造成的。

自那时起，关于场域的概念继续独立发展，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可拉奥（Francesco Corrao, 1986）将场域视为患者与分析师内在团体动力的总和，并由此发展出一个延伸的群体情境。可拉奥常说，

没有一个分析是两个人之间的，反之，每一个分析都涉及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由这个小节中所出现过的人物组成，由患者与分析师共同创造。

最终，可拉奥的不饱和场域（unsaturated field）（即患者和分析师内在群体动力之间的相遇，叙事转换在其中发挥作用）被比昂的理论赋予了生命，尤其是关于梦的观点。如果你多给我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再补充一个关于场域这个领域的新进展，关于群体的梦——游戏（group dream-game）。

卢卡·尼科里：

那么，如果你的工作方式有了很大进步，并且还在不断改变，我就得代表那些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分析声音的分析师们，请你告诉我们，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的想法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安东尼诺·费罗：

我一直在改变是因为我一直在遵循患者们直接或间接给予的建议。比如，我记得当我还在遵循克莱因学派时，我的天哪那个时候我真是那个样子，因为患者来找我说：“现在我得和你好好谈一下。我不想躺在沙发上，相反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想要告诉你。当我刚来到你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只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男友。当那一小节分析结束我离开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男友，另一个就是你。我想知道我到底哪里错了？”

这段故事发生在我还是个克莱因学派分析师的时候，那时我会用移情来解释所有的一切。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远离了不断诠释移情的义务。对我来说变得重要的是去重视治疗小节中发生的转化，而不是患者一说到她的男友，我就马上用移情来诠释。这让我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她与她男友的关系的转变。但是在（当时的）我看来，毫无疑问那个男友就是指我。

除此之外，我不再认为有必要提醒这位患者，她说的男友就是我。

卢卡·尼科里：

所以，有时候，男友就只是一个男友？

安东尼诺·费罗：

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男友就只是男友而已，但是在我头脑中（在这个厨房里），指的是我。

许多年之后，当我遇到“场域”这个概念之后，我又有了另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男友是场域中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场域里就有男友、患者的父亲、狗。所有的角色都在场域之中。若患者谈到场域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我的表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凶手！这个场域就又拓宽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凶手都包含在里面了。在我看来，这个凶手就在这个办公室里，我们需要进行烹调才能消化他。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个凶手是这个患者的一部分还是我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双方共同创造的。

因此，有关场域，我的理念是一位患者所带来的内部群体，在他打开办公室大门时，与分析师的内部群体相遇所带来的。一旦这些群体相遇，我们的场域中的所有角色就会立刻发生转化。

当一个新的角色进入这个场域，我不必去思考这个角色到底来自过去还是外在现实。此刻，我会这样去思考，这个场域需要一个来自外部的角色来表达一些东西。当然，我会牢记这个场域就像全球定位系统一样在运作，让我们一直知道自己的朝向，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需求或内在世界来选择方向，而不是符合我们自己的需求或内在世界。

卢卡·尼科里：

你常常把场域模型称之为一个弱理论（weak theory），但在其他时候你又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场域化”。你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矛盾呢？特别是你所说的弱理论又是什么意思呢？

安东尼诺·费罗：

弱理论是指一个理论保留了很大的改变空间，它预见了变化的可能，对新鲜事物和未知事物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场域理论以其某种方式预见了自己的消亡，也预见了人们渴望看到的東西，它知道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因此对未来、对新事物，以及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开放的；奇怪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场域就是一个弱模型。

一旦你在其中，这就是一个强大的模型了，你会去了解它，花时间和它在一起：这就像很难假设比昂从未出生过（会怎样），或者假设狼从未存在过（会怎样），或者假设我们站在心理学研究的原点（会怎样）。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已经迈出了一些小小的步伐，我们理应享受这些成果。

你说我要“场域化”（Field-ify）整个世界，而我指的只是分析性的世界，因为我始终认为在精神分析之外还有很好的思考方式，如存在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些东西让我着迷，但与我们的专业关系不大。我只把精神分析当成一门能减轻精神痛苦的学科。这就是它的特殊性，也是我认为的唯一好处。如果有人想用精神分析代替千斤顶来换轮胎，只要他们不要求我也这样做，我没有异议。

与此同时，我不会去场域化这个世界，不会认为场域是唯一起作用的东西。场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伟大的发明，一个可以持续10年、20年、30年，甚至40年或50年的伟大模型，有趣的是（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场域的进展。自它诞生以来，场域的概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用的至少是这个概念的第四代了。第一代将其概念化的是巴兰哲夫妇，现在它闻起来已经像是个满是灰尘的阁楼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变化，使新的探索能够得以开展。就像iPhone一样，我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看到iPhone7、iPhone8、iPhone9，然后这个型号就会有一个飞跃，它可能不会再叫做iPhone，可能会被称为Gamma32，然后又会有Gamma33。精神分析有一个响亮而又清晰的观点，就是会有新的模型不断地开发出来，然后又会有新的发现：这是一个扩张的宇宙，一个完完全全一直在扩张的宇宙。模型应该不断扩大，我在这里再借用一个古老的概念：所有可能是新的事物都会遭遇持续不断的阉割，因为它们是令人不安的。格洛特斯坦甚至将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命名为《我敢扰乱宇宙吗？》（Do I Dare Disturb the Universe?，1981）。

分析师的世界不愿被打扰，它想要安睡，而精神分析曾经是一门革命性的、颠覆性的科学，但从某一时刻开始却变成了一种通用的、普通的抗生素。

卢卡·尼科里：

现在你们这个非常著名的分析场域模型看起来可以用来扰乱一下宇宙，所以，我们得再问几个问题。分析场域是指通过治疗室中两个人之间的投射性认同形成的无意识力量的场域。所有有关患者的分析都在这个场域中，没有什么是在外部的。到目前为止都还好。我会从那些很多人问过自己的问题开始，但这些问题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人问过你。在你呈现的临床工作片段中，你常常将（场域中）角色的台词视作患者与分析师的交流。让我们看一些例子：“前几天轮胎经销商给我的轮胎充了太多气”“我妈妈脚一落地就生气得不得了”。假设费罗是一位会随意评论同事的工作的人，他并不了解这些同事搞的是什么模型，他阅读了这些指向分析师的语句：这些轮胎充得太满了，是指干预得太多太积极了；易激惹的母亲，指的是这个分析师过于迫切了，从某种观点来看，所有都是移情。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切都太过简单化了，有一点让人觉得幽闭恐惧。总是你与我，我和你吗？

安东尼诺·费罗：

多奈尔·斯特恩（Donnel Stern）写过一本书叫《关系自由》（Relational Freedom），2015年由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写了一些有关于此的非常漂亮、睿智的观点，我希望这本书很快能有意大利语版。他讲了一些关于我（依照旧的理论）本可能会如何去诠释某些交流过程的诙谐故事：“如果费罗是在纽约，一个患者告诉他自己吃了一个热狗，他可能会理解成……”一场游戏就在许多叙事性的故事中展开了。

当我在文章中用一些片段时，是在尝试去传达一些难以传达的东西，因为这就像讲述一个菜谱：当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味道、温度与火候，是吧？因此，一个讲述（如何烹饪）的菜谱与这道菜在本质上只是稍微有些相似。我们将移情作为一种总的情境的想法首先要归功于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 1985），所以这甚至都不是一个原创的想法，毕竟我们都应该感谢克莱因所说的，所有在治疗室里发生的都与内在世界有关。克莱因观察患者的内在世界，意识到我们有两个内在世界，我绝对相信移情是一个总体情境，但移情一定不是单向的、仅由患者朝向分析师的，尽管这非常普遍（就像在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中占了三个车道），但至少有一个是相反的方向，即从分析师指向患者。再对此补充一点，与这个现实或另一个现实有关的其他现实也正在形成，并且是由于相遇而形成的，毕竟是两个人在治疗室中，所以最直接的事情恰恰正是在治疗室里发生的事

情。因此，在克莱因学派的观点中，所有的这些都要不断地解释、不断地诠释；而在场域的观点中，所有的这些都处于一场正在进行的游戏。依据游戏中的角色，今天我们可能扮演的是那个打了太多气的轮胎经销商。但是，并不是说轮胎经销商就一定是分析师，而轮胎就是患者的东西，这就是场域的美妙之处，并不归咎于我就是那个烦人的妈妈。比如我们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中有一个让人生厌的母亲。我们会选择谁来导演这部电影呢？南尼·莫莱蒂^[1]？同样的电影由昆汀·塔伦蒂诺^[2]执导就会很不一样。在莫莱蒂的电影中，可能会有讽刺、悲喜剧的格调，而在塔伦蒂诺的电影中，这个烦人的妈妈最后可能被切开了喉咙。这里有上千种可能的发展，这只是一部电影的开头，比如（开头出现）一位具有侵入性的母亲或者一位将轮胎打气打得太满的轮胎经销商。然后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部正等待拍摄的电影了，而演员将会是哪个人也不是既定的。可能会有上千种方法来掩盖一些事，也可能会有有一个蒙面的角色很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具体身份，我们也不知道他与分析师的关系更大还是与患者的关系更大，这些都有待去建构。与克莱因学派不同，“你害怕我说得太多了，会让你承受不住”，这样说并没有意义。从场域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过时的诠释，会终结场域。这种解释将会意味着场域的崩解，并回归到极具关系性的（highly relational situation）情境中。一个极具关系属性的情境意味着你和我、我和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回应你、你也回应我。一个场域的情境意味着让这些角色一起生活和玩耍。我们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轮胎经销商，他给轮胎充太多气了，接着此话一出，我们把这个故事交给南尼·莫莱蒂或昆汀·塔伦蒂诺，看看会出来怎样的一部电影。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最好的就是一起去做，去建构：我们今天有什么安排？皮兰德罗^[3]会这样说：“今晚我们即兴发挥。”

卢卡·尼科里：

从历史上来看，精神分析是作为针对压抑的诊疗而发展起来的，通过横切意识的方式提取出了幻想和情感的材料。简单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场域理论更专注于分裂和解离的区域的发展，这可以视为一种对意识的垂直切割吗？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压抑的现象和分裂的现象一定存在于分析场域，但不知怎的，被压抑的部分，甚至是分裂的部分，基本上早已存在，早已被创造出来了。我的分裂的部分已经是我的工作部件之一了，它虽在舞台下面，但就在剧院旁边，就在它旁边的商店里，在附近的办公室里，早已存在。我们现在关注的，和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那些还没有到达可思考程度的东西，那就是分裂的上游，也定然是 α 功能的上游。

卢卡·尼科里：

我还有一个想问的问题，涉及如何倾听患者的言谈交流，也是一个你正关注的议题。在这里，我要对这个情境做一个奇怪又夸张的描述。“某个患者有一个加热器，而这加热器被锁定在了最高挡位，他感到家里热坏了。”好，我是一名新手分析师，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离他太近了，所以我挪远一点，也许我再保持沉默一些。“修理工来了，他修好了加热器，但是浴盆里的水又有点太凉了。”好吧，我又有点离得太远了，我也应该更热情一些。是时候该谈谈了。诸如此类。假设这个人并不叫费罗，他可能会不知不觉一直需要与患者的无意识共谋，这难道没有风险吗？

安东尼诺·费罗：

我想说两点：首先，顺从患者的无意识在一定时间内似乎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没看出我们不能满足患者的理由：让他得到他想要的，真可怜，只要这是有道理的，只要这在场域的游戏中能够变得明晰起来。注意，这第二点很重要。我再重申一遍，我们应该把“这个场域中就是你与我”这个想法抛在脑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以这个“你与我”为根据，来判断患者需要更多的温暖，所以我靠近一些，或者认为患者需要更凉快一些，那我退后一些。应当把这种观念抛在脑后，这仍然属于后克莱因学派的关系视角：你与我（you and me），我和你（I and you）。所以，也许本书中很难传达的正是这个场域的复杂性，举例而言，因为一个人被迫说：“然后我想……然后我就离开……但接着浴缸又变冷了……所以我又走近了……”如此等等。不幸的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看法仍然处在关系的视角中，但是如果是场域的视角来看，我应该可以这样说：“让我们拍一部好看的电影——让希区柯克（Hitchcock）来导演；不，今天我们让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来执导这个片子——在这个故事中，有个浴缸不怎么好用，还有一个烫死人的热水器。”然后我们会发生什么，而所有这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不涉及满足患者的欲望，除了促

进一种允许转化发生的氛围。我们很难摆脱后克莱因时代，因为后克莱因时代的贝蒂·约瑟夫对我们分析师来说极具吸引力，但对患者来说是非常破裂的。然而，如果我们将分析情境从一种诠释性情境转变为一种转化性的情境，我坚信这是一种好玩儿的情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始扮演管道工人。我们摆弄着无法工作的加热器，我们玩的是冰冷的浴缸。有多少东西可以围绕着这个冰冷的浴缸展开，如果是威尼斯的导演来执导的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丁度·巴拉斯（Tinto Brass）^[4]！在一部叫做《冰冷的浴缸》的电影中，丁度·巴拉斯会让克劳迪娅·科尔（Claudia Koll）在一个浴缸中洗澡，而另一位导演可能会让《马赛力诺的奇迹》（Miracle of Marcelino）^[5]中的修士待在这个冰冷的浴缸里，因为修道院没有钱，所以不得不用冷水洗澡。

卢卡·尼科里：

在我看来，这个场域是通过导演的转变来运作的，逐渐赋予这部电影生命，塔兰迪诺式的，莫莱蒂范儿的。但是你又是如何决定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谁来执导呢？

安东尼诺·费罗：

导演也是出现在分析师与患者精神生活中的角色，也许保持觉察，我们就可以意识到如果这个患者总是会把工作交给《马赛力诺的奇迹》的导演，那这里就需要来一点儿丁度·巴拉斯。这是角色介绍的一部分，也是角色分配的功能，因为导演的功能也是角色的一部分。

也许我会说，这里有一个不对称。有两个不对称的位置，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分析情境是相当对称的。一个不对称的地方是伦理责任。在治疗室里应当没有任何欺骗行为，在这个治疗室里发生的事情中，99.999%的道德责任都是分析师的。这是最不对称的地方。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对称的情况，事实上分析师应该知道，在他的外套下面穿着一件戴着船长徽章的衬衫，因此他有责任制定航线。因此，这个责任也是不对称的，而且我认为作为这个责任的一部分，这个分析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决定导演人选的人。导演选择权也是属于患者的，但对这两个人来说，有一点不对称也是合理的：如果这个患者非常拘谨，在某些时候就可能需要有人来引入丁度·巴拉斯或关于丁度·巴

拉斯的故事。那么谁应当去找丁度·巴拉斯呢？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患者会提到他，但如果多年后，这个患者还没提到丁度·巴拉斯，那分析师可以去找这个角色了。并非所有的角色都需要由患者来引入。有相当多的角色是患者所拍下的分析师，或者是对这个场域的快照，而这位分析师也可以用上千种不同的方式来引入他的角色：他可能会这样将他们放进来：“我在想我昨天看的一部电影……”他也可能用沉思来引入他的角色，他可能会这样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叔叔……”然后毫无根据地说他叔叔做了什么，或者他可能也会用一种特别的态度来对待导演的变更以引入他的角色。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玩游戏这一点上：我想分析应该尽可能成为一个游戏情境。

卢卡·尼科里：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从儿童分析出发的过渡实际上会更经常地使用这种类型的活动，这也是更加容易理解的。

安东尼诺·费罗：

在儿童分析的工作中，分析师是会玩游戏的。

卢卡·尼科里：

也许那些正在受训的分析师，或者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分析师所关心的是避免占据太多的场域、避免存在感太强、避免制造太多他自己的角色，这些角色可能来源于分析师自身对“丁度·巴拉斯”的偏好。我认为这些担心是正确的。节制的咨询师遇到的危险会更少，而那些插入角色并且身兼导演的分析师则冒着引发反治疗性干预的风险，或者一般而言，会造成对患者空间的侵犯。

安东尼诺·费罗：

当然，一个总是让丁度·巴拉斯导演的分析师会是一个抑郁的分析师，这样的分析师会在治疗中寻找某种兴奋的途径，或总是把丁度·巴拉斯或昆汀·塔伦蒂诺放在（治疗）里面；分析师应该有一个几乎无穷的角色和导演名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分析师就变成了联合制片人，这个联合制片人通过选角和任用哪位导演的方式，在较大的甄选范围内决定需要参加拍摄的演员。显而易见，患者被赋予了同样

的选择权，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发展患者的话语，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

就像玩乐高游戏，患者也可以使用那些特定角色或功能的乐高积木，比如消防员或煤气泵。另一方面，分析师应该主要使用那些用来建立更多联结的乐高积木，除非如果这个故事会因为缺少一名消防员而陷入困境，否则我认为分析师没有必要自己把这个消防员放到那个故事里。

卢卡·尼科里：

有人想知道患者可以容忍多少相异性（otherness）。

安东尼诺·费罗：

患者还是分析师？

卢卡·尼科里：

我原以为这会很简单。我想先从患者开始，如果可能我们再来谈一下分析师。

安东尼诺·费罗：

忍耐相异性并不容易，因为那都是潜在的身份，因此，场域的概念就变得有用了。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彼此两个，当我们与患者见面时我们是两个人，不到一秒钟我们就是4个，再过两秒钟后我们就是6个，很快这个办公室里就有72个人了。场域就是在解释这一整个生成的复杂的群体情境。并且在与这个群体情境一起玩耍，能够去转化这个群体情境。但是现在你可能要问我，我们该从多大程度上遵循那些从场域中获得的信号呢？

卢卡·尼科里：

真巧，这正是我想问你的。

安东尼诺·费罗：

我们这些分析师都做了很长时间的学生，因为分析训练不会仅持续四年而是更久，而且不幸的是，分析师的平均年龄增加了，这意味着一位分析师要从五六十岁才能开始做分析师的独立工作，因为所需的学习时间很长。只要这个人还是学生，他就对场域中的信号有大量的需求，我一直用全球定位系统来打比方，全球定位系统向我们提供有关场域状态的信号，而且它的信号在成倍增长，因为每一个群体或亚群体的角色都会给我们不同的指示或信号，所以我们有一个团队，一个全球定位系统的场域。因此，当分析师终于可以少一些学生气，可以有一个飞跃的时候，那会是一个精彩的飞跃，分析师从一位有抱负的科学家，转变为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的角色，从而再也不需要场域的信号，没有任何地图、罗盘指针，只是跟随直觉前进，和患者一起成为高创造性的、高度丰富的一对儿。要记住，达到这一步需要40年的时间，就像没有乐谱就能够熟练演奏的钢琴师，或者即兴演奏爵士乐的乐手，在这背后有40年的实践。尤金尼奥·格布瑞^[6]会说，这是德尔苏·乌扎拉（Dersu Uzala）^[7]取代地图测绘师的时代。

卢卡·尼科里：

在本书中，许多答案都需要分析师的创造性与才华。一位新手分析师是应该把这些观点作为他职业生涯的基础，然后在草原上全速驰骋呢？还是把它们放在头脑中某个角落，把它们糅合进自己的西点军校，等待着掌握技术给创意灵感打下坚实的基础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创造力和灵感是终点线。唉，我们总是要从西点军校出发，正如我们在学校必须从ABC、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一样。然后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漫长的学习之旅，漫长的督导之旅，漫长的与同事会面与碰撞之旅。所有这些都将我们带向可能的艺术维度。

我记得我的高中老师曾经纠正过一个很聪明的同学用过的句子，这位同学抗议并解释说莱奥帕尔迪（Leopardi）或福斯科洛

（Foscolo）^[8]也用过相同的表达，然后老师说：“是的，但你不是诗人！或者至少你现在还不是！”

因此，我认为你必须达到诗歌的艺术简洁性才能摆弄所有的语法、所有的句法；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是漫长的，而且一定会让

人筋疲力尽。

正如爱迪生曾经说过，要想有真正的创造力，你需要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我想我们都需要流汗，需要流过汗，并且一直在流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达到创造性艺术的巅峰，这样才能回报过去几十年我们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所以我根本就不是在谈一个简化的方法或是一个简单的发明，而是在说对于一位钢琴家而言，要达到某种境界可能是一种技艺精湛的艺术，一种文本的创造力或解释力，全然忘记了语法、句法、数据网格、全球定位系统，但这是一个伟大而艰苦劳动的顶峰。

卢卡·尼科里：

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场域是会呼吸的、会扩张和收缩的，直到有时它会崩溃，它会随着新的叙事、新的角色的发展而扩张……

安东尼诺·费罗：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故事应始终与双方的内在世界保持一致，分析师不应该自己一个人制作电影。

卢卡·尼科里：

我认为重要的是你要强调这些故事的关联性，要弄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四只手（共同参与）的发展过程，然后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场域必须与某种特定的事实相关联，例如，我在思考对移情的解释，或者减少可能会发生的故事的东西。假设对这个操作进行概括总结是有意义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话，你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时候这个场域应该扩展，以及什么时候应该收缩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借鉴一个例子：作家什么时候引入一个新的角色？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在什么时候加入了神父克里斯托弗（Father Cristoforo）^[9]这个角色呢？介绍他出场的那个时刻简直太棒了。如果没有神父，这个故事将不复存在，会变得支离破碎。克里斯托弗神父的出场强有力地重构了叙事，因此

每当叙事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强大的角色让叙事回到生机勃勃、引人入胜的状态。这样的选择很难分享（说明白），因为在科学层面是很难传达的。你需要一种艺术天赋，而这是没人可以帮忙的。分析师就像一位小说家，我们的小说只有50分钟的篇幅，真是很遗憾，因为我们写的小说是精彩的，而通常情况下，这些分析小节就是小说中独一无二的部分。这就像是烹饪：你做了一道很棒的菜肴，是的，然后（用完餐后）你可以把菜谱写下来，但菜谱只能让人模糊地回忆起你刚做过的菜。分析也是如此，它不能以一种计划的方式用强硬的规则再现它。曼佐尼、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是怎么把这个人物、这个动作带到这个场景中的？你让患者稍微引导你，谢天谢地，患者不断地给你建议，但是什么时候你会把艾伯特·布洛尼（Abbot Busoni）带到现场？那么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什么时候进入呢？这就是叙事的魔力，如何打断它们，如何发展它们，如何彻底改变它们。我认为，多亏了作家，我们将会磨练出拓展想象力的工具，多亏了写作的节奏，或者多亏导演，这就是我们多年来做的婴儿观察，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让我们接触到了母婴二人所有的原始幻想。然而，分析是母婴二人的复制品吗？当然不是，所以像安德烈·葛林（André Green）、弗朗西斯科·可拉奥等非常重要的分析师，以及其他总说，婴儿观察和坐在长凳上的退休长者所做的观察一样好；无论我们观察什么，都会发展一些能力，因此，对伟大的文学经典的观察也会为我们带来许多工具，打开许多世界，增添许多视角和叙事方式。

[1] Nanni Moretti, 意大利著名导演、演员，代表作《两个四月》《儿子的房间》等。——译者注

[2] Quentin Tarantino, 美国著名导演、演员和编剧，代表作有《低俗小说》《被解放的姜戈》等。——译者注

[3] Pirandello, 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1934年凭《寻找自我》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4] 英译者注：意大利电影制作人丁度·巴拉斯的情色电影最为出名。女演员克劳迪娅·科尔主演了他最成功的电影《疯狂欲望》。

[5] 西班牙电影，1955 年上映。——译者注

[6] Eugenio Gaburri, 意大利精神分析师。——译者注

[7] 《德尔苏·乌扎拉》由黑泽明执导，电影讲述了一群西伯利亚探险者遇到的一个老游牧猎人，起初这位猎人被看成是粗鲁、古怪的，后来因其智慧、观察力、洞察力和人性光辉而受到称赞。

[8]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和乌戈·福斯科洛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诗人。

[9] 克里斯托弗神父是19世纪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一部影响深远的小说《婚约夫妇》（I promessi sposi）中的人物。克里斯托弗神父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修道士，他有一段不愉快的过去，并且脾气暴躁。他为了把主角露西亚从魔爪中解救出来，公然对抗当地领主——邪恶的唐·罗德里格（Don Rodrigo）。

第8章 技术议题

卢卡·尼科里：

你说的是艺术家的触觉、直觉，还有一点点嗅觉。如果你是一位分析师，在分析中开口之前，你需要考虑多少事情呢？

安东尼诺·费罗：

好吧，如果你是患者的话这就是即刻的事情：你就只是讲话。做个患者要简单得多。他不知道自己所做为何事。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有一个像患者一样的分析师，他能讲述出他的心之所向，或者嗅脑（rhinencephalon）之所向，或者情绪之所向，但我认为这些都是一年才乍现一次的精湛技艺。

事实上，分析师应该至少在很小的程度上采取甚至所谓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为导向的治疗举措，也就是知道“如何通过等待才能获得理解”的能力，引入最少的角色来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这就像是拍摄一部穿越沙漠的美国高速公路电影，汽车在沙漠中停下几个小时后，第一位分析师也许会引入一头驴，第二位则引入了一头牛，第三位则引入一个加油站。分析小节必须要装扮一下，即便是引入一些随后允许故事扩展和发展的角色。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没有觉察到的事情能够发生。也就是说，我们的兴趣点总是那些还不知道的、无意识的，或者用无意识构建的东西，尽管“无意识”这个词是那些被用滥的术语之一，但我认为，我们仍将不得不再接着使用几十年。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具启发性、更有力的词；然而，今天，当然还有明天，以及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我认为我们还得继续当个无意识或者无意识概念方面的专家。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摆脱的词或者概念，不管它的含义是什么，弗洛伊德用一种方式诠释这一事实（指无意识所指的现象），克莱因用了另一种，但是比昂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与我们相关的被诅咒的地方。

卢卡·尼科里：

无意识，是心灵的处所还是功能？

安东尼诺·费罗：

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一个词是斯维塔瑞斯（Civitarese，2014）发明的，“使无意识”（inconsiare，意大利语，动词）^[1]，这个词语也有一些性的意味，会让人联想到大腿（thighs）^[2]，所以作为一个词，它充满了指涉（references），甚至是感官情欲的（sensual-erotic）、弗洛伊德式的激情。这是一个美丽的词语，因为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即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使无意识这一点（manage to inconsiare）。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觉得斯维塔瑞斯很好地定义了它，建构和训练无意识是比昂的想法，尽管如此，斯维塔瑞斯却能用创造新词的方式明确我们在工作中真正应该做的事情——能够进行无意识的交流，进行一种遗落式的交流（missed communications）。也就是说，使无意识和做梦就是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是通过做梦得以无意识。在比昂以及后比昂（的思想）中，梦、如梦（dreamlike）和无意识之间，存在着连续的反复，这是我们仍然需要仔细检视的东西。不幸的是，当我们不去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说“是的，在1922年弗洛伊德……这两大原则……”那真是莫大的损失。这就像是舍弃乘坐《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宇宙飞船去探索未知的空间，反而去了博物馆。我们还是可以去博物馆，也总有时间去博物馆的，但是，在乘坐星际迷航中的飞船到另一个星系，进入黑洞，去其他的世界，这件事和去卢浮宫之间……嗯，卢浮宫很漂亮，但我们退休后也还可以去参观；只要我们能去的话，还是让我们去探索另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其他的无处之所（non-places）。我们应该是伟大的探索家，而不是昆虫学家。

卢卡·尼科里：

这种探索的想法暗示着进入未知世界的旅程。所以，当一个新手分析师在许多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之间采取行动时，他会觉得自己的责任更沉重了，这涉及选择哪条路径去遵循，因为我可以做无数种开场白。人们想知道什么样的路径可以把患者带去有意义的地方，从而帮助到他。我在想，凭感觉飞行会有多么危险；我害怕的是，自己在说话的同时也在付诸行动。一位没有40年的经验，却想成为一名艺术大师的分析师，可能最终会踩到他患者的脚趾头，想象一下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旅程，可是患者感觉受到了虐待。

安东尼诺·费罗：

有一篇旧文章，我不记得作者了，它谈到了诠释不当（misinterpretation）的积极影响。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错误的干预或微小举动是不可磨灭的污点；我们需要一种更像克里斯托弗神父的态度，即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omnia munda mundis）^[3]；如果一个分析师用纯洁的灵魂做某事，那就不是什么大罪。我所知道的是，很少有分析因为分析师多说或少说一个词而被破坏。我认为重要的是，分析师应该是纯洁的，就像克里斯托弗神父说的那样“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如果分析师是不诚实的、恶棍、骗子或者一个堕落的人，抑或他有一颗清白的心，患者会很清楚。患者知道，也能觉察到这一点，并且完全是有意识的，所以我不会太担心技术上的错误；如果一个人犯了技术上的错误，他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画作沾有污迹的话，画家是可以做出修补的。比如在这幅画中，有一个女式拎包很糟糕，但其余的都很漂亮，带着纽约一月份下午3点钟的气息，天色开始暗下来，气温低于20℃，这就是纽约。好，所以是女式拎包出了问题，但它根本不会影响到（整幅）画面。

分析师们太多时候将自己投身于微不足道的细节了，我并不想要冒犯别人，但是我认为我们一直在盯着精神发育不全的（oligophrenic）细节，就像在罗夏墨迹测验^[4]里那样，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坚持做的是去寻找情境所产生的效果，比如“对色彩的总体反应”，等等。谁先说话、谁第二个说话、与患者保持25分钟的沉默，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很愚蠢。扯来扯去，确立谁在这两人中居于主导地位，宣称“我要在这里制定规则”，这些有什么意义？

卢卡·尼科里：

在这一点上，如果你也怀疑“沉默”，那么你得回答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讲，分析师的沉默促进了退行（regression）的状态，这种意识思维的脱轨（derailment）使初级思维（primary thought）更容易出现，欲望、口误、移情和其他一切过去被阻止的东西也会更容易浮现。你是怎么看的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将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当我沉思时，我才会脱轨（derail），而且考虑到我在心理上的运作风

格，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是那种很少会有沉思的分析师。我的工作风格是这样的，有时在一个小节中会出现几个意象，然后使用它们并不总是像我之前所举的例子那样简单。通常，其意义仍旧会有点神秘，有时你不得不去对其进行处理；用老式的语言来描述的话，沉思是一种在分析小节中完成的反移情的微梦（micro-dream）。我所经历过的另一种脱轨是在我睡着的时候。如果一个人

（分析师）睡着了，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他睡着了，而且不是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觉，那么这个患者借以让他的野兽、那些狮子和猎豹去睡觉的防御，就变得危如累卵了。情况不再那么与世隔绝了，

“鸦片正在发挥作用”，患者一直用来对抗他的原始情绪的睡眠式防御，在这个场域显现了出来；它现在传染给了分析师，所以被麻醉的分析师也睡着了。这是从迟钝状态清醒起来的第一个阶段，把那些昏昏欲睡的豺狼虎豹唤醒起来，而在此刻之前它们都在蛰伏

（hibernated）。所以，睡着实际上是两人分享蛰伏状态的时刻，并且从那里启程，你就能开始对情境“去蛰伏”（de-hibernate）了。除此之外，我想我一直都比较警醒，因为最终是患者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在舞台上，虽然也利用了我的合作，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需要揭露或者突然冒出来。否则我们会回到（旧的）无意识的观点，认为它是预先建立的，已经存在的，是患者的一部分，我必须让它浮现出来。我们与无意识一起游戏，我们构建它，我们通过与分裂的部分一起玩的游戏、通过分析中显现的部分，日复一日地依靠我们自己来完成它。重要的是分析性的倾听。有一个非常拘谨的患者报告了她做的一个梦：一天，她遇见一个人走下楼梯到我的办公室去，那是一个身着裙子、非常性感的金发女郎。这个角色到底是谁呢？我们让她走下楼梯，为何我们还得关心是谁走下了楼梯呢？很明显，这个患者把迷人的、性感的、身穿裙子的女人这一面带入这一场域，这是她还不能认同的部分。所以，也许这是自体分裂的一部分。没准儿有人会说，“可是那个女人的头发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我在这里只是开个玩笑，因为患者也是金发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了。或者你也可以开玩笑，询问这个神秘的女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当这位美丽的女人擦着唇膏、身着性感裙装走进来的那一刻，这间办公室就迎来了一位新角色，诉说着一些有关生活的基本方面的事，也许是一部新电影的开头，例如玛丽莲·梦露的《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每一个进来的角色都会打开新的可能性空间，但我们之前常常把这个过程搞得跟耶稣赴难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精神分析当中对于痛苦有如此的执迷。

痛苦当然是存在的，在生活中也是有痛苦的，但是我不应该将痛苦理想化成是一件好事的样子而沉湎其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分离、隔阂、死亡和疾病中承受了太多苦痛——祝愿我们能有些好运吧，所以让我们试着也在分析中做些其他的事情吧。分析应该是一种乐趣，应该是一款游戏，但也应该是一款你可以像在德·菲利普（De Filippo）^[5]的戏剧中那样玩的游戏，其中你经常会玩到一些悲剧性的主题。想想《这些幽灵》（These Ghosts）或者《费鲁美娜》

（Filumena Marturano）；无论你怎么玩耍，戏剧是一场游戏。并且分析是游戏的一种形式，对此没什么更多要说的了。最好是去分享，允许患者享受游戏的乐趣，这种操作在贝尼尼^[6]关于奥斯维辛的电影《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里呈现过，这部电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很多人觉得可怕和怪异。我觉得贝尼尼的观点，就是设法把关于一个可怕事物的想法变得对儿童来说可以忍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必须要知道怎样做游戏：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且十分符合道德规范。

卢卡·尼科里：

想到《美丽人生》这部我特别喜欢的电影，我就非常惊讶，像电影里的那个孩子，怎么能够真正领会那个被掩盖了的现实，这个现实的情感意义完全遭到扭曲，纵然是以一种看似积极的方式被扭曲的。

安东尼诺·费罗：

我们的精神生活让我们得以生存，即使它也让我们彻底糊涂：防御即是谎言，谎言就是让人变得糊涂。假如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在某一刻也许我们会有个破裂的动脉瘤，所有可能发生的不幸，从急性脑膜炎到心脏病发作，再到肿瘤，如果这么想我们就会永远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所以我们用全能、用否认来自卫。恰当地组合这些东西（指防御）使我们活着，令我们愉悦，因为我们刚买了一些意大利面做晚餐。

卢卡·尼科里：

从刚才我们谈到心脏病和肿瘤，我就觉得有点儿焦虑，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沉默的问题上来吧。

安东尼诺·费罗：

沉默。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沉默，除非是在交流中的激烈时刻，也可能会有静默的诗意时分。但是我无法忍受一个分析师为了沉默而去沉默！我把一位同事的女儿转介给了另一位同事，她觉得（与她的分析师在一起）非常不舒服；接着6个月以后她回来（见到我）并表达了这样一个要求：“再告诉我一个分析师的名字，只要他能说话就行。”她想要一位会说些什么的分析师，一个会参与讨论的人。眼下，这个沉默的分析师就是狮身人面像，托生于石头，就像是你在罗马花园中发现的那些雕像中的其中一座。活着呀！

卢卡·尼科里：

在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城市），格劳科·卡洛尼（Glauco Carloni）认为，比起沉默，分析师更容易因为说出某些话来而后悔。

安东尼诺·费罗：

当然了，一个说话不多的分析师比说话多的分析师所说的废话更少，但是我们应该放废话一马。人们所说的诸多事情里，有些也许是无稽之谈，另一些也许并不是。

卢卡·尼科里：

可是，如果你说的话少一些，所被听见的也许就更多，这也是真的。这些话会更加珍贵。

安东尼诺·费罗：

我两个叔叔曾一起旅行，他们从巴勒莫（Palermo）出发到那不勒斯（Naples），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到那不勒斯，他们就爬上沃梅罗山（Vomero），其中一个从上面望着海湾，做了这个手势（伸出胳膊，好像在表示海湾躺在他面前），另一个叔叔做了个手势予以回应（好像在说“太棒了”）。这次交流之后，他们从那不勒斯向巴勒莫往回走，再没作声。这样可以吗？要是他们喜欢的话，好吧，为什么不呢？可生命短暂，有太多事情我们可以告诉彼此，让我们谈谈吧！

[1] 英译者注：inconsiare是一个从inconcio（失去意识的）（英语中，unconscious指无意识的）衍生出来的动词。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使无意识（unconsciate）。

[2] 英译者注：不宜翻译的文字游戏，inconsiare（unconsciate使无意识）以及cosce（It. thighs它。大腿）。

[3] 拉丁语：“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

[4] 在罗夏测验的评分系统中，一个智力发育不全的细节被定义为一种反应，在这种反应中，当本来应该看到整体刺激的时候只有其中一部分被看见。

[5] 英译者注：厄多尔多·德·菲利普（Eduardo De Filippo, 1900～1984）是意大利演员兼剧作家。他的作品经常是融合了戏剧与滑稽剧的特点。《这些幽灵》和《费鲁美娜》是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

[6] Benigni, 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兼导演。——译者注

第9章 梦

卢卡·尼科里：

因此，我们最后来到了梦的跟前。弗洛伊德教导我们，梦在我们的内部世界举足轻重，我们对此表示同意。如今，每10位分析师里面，我们就会发现11种不同的释梦方式。梦描绘了患者的内部世界，标志着他无意识的欲望、他与其他人的交往方式，表现了他与分析师的关系，或者他正在经历的分析阶段。它为无法表征之物赋予形状。

在这个迷宫中，当代精神分析似乎将焦点从梦的隐性内容转移到显性内容。事实上，询问有关梦境的联想这个普遍习惯最近正面临质疑。在通往无意识的捷径上有“待尽之事”（work in progress）吗？

安东尼诺·费罗：

由于我们必须从过往开始理解奥格登（Ogden），我会想到卡德尔·巴卡（Calderón de la Barca）编剧的《生活是一场梦》（Life is a Dream）。我想说的是，整个精神分析小节就是一场梦，因为分析小节来自于这样一种假设，按照弗朗西斯科·可拉奥^[1]第一个学生阿尔多·科斯塔（Aldo Costa）所说的（我们不应忘记他），分析师经历的首个丧失就是丧失现实。甚至从你进入分析的那一刻起，患者说的每件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当成现实对待。

我觉得梦真的是最不应该被诠释的，但梦是可以游戏的。比如，有一些梦，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诠释的内容。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每周做四次分析，他有一个梦。他是一个靠“毒品”来维持生活的人，“毒品”就是他身边越来越年轻的女人们，他试图阻止自己从40岁增长到45岁、50岁、55岁，变老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其实每个人都在试图阻止自己变老。有些人会买一辆保时捷，有些人会像他一样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拥有这些年轻的女人，越来越年轻，现在他选择的女人的年龄已经到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他做了一个梦，因为他有一个很年轻的情人。在梦中，他在做着手术，但是在患者的腹膜囊里却有一些黑莓，然后这些黑莓被压榨过滤出一种特殊的液体；再把这些黑莓汁给一些绝望的孩子喝，然后这

些孩子就停止了哭泣。我们需要什么神机妙算才能理解这个梦吗？我很想马上问他：“斯特拉（指这位外科医生的年轻情人）是金发还是黑发？”但这种猜测也可能是危险的。所以我一直等到那次分析小节后面的时间才问他这个问题，等到斯特拉再次出现在我们的分析场域的时候。他回答说她是黑头发，所以一声清脆的“哈哈！”就足够了，这就是对梦的诠释。这个梦的含义就是黑莓是用来让孩子们停止哭泣的，而这个梦是如此的不自证自明，没有必要去诠释。

显然，这一切也都是有理论原因的，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梦就像是孩子的游戏，它已经很先进了。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学会处理黏土，揉捏它，做个玩具士兵，然后拿更多的黏土，做一把刺刀，放在士兵的手中，然后再做一个印第安泥人；梦已历经演变，我们已经在处理印第安人和士兵的战斗了。最难的部分是第一步：找到黏土，找到印第安人的颜色，再多拿一点黏土；这是先前的一切。梦是最后一部分，在 α 功能的作用下，从感觉到象形符号，所有这些过程都已经在上游完成。而梦就已经做好了，就像那道菜已经料理好了，所以不需要解释，已经是现成的了。孩子们得到黑莓就不哭了，我还能说什么？为什么不就让它（梦）这样呢？有人可能会说“也许一颗红莓也可以，不一定非得是黑莓！”但这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精神分析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们精神分析师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把它弄得尽可能复杂和晦涩，就像神秘的毕达哥拉斯秘密（Orphic-Pythagorean mysteries）。精神分析是一个极其简单的过程：讲的是我们如何在一起，如何消化现实的残酷。这就是德弗洛（Devereux）^[2]提到的原始部落所做的事情：当夜晚来临，他们就开始讲述梦，讲述故事。这就让现实可以被修通。

卢卡·尼科里：

所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认为精神分析过程的核心在于梦见双方能力的扩展，让患者获得一些工具，增强他代谢现实的能力？

安东尼诺·费罗：

现在的焦点在梦上：这个面向很重要。让我举一个例子。和一位受督导者会面的时候，我通常会问他：“最近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他回答说 he 去了那不勒斯（Naples）和庞培（Pompeii）。“我们坐着一辆吉普车上了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这辆吉普车疯狂地颠簸着，我们只是去了维苏威火山口附近，烟从火山口冒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那不勒斯人，他们说一种让我们难以理解的语言，对我来说就像阿拉伯语，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和一个了解这个语言的人用英语交流比理解那不勒斯语容易多了。”在闲聊了几句之后，这位被督导者继续向我讲述他与患者的会谈。那是一个相当枯燥的过程，这个患者一直在谈论孩子。这个患者有点像我之前举的例子，她的姨妈是一个修女，她是幼儿园老师，她们俩基本上花了所有的时间来谈论孩子、便便、嘘嘘、尿布，总之，全都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梦的状态不仅属于分析情境，而且与分析情境的任何工作都有关，那么也与督导有关，如果我们把所有事（某个分析中，看似除了谈论一个孩子在哪里尿尿，另一个又在哪里便便，就没有其他什么内容了）都看成是在督导框架中与督导师的交流，那么我认为受督导者是在说，和患者一起，我们正接近一个很热的地方，维苏威火山，我们开始靠近一个所有人都在说着奇怪语言的地方，那是一种难以理喻的语言，因此，我们似乎从世界的北面带着帮宝适（Pampers）尿不湿搬到了这个语言完全听不懂的、混乱的阿拉伯世界。这一分析小节与这一督导小节是完全对等的，一切都从第一句沟通开始，当患者进来了，说昨天他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一些简单的闲聊。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都视为场域，那么督导就是从我们打开门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我们和患者说再见的那一刻为止。

这样我们就发挥出了独特的分析之力，那就是梦，我们说分析工作的本质作用正是能够转变成梦，也就是说，在一段叙述中意义被共享，所有压在那里的东西都是一种症状，例如焦虑、不安、分裂的部分，这一点与奥格登（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想象一张报纸被撕成100片，我们把这100片放入肝脏，那么就会发展成一种患有肝病的疑病症。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成功地把这些碎片粘在一起，变成一整张报纸来阅读，肝脏就被治愈了，我们就知道这张纸在说什么了。我想说的是，正是分析师把精神分析变成了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它真的非常简单，你需要做的只是持续思考。一旦我们和患者在一起时，交流对我们是最有利的，对他也是最有利的；只要我们去指责他，不去说所有都是他的错，不指责他的攻击、误解、嫉妒，这就足够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朋友想要和我们谈谈，我们这样告诉他：“你在阻抗，你很嫉妒，你攻击设置，你的阻抗是……”所以我要从分析的简单性和它是如何变得复杂说起，还有一些我在这

一行工作了40年还不知道如何发音的词汇说起。我知道怎么用法语说 àpres-coup^[3]这个词，用德语我就不会说了。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得过于复杂？让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重新赋予重要意义（re-signification）。我们精神分析喜欢把自己搞得难以理解。

卢卡·尼科里：

不久前，托马斯·奥格登将诠释（interpretation）的概念从“提出一个诠释”扩展到了“一个非结构对话的解释功能”。

安东尼诺·费罗：

像做梦一般谈话。

卢卡·尼科里：

没错，像做梦一般谈话。在你看来，这种方法中需要注意的风险和契机是什么呢？

安东尼诺·费罗：

风险是患者被治好了，他感到好多了，一种分析的方法被另一种取代了。

卢卡·尼科里：

好吧！

安东尼诺·费罗：

也就是说，对于兵马俑（Terracotta Army）来说风险是真的存在的，如果他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录音机，这个录音机一直在播放着陈词滥调的话。毕竟最严重的恐怖症就是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是对思考的恐惧。

即便我们物种演化出的最新功能就是思考，我们还是一个不愿意思考的物种。呕吐、排便，很多进化程度不那么高的物种已经可以这样做了。思考是我们人类最新的功能，但这是我们不想做的，所以我

们才会遭受广场恐怖症之苦。什么是广场恐怖症呢？它是对思考的恐惧，是对开放空间的恐惧，是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恐惧。

最近，我读到一位意大利科学家的文章，由于一对脉冲星的发现，他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的正确率达到了99.95%。研究人员补充说，这个发现的科学趣味在于不符合的0.05%，瑕疵的背后是什么？还有其他什么观点吗？新理论？

然而，我们精神分析师们有时会有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c）倾向，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完美理论能够一直为我们提供保护，我们会想要能够待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保持自己在一种神性（divinity）的状态中。因此我们忘记了当我们身处其外的時候……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会想把精神分析当成撬棍来使用，对抗所有现实，试图不去体验渺小的感觉。我们相信自己要比例如骨科医生、皮肤科医生或水管工更重要。

相反，我们做的工作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我们的工作在对精神痛苦上是有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比骨科医生了解得更多。

卢卡·尼科里：

既然我们在讨论奥格登的梦的理论，他坚持认为即使分析师参与了患者的梦，这个梦毕竟还是患者的梦。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否占用了患者的梦或电影呢？

安东尼诺·费罗：

对于奥格登我怀有一份特别的喜爱，但是我也不完全同意他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患者的梦总是会被污染，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些源自分析师幻想生活的东西和分析师自身的创造性，也会支撑和充实（患者的梦）。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是分析师需要弥补的；毫无疑问的是，一位足够诚实的分析师要允许患者尽可能地触及他的梦，去梦到并且使这些与他自己生活和故事相关的变化发生。我认为这两者的心灵之间的污染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无法避免的，甚至我认为可取的。

卢卡·尼科里：

这个回答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曾经用有关16世纪艺术家的描述来比喻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之间的区别，分析师通过减法工作，就像雕刻家“剔除”大理石来制作雕像，而不是通过加法，比如黏土雕塑。这种方式建议分析师不要把自己的任何东西添加给患者。撇开这种划分看上去相当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事实不谈，现在，当有人说精神分析师丰富了患者的思想，我们不得不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与教科书上的分析师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操作。

安东尼诺·费罗：

我想说两件事。我意识到自己总是在给出一些迂回的答案，这是因为在我看来直接对答案做出回应会产生阻塞效应；因此，用这个问题来引出一条切线似乎更有成效，这或许会让我们回到某种答案上来。

第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去说的是，如果分析师越来越多地学会如何表达“这个我不知道……我对此不是很清楚……我们还并不知道”，我想我真的会很欣慰。我也在指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区别。有人可能会提到有成百上千种有关于此的理论。我想说还是有差别的，但是我还说不出差别是什么，我喜欢说“还”，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得更多，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另一个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的主题就是治愈因素（healing factors）。我们不知道治愈因素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知道了一点，所以我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治愈因素列表是绝对有效的，第一个因素是将意识过程……将无意识过程意识化。

你看，我刚才就出现了口误，也许是因为真正的治疗操作是让过度意识到的东西变得无意识，把一个过于具体的现实变成一个可以梦想的现实，还有其他我们知道的因素。但我认为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非特异性治疗因素。

我所说的非特异性治疗因素是指什么呢？非特异性治疗因素存在吗？不，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它们是所有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方面，包括：在治疗小节中，我们做了许多自己一无所知的心理手术，这些

手术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有点像是在克莱因之前，投射性认同是如何（不知不觉）完成的。显然，投射性认同在（人类）肇始之初就存在了，但是从克莱因开始，我们才将它们辨认并识别出来，对于所有其他存在的非特异性治疗因素亦然，它们使克莱因学派、弗洛伊德学派和奥格登学派的分析大致上以相同的方式运作。当然，事实仍旧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因素都是什么，我们总是需要临床研究来给这些特定方面命名并确立其地位。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最初的问题上来……

卢卡·尼科里：

对，我问的是精神分析师对（患者）心灵的丰富。

安东尼诺·费罗：

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方面，我会想要谈点儿遗传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是的，也许你甚至可以克隆一个孩子，但是这不是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用分析师“滋润患者的心灵”这种方式去描述，这种描述下的分析师的角色似乎太过积极主动了。我认为分析师使用工具，促进创造性，参与到氛围

（atmosphere）当中，使特定的氛围成为可能，允许自己幻想，打开阻塞的感觉，走过被灌木丛堵塞的道路，走过无法通行的道路。但是我相信总有一种共同建构（co-construction）、共同叙述（co-narrative），我会说，这种分析师和患者能够一起共同做梦。精神分析，即两个心灵的产物，因此，似乎不太可能设想，（患者的）精神生活是在不被撒上一丁点儿分析师的面粉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卢卡·尼科里：

分析师的面粉从何而来？有些人会说，是从自由悬浮注意（free-floating attention）而来。通常情况下，当我进入自由悬浮的状态时，一种微妙的表现焦虑（performance anxiety）就会压倒我。我是否太接近患者的文本（叙述）了？我是不是太分心了？我是否在通过理论来过滤（信息）？我感到非常无聊，就让这个小节结束吧！所以，自由悬浮注意到底应该悬浮在什么位置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觉得自由悬浮注意属于不同的范式。现在我们从场域这个角度、从梦的场域的角度来理解分析小节，分析师的心理功能须要更具梦想性，这种功能将梦的总体结合起来，从而能够一起做梦，能够将我们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梦放到场域中来进行工作：梦中的转化，游戏中的转化，并把整个分析小节当成一个梦；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心理功能、我们的注意应当是一种柔和性、接收性的聆听，因为患者应该获得聆听，我们也必须对他的交流加以注意。所以，我会认为这种类型的倾听与其说像瑞士奶酪有洞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由悬浮注意的风险），不如说更像羊乳清奶酪，新鲜得可以捏（变形），柔软而具有感受性，但这需要一把叉子或勺子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我认为许多概念，包括自由悬浮注意，应该开始陈列到我们的展示柜中去了，就像过去的某些手术工具一样，外科医生或牙医的橱柜里也放着它们作为装饰。

卢卡·尼科里：

在接受训练期间，我经常被告知说我们最好是去使用患者自己提出的比喻。有一点是出自选择，一点是缘于偶然，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对患者的言语进行重新措辞，向他提供他的话语在我心中唤起的隐喻。我意识到，也许这些并不是沉思，它们只是简单的场景或意象，但也许在描绘、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培养做梦的能力方面是有益的。所以，我想问你的是，在你看来，（向患者）提供隐喻的意义在哪里，以及这个活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安东尼诺·费罗：

我想七成的精神分析工作都是你刚才描述的那样；说“我们应该只使用患者的隐喻”，这实在荒谬至极。这是无稽之谈，大写的无。若循此规，我们永远无法带来任何患者所需要的新东西；所以我们的隐喻性工作、我们的诠释工作，都是由隐喻承载的，有时只是隐喻，而不是沉思（reverie），因为它们非常接近我们的意识，并且涉及一些我们非常清楚的东西。另外，隐喻能够开始传达一些我们浑然不知的东西，这使它看起来更像沉思。我认为，隐喻总是被两条腿支撑着，一个更纯粹的隐喻关涉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我们将其变为意象的东西，其余则更接近于沉思，发生在我们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某事的时候，然后我们把它变成意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预都是通过隐喻或者沉思，对患者所告诉我们的内容进行重新表述，有时候则是以一种混合的方式，从而使患者的话语到达不同的意识水平、

去具体化（de-concretising）水平和抽象水平。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比昂的网格图（我为使用这个术语感到抱歉），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致力于促进从贝塔（ β ）到其他维度的转化。

并且我认为分析师的工作基本上是这样的。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把《卖火柴的小女孩》（Little Match Girl）的故事讲给每一个走进来的患者听，这就不是隐喻了，也不再是故事，这是一个阻塞型（blocking）的分析师：不要逢人就讲《拇指姑娘》（Thumbelina）的故事！

这个故事必须是在治疗室里发生的，第一次在治疗室里发生的故事，最好不要用太多次：隐喻、沉思或干预每次都必须是鲜活的。同样的事情重复第三次，甚至连治疗室的墙壁都会开始抱怨。

卢卡·尼科里：

所以你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通过建构意象和故事来达成修通，从而转化患者或者分析双方因为相遇而焕发生机的两个角色的存在方式的方法。请你举个例子好吗？

安东尼诺·费罗：

《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生动地描述了种种焦虑，这个故事就像是一个心灵处所，其中包含遗弃、孤独、悲伤、痛苦、绝望，这些内容并存其中。这些内容其实还可以编织成其他的故事。这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练习：尝试使用以下元素来编写故事，一个元素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当中所包含的种种焦虑，另一个元素可以是吸毒者、性成瘾者、妓女、红色旅^[4]成员、原教旨主义者、连环杀手、蒙扎修女（the Nun of Monza）、成绩斐然的工作狂、姐姐或者素食主义——动物权利活动家等（角色）。当然，上述每个元素都可以有一个男性版本：一个男性跟踪狂、一个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男人、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男人。

皮雄·里维埃（Pichón Rivière, 1971）曾提出一个假设，即抑郁性的焦虑（depressive anxieties）是许多或者所有疾病的基础，这些疾病的出现是对这种焦虑的反应和自我振作（revitalising）的尝试，这些在《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里均有所体现。

我要读一段对话摘录，正是这段对话让我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它允许患者对自己的状况进行思考。

患者走进来说：“我今天迟到了，只是晚了一点……我做了一个梦，昨天晚上我梦见我的朋友安娜，我至少5年没见过她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每次我不得不和她分别，都会给我带来沉重的打击，我被一种可怕的焦虑压得喘不过气来。她的父亲有保镖，他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他当时是红色旅的攻击目标……那时我的体重是超重的，也许在梦里我很胖，我穿了好几件、好几套内衣。”

我：我们提到了红色旅，提到了和安娜分别，那几套内衣或许还带给我们一些谦逊、端庄的感觉。或许一套就够了吧！

患者：红色旅很可怕，在我看来，安娜走开了似乎就等于消失不见了，然后我去了咖啡馆小便，然后才进来。安娜真的很漂亮，或者至少男人们都喜欢她。我却总是第二个选项，没有人注意过我。

我：嗯，梦里还有一个你可以使用的厕所。看起来好像你觉得自己像是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是第二选择，甚至‘不是选择’。至于那些内衣，似乎是避免自己成为‘轻浮女孩’的好办法。我想起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一群妓女来到一座炎热的小岛上，这代表着一种兴奋的气氛，毕竟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孤独和悲伤。

患者：没错，但卖火柴的小女孩已经是一个开始了，她一定知道一个有壁炉的地方，但真正悲剧的是斯维特拉娜（Svetlana）在《房间》（The Room）这首诗里所描述的那样。在诗中，你挣扎着找到四面墙，才勉强找到了一点空间感；斯维特拉娜有一个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她把她的孩子送到了孤儿院，孩子在那里饿死了。

我：再想想看今天你只是稍微晚到了一点儿。

这位患者向我指出，在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发生之前，肯定还有更多的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须要至少有一个“温暖的壁炉”的概念、一个“祖母”的概念，尽管这些东西已经丧失了、遥不可及了。它们却是做梦和欲求的基础。

卢卡·尼科里：

所以，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欲望。我的患者洛瑞达娜（Lore-dana）想要我、想和我做爱，直到昨天，这个问题还不怎么让我烦恼：（我告诉自己）她实际上想要的是她的父亲，而我只不过是他的移情性的替代者。今天你告诉我说洛瑞达娜想要和我的心灵结合，她用性角色来进行描述：“医生，我想和你做爱”——只是这种欲望在语言上的变体。（对此）我甚至可能会同意，但是如果洛瑞达娜的思想与她的“私处”一致，那么洛瑞达娜就等于是铁了心了，对于分析师来说，要掌控患者的欲望而又不能以移情的方式把它岔开、不引入她的父亲，这不是很困难吗？我是否应该调动起她的情绪，然后帮助她去转化这些情绪呢？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能会怀疑这是否与“真实的”爱情有不同，比如和理发师在一起，和那个会倾听我们、理解我们并且触发火花的人在一起，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做的可是一本正经的行当呀，现在我很惊慌了！

安东尼诺·费罗：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洛瑞达娜：“洛瑞达娜，我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和你做爱！我们在这里相遇真是太糟糕了，正是因为在这里相遇，这是我们唯一不能在一起做的事情！”

这样不是更诚实吗？尤其是如果洛瑞达娜真的很漂亮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正是因为我们在哪儿（分析关系），才阻止了我们和洛瑞达娜做爱。如果这是事实，那我们就说出来：我为什么要谈及她的父亲、俄狄浦斯和反向俄狄浦斯（counter-Oedipus）？事实是，在这儿有位真正爱我们的洛瑞达娜，理论上我们可能也会爱上患者；因为实际存在着不对称性和责任，所以我很难想象会如此，这就像（去设想）爱上了自己的后代，对我来说这太不可能了。但假设它可以发生，在这一点上诚实是值得的。但我们为什么不跟洛瑞达娜做爱呢？

也许是因为，如果洛瑞达娜在超市遇见我，她看到的只会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她完全不会有任何心仪的感受。她在那里（在接受分析）的事实，以及她感到受欢迎、得到帮助、被理解的事实，会让那种心仪的感觉产生吗？我不会把故事、移情或者（强迫性）重复这些说法带入其中。我想说的是洛瑞达娜确实恋爱了，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是在做分析的协议下认识的。如果这个比喻不起作用，我可能会告诉洛瑞达娜：“洛瑞达娜，这就像你告诉你的牙医去（和你）做爱！但是我怀疑你对牙医说那些只是为了不让你的牙齿被钻个洞！”

我们总得找到一个不同的、令人信服的角度。例如，如果我们一点也不喜欢洛瑞达娜，我们就不会说同样的话，我们的反应也会不同。

卢卡·尼科里：

既然我们不能与患者交配（mate），似乎我们所能拥有的最高的结合就是能够站在患者所在的地方。为什么？这出于什么目的？

安东尼诺·费罗：

因为，我认为患者首先需要的是收到一张送货收据，就像邮递员带来的收据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孩子，你在谈论一个给你布置太多作业的讨厌的老师，这时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其实是在说你觉得我在威胁你，因为我给你提了太多问题。”在我看来这是无稽之谈。这个孩子会觉得：“这个家伙疯了吗？我担心的是老师！”

分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患者带着自己与女朋友、丈夫、邻居等之间的问题来找到我们，但首先他所需要的是感觉到有人把自己放在同样水平的位置上，与他分享并理解他在说什么。所以外显的内容是最重要的。从逻辑上讲，对于我们这些分析师来说，这些明显的内容充满了洞穴，在里面，我们可以建造、搜索、定居、探索，但首先要做的是确保患者感到他所说的内容被理解了，而不是被一种“你说这个，但你没有意识到你实际上在谈论另一件事”的方式拒绝。

卢卡·尼科里：

所以，从理论上讲，这种理解是什么，它不仅是治疗的初始阶段，而且通过合一（at-one-ment）成了分析工作的基石？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合一是个过程，这一过程发展了患者的容纳能力，也就是容器的容纳能力。容器的发展，这是我们分析师的关键功能之一，还有消化代谢能力的发展，也就是阿尔法功能和其他功能的发展。现在，让我来处理前两个问题。我认为，当你听到对方说一些你认为是送货收据的话时，你就会意识到：“他明白我在说什么，他理解我！”

患者说了些什么，然后你说了一些他感到和他所言很切合的话；他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并不孤独，在他身边有了一个能够理解他的人，否则就像你去看医生，说你感到腹部剧痛，然后被医生告知：

“张开嘴，我要看看你的扁桃体。”看一下扁桃体可能是对的，因为也许有链球菌从喉咙进入其他部位，但是如果一个患者告诉我说他胃里有一种剧痛，我就会马上去摸胃，看看感觉如何，检查胃壁是否有反应，是否有腹膜炎。我会从胃开始，即使胃痛可能是无数与胃无关的其他疾病的附带现象，但是患者需要感觉到我们和他一样，我们不是在胡言乱语的奇怪巫师。比昂论及在诠释的意义上扩展场域的时候提到了这个（1963）。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诠释把兔子从帽子里拽出来，我们至少应该和患者一起看到了兔子的耳朵。

卢卡·尼科里：

把兔子关在帽子里，不告诉患者我们所理解的东西，这样做有多困难、又有多大用处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我们应该告诉患者那些他能忍受去理解的东西，这样做也许会让他有些不安，但不至不堪重负。因为让一个人进来，然后让他在震惊的状态下离开，这样可能会导致他被车子撞到，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先理解的时候，我们应该等待并尝试（与患者）一起理解。与患者一起理解是比较合适的，尽管有时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见解，在过去的话可能会迫不及待地告诉患者。现在，我们也可以告诉患者我们的见解，但有时我们理解的真相离表面的真相太远了，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和患者一起朝着那些真相的方向走去；当然我们也是在假设那些真相（见解）是真实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真相（见解）可能被消解，失去意义。

卢卡·尼科里：

一位美国同事最近提到了你对分析师心灵的划分，分为两部分：一是分析师为患者烹饪答案的厨房，二是他“提供”诠释的餐厅。然后您补充说，分析师应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厨房，测量盐、香辛料的用量，等等。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厨房的菜端上来呢？

安东尼诺·费罗：

这真的很重要。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分享患者交流的显性意义。此后不久，我就开始在厨房里烹饪这些显性的材料，当我认为它已经充分转化或煮熟了，我就会上一碟小菜。非常小的一碟。

卢卡·尼科里：

一道开胃菜？

安东尼诺·费罗：

开胃菜！只是一个开始。我把它提供给患者，不带强制地，给予他一个机会品尝。在看到患者的反应后，我会决定是否可以把第一道菜也上了，然后也许会上第二道菜。加薯条或者不加薯条，多盐或者少盐。我可以通过听患者对我的干预的回答来调整菜肴。这样，厨房和餐厅之间就有了连续不断的工作流程。这种流动总是存在的。

我不喜欢制定诠释，我更喜欢提供意见。我给患者一些东西，然后我看着他对我的评论的反应，并且立即和厨房（我准备食物的地方）联系：少盐、多糖、多酱。我努力和患者保持和谐。

卢卡·尼科里：

我想这一切都与患者的能力有关，即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忍受我们告诉他的东西而不觉得分析太过痛苦，对吧？

安东尼诺·费罗：

完全正确。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患者能承受多大的情绪压力。

我在想一个以豹点斑的方式工作的患者：一个区域的电压达到3000伏（在故事中，它变成了暴力，一个叔叔总是要打他的妻子或杀死她），另一个电压为500伏（这是一个嫉妒的同事的故事），然后是低压区（表弟总是躲在电脑前玩游戏），接下来是那个从来没有与任何人有过关系却一直在照镜子的朋友，最后是那个一直用智能手机玩网络游戏的儿子。

自我的这些方面并不像豹子的皮毛斑点那样彼此“凑近”、紧密相连，而是相互之间没有维系，并被放置在非常遥远且彼此之间没有交流的场景中。所以出现了一系列可能的情绪电压，从最狂暴的到那些带有一些像是自闭症味道的，但被分解成了非常遥远的地理区域。

另一种调节电压的模式是通过调整分析访谈持续的时间来实现的：从预期的50分钟，到仅仅10分钟，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力得到了缓解。

卡罗·埃米利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在他的小说《南220年的暴雷》（Un fulmine sul 220）中对这一切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叙述，在这个爱情故事里，本来两个情人终成正果，却以悲剧收场。这对情人第一次释放他们的激情，就好像变电站大功率放电，变得不可收拾。加达又将小说命名为《识得愁滋味》（Acquainted with Grief）这并不是巧合，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悲愁？

因此，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就是定量配给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所以有时你不得不采取行动，从最无害的用量，到止痛药尚能起效的边缘用量，比如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位“用黑莓”让自己镇静下来的外科医生。

卢卡·尼科里：

这让我想起了现实的丧失之苦，在梦中的访谈的转化。几天前，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同事在思考一个问题：在真诚地分享悲伤的时候，在“梦着”那些人生悲剧的过程中，失去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到了癌症诊断、孩子的死亡、婚姻的突然破裂。

安东尼诺·费罗：

首先，我认为第一步应该始终站在与患者合一的位置上。上帝禁止我解释这样的事情，愚蠢地对癌症患者说：“你感觉到某种东西在你体内生长，那是你的情绪！”那就太疯狂了。或者，我不知道我还能对一个失去孩子的人说些什么蠢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合一是重要的，它意味着要注意患者显而易见的交谈。我们总是要从这里开始。我当时想的是一些只与我有关的事情，我想了多久，我应该分享多少，这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然后我要看看情况会如何发展。然而，我能为一个孩子去世的患者所做的，是帮助他发展代谢悲伤的能

力，尽管我显然不能把他的儿子还给他。我可以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把他生活中曾经遗留下来的问题处理好，那些他当时因为有孩子要照顾而忽视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工作，是一个内在的工作，关于现实我做不了任何事。如果说有一个肿瘤，那么要去的地方是肿瘤科，而不是我的办公室。但如果一个患者来找我，他得了癌症，我可以帮助他发展出那些可以“消化肿瘤”、消化死亡焦虑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可以发展他用来进行思考、承受痛苦和再次体验喜悦的工具，即使对于现实我无能为力。我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现实，我不能给他一个孩子，就像我不能把他介绍给我大龄单身的表亲跟她再要一个孩子一样。我在现实中是没用的，但我总是必须从患者的立场去接受他的视角。如果这个患者是疑病症患者并且有肝脏的问题，我就必须乘坐宇宙飞船和他一起飞到他肝脏所在的位置。我们的电影以两个外星人降落在一个巨大的红色物体上开始，这个物体就是这个叫作肝脏的星球。我们得走了，电影《红色星球》开始了。我们必须得在肝脏上待上一段时间，多亏我们的负性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我们要从那里朝哪儿走。

卢卡·尼科里：

负性能力总是让我想起苏格拉底说的“我知道我一无所知”。^[5]这是一种与弗洛伊德的确定论（positivism）截然不同的态度，弗洛伊德认为“……那些（看似）无关紧要、令人费解的东西所在之处，就是我把我有意识的知识所放置的地方。”

安东尼诺·费罗：

这和斯维塔瑞斯所说的使无意识（inconsiare）正好相反。

卢卡·尼科里：

我想知道，新手分析师需要学习多少才能向他们的患者提供一种凹性（concavity），而不是不断努力提供诠释的凸性

（convexity）。在我们职业生涯的初始，但也不仅仅是在初始，我们害怕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相反，我们必须让患者知道我们确实有话要说，对吧？因为任何人都能听呀！

安东尼诺·费罗：

我想负性能力是比昂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让我们记住，他把它描述为一种能够站在偏执——分裂心位（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而又不受任何迫害的能力。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能否处于怀疑和无知的状态而又不会因此感到受到威胁、内疚、惊恐的能力。在那里，就像在电影院里，当屏幕灯熄灭或者电影停了，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在那一刻不要尖叫，不要给消防队打电话，而是坐着等有人把胶片重新粘好，让电影继续下去。那么它有可能是一部更加复杂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灯熄灭了就是电影本身的一部分。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电影的一部分呢？我们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

我们必须等时间过去，等待事物形成一个定义，一个形状。仿佛我们在目睹毕加索在画布上作画。逻辑上讲，我们应该等待画逐渐成形，在开展工作（即使是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之前，让毕加索继续他的创作。负性能力与分析师（或者说“场”本身）能够在分析小节中的做梦能力有关，从而能够对症状进行解构，使其得到转化。

卢卡·尼科里：

所以偶尔闭上嘴也是不错的！

安东尼诺·费罗：

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来掩饰一下。我不反对沉默，如果一个人觉得保持沉默很自在，那为什么不呢？我是个健谈的人，对我来说保持安静很难。我偶尔也沉默，但不多见。

卢卡·尼科里：

让我们从一个“好的”负性的事情转到一个“不怎么好的”负性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中，几乎没有什么确定因素（如果有人可以说是确定的话）能够指导我们。一个我在努力克服的问题是，最好在负性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突然爆发之前将其放到台面上。然后我读到你的一段采访，现在我担心你也想剥夺我的这么一点确定性。我们必须要把负性移情放到台面上吗？

安东尼诺·费罗：

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让它来到台面上。

卢卡·尼科里：

是的，因为前面说到了全球定位系统，那么负性移情是否是一个可靠的信号，表明我们的分析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地方呢？

安东尼诺·费罗：

关键在于你是怎么把它放到台面上的。我可以以悲剧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就像艾琳·帕帕斯（Irene Papas）^[6]的某部戏那样，或者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我先前碰巧提到的那个被主治医生迫害的患者，她在每次分析小节开始的时候都会跟我讲她的主治医生又对她做了哪些可怕的事，他（主治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冒犯她。然后这个主治医生也在努力尽可能保持安静，但他真的是最低等的人渣：他羞辱她、冒犯她、打她。我甚至打算说点什么、对什么事情做点评论、对移情也给出一个解释，但是第二天这个主治医生又做了比以往更可怕的事情，他是一个托克马达^[7]。有一段时间，这个患者产生了一个她非常喜欢的想法，就是开始写一本关于如何杀死主治医生的犯罪小说。然后她真的开始写那本书，在书里面她创造了一些很棒的东西。她发明了一种杀死他的方法，涉及了解他服用什么药，然后调查常见的食物，比如葡萄柚等，这些食物会改变药物的吸收和代谢，然后她在网上搜索，找到了合适的化学物质，直到今天，她还在写这本犯罪小说，一个从谋杀主治医生开始的系列谋杀案。我们应该剥夺她做这件事的乐趣吗？跟她说“你在告诉我你害怕我，所以你恨我，你鄙视我，想把我从你的生活中消灭”。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什么用呢？现在让我们玩一玩“杀死主治医生”，这让我们俩都很开心，然后看看我们的结局如何。她甚至可能成为作家，也可能不会。简而言之，关于负性移情，我们应该对患者的所有不同的功能状态都保持觉察。分析小节应该始终是多元化、多种群的（poly-ethnic），其中包括患者的多元种群和我们自己的多元种群：我们都是色情狂、罪犯、谋杀凶手，同样也是患者。但是我们只关心这个范围内的几个角色，否则每个人都会泛化成万事万物；我们须要看清更接近身份认同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从意大利人的身份变成摩洛哥人或塞尔维亚人的身份，我们已经是在扩大（分析场域的）领土了，当然，我也不一定非要把柬埔寨人的身份也包括在内。我们让波尔·布特（Pol Pot）^[8]留在柬埔寨；如果碰巧他坐上了飞机，距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就带他走，但通常我会把他留在原地。不过，我们应该尝试靠近那些接近我们的心灵的其他种群，或者至少我们应该有一种方法来理解他们的

语言或者他们的活动方式。就像我提到的那个督导的案例，其中那位同事走近了这些令人费解的那不勒斯人。精神分析是这样子的，分析是走出去、找出来，分析必须是多元种群的，也就是说，分析应该去获取我们身体中所有相异的运作成分，如果它们已经结构化的话，或者如果它们仍然尚未成形，那么给它们一个结构，以便理解它们。

卢卡·尼科里：

还有一个很多人已经问过你的问题，但我仍觉得，当有人阅读你的任何书或者文章时，可能依旧会感到疑惑，因为这个问题与你的工作核心有关：故事如何治愈（疾病）？什么故事可以治愈？还有就是什么故事无法治愈？

安东尼诺·费罗：

治愈（疾病）的并不是故事，也就是说，我不能只是编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能治愈，或者任何故事我都能讲。如果这些故事“生来”就允许比喻性表达（figuration），那我们就能够使用它们，事物的表征在场域中沸腾并且由此寻得一种被人言说的方式。请记住，今天的精神分析显然越来越多地关注于前语言的、前符号的，这些原始的水平；能够提供一个叙述的可能性是一种使得那些原先可能不可命名的需求、恐惧和焦虑变得可被觉察的方式。故事本身是没有疗效

（curative）的，它们的疗效在于让人们可以捉到几条鱼，带到阳光下烹煮。

我觉得治疗元素是由患者和分析师共同构建的，这些元素过去是不可逾越的，不可传递的，或不可表达的，当我们和患者一起把这些元素编织成一个共同的故事时，就有了治愈的方法。这种共同的故事的范围可以从我们已经谈过的梦中的转化（transformation in dream）到游戏中的转化（transformation in game）。作为游戏中转化的一个例子，我在前面提到了与玩弄设置相关的内容，那个患者不愿意躺在躺椅上。但也有可能是我所说的传记中的转化

（transformation in biography），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用费心去检查（内容）是否与现实相符（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像转化的工作一样，通过一个故事，一个人自身存在的可叙述性、可见性、一致性被转化、被创造、被发明。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案例督导，在这个案例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患者，非常严重，她讲述了她小时候是如何像她兄弟一样被父亲强暴的。如果我从这里开始

这个故事，基本上就像看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电影的后半部分，暴力行为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一小节前面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开头是绝对的好；渐渐地，这位分析师开始了一种越来越主动、越来越暴力的诠释行为，当然是出自良好本意；这时，那个强暴了女儿和她兄弟的父亲出现了。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个父亲强暴了儿子是真的，而强暴了女儿是假的呢？我只想说：

1. 我们不知道；
2. 我们无法知道；
3. 我们对搞清楚这一点毫无兴趣。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某一刻，在这一场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分析师暴力且具有侵入性的诠释，为故事中父亲的暴力行为和对女儿的虐待这一转化赋予了生命。一旦分析师在后来的反思中明白了这一点，他就可以写出一部历史小说。这就是故事中的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它也是多种可能的转化中的一种。施虐的父亲在那个分析小节诞生，在那一小节由于那种诠释而萌芽。

我们能不能说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师从患者身上拿走了暴力然后付诸了行动，因为这是患者经历中固有的暴力？是的，如果作为分析师，我们并不遵循如下观点，我们可以这么说：移情诠释应当是连续的，这种诠释与患者的病史无关，而是与他自己（指分析师）的历史和他自己的工作模式有关；所以暴力，即使是解释性的，实际上是分析师的，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施虐者就是分析师。因此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历史重构的矛盾，其中有一个虐待孩子的父亲，实际上他并没有虐待孩子；不过是不是这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将一个事件（即使是最不可思议、最难以置信的事件）变成一个故事，只要它前后一致，给人以坚定性，能够作为一个故事起作用；正是故事与我们同行，是故事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足够自由的未来；并且对患者来说能有一个非虐待性的分析师也是更好的。

卢卡·尼科里：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我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它与我的兴趣有关。我喜欢玩游戏，我玩了很长时间的 game，直到我不得不渐渐用精神分析取代它，直到我不得不变得严肃起来（似乎按照精神分析

的道理，我就应该变得严肃一些，至少部分如此）。然后我读到费罗谈到游戏中的转化，自然我就想知道它们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你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游戏中的这些转化是什么吗？它们在分析中可能具有什么意义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喜欢发现某些概念是如何诞生的。我一直有一种在分析小节中玩游戏的倾向，也许，甚至还有一种叙述的方式，一种运用我自己的沉思的方式，一种用它来制造些点子的方式，有时这只是一个语言游戏。但我第一次提出游戏转化的概念，是在波士顿一个督导期间，当时有个年龄稍长的分析师正在治疗一个非常活泼又相当失控的孩子。这个孩子开始折纸飞机（其实更像是火箭而不是飞机）并开始向这位分析师投掷，直到其中一架飞机打中了她的眼角，她被扎得很疼。然后，这位非常镇静的女士生气了，转而叠起纸火箭来，并开始用越来越大的力量朝孩子扔去。碰巧其中一个火箭打到了孩子的眼睛，击中了角膜，她僵住了，担心地想：“哦，我的上帝，我在做什么，我做了什么？”然后她终止了游戏，这个孩子开始用他所知道的最粗俗、最下流的脏话咒骂她。这位同事震惊地站了一会儿，直到她有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我不确定是否该称之为一个“观点”）、源于直觉的行为，她开始把这一系列脏话编成儿歌。所以她开始回应这一连串辱骂，把它们写成韵文，并以儿歌、押韵的句子等的形式叙述出来。不知怎么，这个孩子就被迷住了。在一连串的脏话和押韵的拍子之后，他说：“现在轮到我了，告诉我多一些脏话，告诉我那些脏话！”然后，她开始愉快地谩骂，这个孩子反过来又把这些污言秽语变成了韵律诗，把这些像诗一样送给了分析师。这个游戏还在继续：他们不是在侮辱或伤害对方，而是在玩“我们来骂脏话吧”，不过是以儿歌的形式。

第一次治疗结束，当这个分析师让这个孩子离开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一直在要求：“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然后在他离开时，他说：“好吧，我会走的，条件是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玩这个游戏！”

我发现这非比寻常：一个暴力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有趣的、不具伤害的游戏，一个让人逐渐能够说出糟糕事情的游戏。这又使我想起比昂在其某次研讨会上所做的评论，他说，我们在每一个分析小节里，都应该为患者提供一个“下次继续再来”的好理由。我觉

得乐趣就是下次再来的一个很好的理由，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精神分析小节，是双方在一起玩耍。

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严肃，或避免痛苦和苦难，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与痛苦、苦难、悲伤游戏。我们可以影响戏剧中的转化，悲剧中的转变，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转变都适合于表达我们想要将其复苏的情感，以便把一些全息式（holographically）鲜活的和有意义的东西带进分析场域里来，患者将能够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甚至作为一种与自己交流的风格。

卢卡·尼科里：

在我看来，这种操作的风险，尤其是对一个不熟悉这一行业的人来说，可能会陷入一种风格主义（mannerism），结果可能是更专注于游戏而不再是患者，比如失去对于疼痛的洞察。因为一种情况是在演戏，另一种是在生活。不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还是像你喜欢的那样，都看成一个戏剧梦（drama-dream）。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组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对待的情绪。否则就有可能面临风险，伫立在距离患者如此遥远的地方，让他与自己的游戏在一起感受孤独，同时分析师则在自娱自乐。

安东尼诺·费罗：

不，我认为没有人应该自己（跟自己）玩，而应该是和患者共同玩一个游戏。显然，赏玩悲伤可能也意味着一起书写加达（Gadda）的《识得愁滋味》：我想说的不是阿里斯托芬^[9]式的分析，充满欢笑的分析，不是的，而是用温尼科特（Winnicott, 1953）的话来说，是一种过渡性空间（transitional space）中的分析。然而，即使这个定义也不能真正传达我的意思，也许我应该说，在分析中总是有机会保持精神上的鲜活，永远不会被生活的具体事实所麻痹，即使是最悲惨的事实。也就是说，它意味着能够与患者分享这样一个想法：在生活中，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就像罗西里尼^[10]的《德意志零年》

（Germany, Year Zero），但本质而言，你还是可以从零开始，就像电影里说的那样。很明显，如果我们去想某个情境中有一些痛苦、一些严重的悲伤、一些灾难性的悲伤，但我认为，即便在这些场景中，某些时刻，也会有天劫余生之物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动，我的这种观念可能显得非常亵渎神明。甚至在那些情况下，痛苦真的就是“0”，也

就是说，疼痛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中心主题的情况下，某个无名悲剧就可能会在生活中发生，整个分析将集中在如何代谢这块痛苦的巨石上，如何把它转化成可以梦到、可以分享，我甚至要说把它转化成一种可以玩耍的高尚游戏。当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们应该始终把游戏当成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生日的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美洲印第安人”，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印第安人。然后我的姨妈，她非常疼爱我，她走到我面前，拿着一件T恤——顺便说一句，我真的很喜欢那件T恤——她把它放在我的肩膀上。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侮辱，有人胆敢把一件T恤放在印第安酋长的肩上，因为它扰乱了游戏，而且我记得我当时突然大发雷霆，因为这就像违背了我玩游戏创作的电影。

卢卡·尼科里：

在这儿呢，我来帮人类一个忙，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对我们无数次读到的“我们必须坚持留在0上”“我们必须实现0”这类语句的“反击”。许多分析师还不能比较好地领会比昂（的理论），因此需要你当初学者时的学习笔记，那么面对他们，安东尼诺·费罗如何解释这个0？

安东尼诺·费罗：

0是事物本身，是不可知的事物，它是患者进行分析的根本原因，它是正在建构中的同一性，它是我们永远不会知晓的东西。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0是什么，但我要说的是，总的来讲，在我的一生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0里面的什么转化。我只记得有一种转化不是通过知识或可以量化的情绪来实现的，而是心理成长的一次量子飞跃，发生在0当中的转化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有着二维精神空间的患者，一个黏人的、不知三维为何物的女人。有一天，她从二维的现实角度发现并接受了三维的视野，当她发现有第三个维度时，事物就不再是二维的了，对她来说就不再是平面的了。在这种新的深度尺度下，世界向她敞开了大门，她对自己和自己的情绪生活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认为关于0论述最精彩的是格洛特斯坦，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他说0必须在比昂的网格图（grid）的第二类别中进行转化。让我来解释一下，0必须逐渐地为人所梦到：我们永远不会知晓真正的0，

我们获悉的永远只是以谎言的形式而出现的派生物。换句话说，O必须经历一次谎言中的转化（transformation in lie），这使它变得可以忍受。如果不是在特殊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自己的情绪、需要、焦虑、恐惧和存在方式的最终现实（ultimate reality）；我们知道的将永远只是它经过稀释的那些面向。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梦或对话的创造性，在精神分析中或者与某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之间进行创造。我们能够接近真相（truth），但是任何真相，为了被（人）目击、分享或者体验到，都需要一些空间以便让谎言围绕着它。如果真相没有谎言作为把手，情况就会像是有人让我们直接去端热煎锅的锅盘，而里面的薯条在热气腾腾的油里嗤嗤作响，温度高得让人无法接近，为了拿起锅和真相（还有真相为我们奉上的美味的炸薯条），我们需要这个谎言之把手。

我们这个物种无法承受现实（真相）严酷、猛烈的冲击。当比昂说自己已经死于亚眠战役（Amiens）^[11]的时候，并不是在使用隐喻，比昂一再地指责克莱因不理解这一点：他不想表达悲伤的心情，不想谈论那种痛苦，也不想谈论那种痛苦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他只想告诉克莱因他已经死了。克莱因从不曾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也不明白比昂的意思。关于亚眠，比昂的看法是他死在了那里；我们不理解，而且，这是我们一生中也许会有那么一次半会遇上的经历。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死后还能活着，还能快乐。所以，我们用隐喻和谎言做的烤箱手套来靠近（真相），意思就是说借“谎言”来软化和缓和终极知识。

[1] Francesco Corrao，意大利精神分析师。——译者注

[2] 乔治·德弗洛（George Devereux）是匈牙利的一位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师，他对不同的土著民族进行了实地研究。

[3] 弗洛伊德所用的德语词汇Nachträglichkeit 的法语翻译，英文是afterwardness，含义是“对过往事件的一种延迟的理解或回溯性赋予意义，认为这些事件有性的或者创伤性的意义”。——译者注

[4] Red Brigades，意大利极左翼反政府组织。——译者注

[5] 苏格拉底悖论。——译者注

[6] 艾琳·帕帕斯（Irene Papas）是著名的希腊女演员，她的电影生涯横跨整个20世纪。

[7] Torquemada，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他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译者注

[8] 波尔·布特 (Pol Pot) 是柬埔寨革命家，领导红色高棉游击队。他在1976~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独裁者。

[9] Aristophanes, 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诗人。——译者注

[10] Rossellini, 意大利电影导演。——译者注

[11] 1918年8月8日，残酷的亚眠之战开始，盟军对同盟国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21岁的比昂指挥一支坦克部队，坦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项革新。几年后，比昂发表了一份可怕而又自相矛盾的声明，称他已经在战争中丧生。在《漫长周末》(The Long Weekend, 1982) 中，他写道：“他们想办法让人看起来栩栩如生，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死了。我吗？是的，我死于1918年8月8日。” (p. 265) 在《未来回忆录》(A Memoir of the Future, 1991) 中，代表比昂的一个角色说：“我不愿走近亚眠的罗伊路，因为我怕会遇到我的鬼魂——我死在那里了。” (p. 257)

第10章 会面

卢卡·尼科里：

因为你提到了詹姆斯·格洛特斯坦（James Grotstein），而且他不久前去世了，我想请你给我们说一说格洛特斯坦。

安东尼诺·费罗：

当我想到吉姆·格洛特斯坦，就不禁会心地微笑，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聪明，也没有意识到他让精神分析抵达了多少个转折点，所以，我十分怀念他的慷慨，他完全没有任何自负的表现，也没有（尤其是在思想上）对那些不那么聪明的人表现出蔑视的态度，还有他那无限包容的情感和温暖。然后我想回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他在波士顿比昂会议上发表精彩的演讲后所收获的掌声，所有听众站起身为他真挚地鼓掌

（Grotstein, 2009）。格洛特斯坦有一种伟大的能力去给予、去分享，那些将他的想法据为己有之人一点也不让他感到困扰；他没有占有的欲望，也不想霸占什么思想，他认为一个人越是去把思想分享出去，这些思想就成长得越多：没有产权概念。第二件事，我记得我们是怎么一起去餐厅吃饭的。他在波士顿的一条主要街道上走了很长一段路，却没有注意到裤子前面还有一块餐巾，有点像围裙，他走起路来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围裙，直到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才注意到他戴着走来走去的那块餐巾。然后他把它拿下来，搭在肩上，继续往前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所以，关于格洛特斯坦，我想要记住的是他那种完全不执迷于“我是格洛特斯坦”的态度：“我谁也不是！”

卢卡·尼科里：

我们来谈谈临床实践。目前，精神分析的重点落在了所谓的象征化缺陷（defects of symbolisation）上面，这在神经症患者和更脆弱的患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们仍旧必须使用象征化这个概念吗？

卢卡·尼科里：

如果想要达成共识，是的！

安东尼诺·费罗：

或许我们应当敢于改变语言，至少在专家之间是这样。当然也有英语，只要人们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或至少能说一点，就会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一些事情，那么说英语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彼此，即使我们在谈论象征化。

可是，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α 元素的转化，讨论一下容器的变迁，也就是说，用一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更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东西，从而更好地指出问题所在。也就是说，情况到底是 β 元素的过量，还是 α 功能的缺失？这有点像是把光学显微镜换成电子显微镜，后者能准确地告诉我们正在谈论的细胞膜究竟在哪里。

卢卡·尼科里：

给那些正在给有边缘性机能障碍（borderline functioning）的患者做分析的分析师一些建议怎么样？

安东尼诺·费罗：

观赏一部好电影，影片中牛仔们奋力地赶着一群牛过河，也就是说，要了解的是，这个人必须从“牛仔”的功能开始。

卢卡·尼科里：

就这样？

安东尼诺·费罗：

对啊！有一部牛仔电影，里面有一个庞大的牧群根本不想过河，所以牧人就必须学会如何容纳（contain）它们，如何驯服马匹。与一个边缘性的患者一起（工作）时，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在看西部片，比

如《正午》（High Noon），或者我们就站在那里看患者会给我们看什么片子，以及我们如何开始拍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边缘是对精神状态的一种分类。我们都有一些边缘的部分，我们应该与这些部分保持一种通达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在我们的边缘性（borderline areas）区域开设大使馆，在我们的精神病（psychotic）区域再开设一个，至少在自闭（autistic）区域开设一个领事馆，另开一个心身（psychosomatic）区域。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该认为某一种心理机能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卢卡·尼科里：

关于自闭症，之前你提到过意大利卫生部的指南，它实际上将精神分析和更多的疗法从自闭症的治疗中驱逐了出去。发生了什么？还有，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呢？

安东尼诺·费罗：

我认为在精神分析方面肯定是有错误的。我们没有学会说“我不知道”，而是反复声称“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让我解释一下。”我们的心灵仍有一些区域无法治愈；我们挣扎着去治疗那些区域，竭力减轻那些区域的痛苦。所以我不能够告诉一个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通过精神分析他肯定会感觉好一些，我只能告诉他今天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工作。当然，关于自闭症儿童，我们或许所知道的更多是研究而不是有效的治疗力量，所以我们在宣称任何观点之前必须要谨慎。

那么，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我想说的是，当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来临时，他们就会捉襟见肘，所以我不会担心。精神分析说它可以理解一切、治愈一切，这种宣称当然是失败的。精神分析并不能治愈所有。在有些事情上它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有些人做了很好的分析，与他们的自闭核心（autistic nuclei）相比，他们明显是进步了。我们不该忘记我们都有自闭核心，甚至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从自闭症的状态中被拯救出来的。我想这样的例子可能不会很多，主要是因为缺乏治疗模型而不是方法。有些疾病与我们正常的机能运作方式相差甚远，当今的一些模型对于（理解和治疗）这些疾病仍然是完全不够的。让我们坦诚我们仍然所知不

多，但如果我今天必须要开始一个分析（有些事我不会去做，因为做一次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毫无疑问，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就是针对自闭核心的工作。不是针对俄狄浦斯的工作，肯定不是。

我认为在未来的精神分析中会再次涉及自闭功能的各个方面以及自闭症患者，这是我的预测，而且将收获重大胜利。我认为那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工具。

所以，某些构思分析的思路必须改变。例如，一些分析师依旧习惯性地不断对自闭症儿童进行诠释，这不仅是完全愚蠢的，而且绝对是一种医源性的伤害，会让他们生病。当然，这是一个以（何种）新方式工作的问题，而人们才刚刚开始讨论这些新的方式。

卢卡·尼科里：

在咨询室之外的精神科机构中，场域模型是否有可能是用武之地呢？

安东尼诺·费罗：

严格来说，我不会将精神分析应用在咨询室之外的任何事情上，也不会应用于分析本身之外的事物。我知道这是一个激进的立场，尽管在我的培训历程中我有过在精神科诊所工作的特殊经历，那里的主任德·马蒂斯（De Martis）和他的助手佩特雷拉（Petrella）都是精神分析学家。我不得不说，每天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像精神科医生一样对待患者，没有给他们什么诠释；但是从给予他们人性的尊重、容纳他们、帮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表象和症状等方面来看，（诊所的）这种氛围无疑也是分析性的。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像我这样激进。我认为，公共医疗机构里的精神分析师可能比其他非精神分析师工作得更好，这要归功于某种倾听能力、特定的延展性以及人们对人们通常所回避的心灵区域的了解。所以我认为在医疗机构中可以找到与精神分析的某些方面的共通之处。在广度上，这是精神分析能够达到的最大值。有些精神治疗机构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分析模型，这样的机构过去有，现在也有：在马里兰州的罗克维尔（Rockville）曾经有栗子旅馆（Chestnut Lodge），如今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有一个奥斯汀·里格斯中心（Austen Riggs），这些机构都有一个精神分析

模型，患者在机构里接受分析，与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到团体活动中，其中的活动具有很强的分析导向。我认为这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机构了，但它是有效的！

卢卡·尼科里：

你认为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之间的对话有用吗？还是你把它们视为两个平行发展的世界，几乎从来没有过交集？

安东尼诺·费罗：

我会用比较激进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它们就像两个迷人的平行世界，各走各的路。精神分析是一门与神经科学无关的学科。如果我们想让它们彼此交谈，我们可以做到，因为也许有些人想要发现边缘系统（limbic）区域的机能，这使他们感到快乐，如果这能证实即使是在我们醒着的时候，梦的活动也确实发生的话，也许他们会更加快乐，等等。

我会让每个人都自由地与他们想要对话的人去对话：如果一个分析师乐于借用神经科学、地理学或烹饪的概念来更好地工作，那就让他自由地去做吧。我不会禁止任何人在那个时候去做对他有用的事情。如果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个人是否需要阅读神经生物学方面的东西，一方面，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我根本不需要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2016年的人，我是需要它的。因为这些东西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像我对黑洞的概念感到好奇一样。但是至于黑洞是否与精神分析有关，我是怀疑的。当然，除非是把它当成一种比喻来使用。

卢卡·尼科里：

在我们这三次会面期间，有一只燕子在排水沟里筑了个巢，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外面传来了燕子雏鸟的甜蜜啾鸣。为这些鸟儿保留一个问题有多重要呢？即使它们在我们的办公室之外，也不在精神分析的领域里。

安东尼诺·费罗：

嗯，我希望小鸟总能从蛋里孵出来，找到一个巢。那么，我也希望不仅有那些能发出甜美啾鸣的小鸟，也有小鸟能发出咒骂的啼鸣。

我有一种深深的恐惧，那就是精神分析变成了“正常模式”（normotyping），一种只允许你变得“甜美”的东西。但愿我能在“咒骂”和“蜜语”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的交替，这种交替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去做一个攻击传统的人，但也不必一直重复着《求主怜悯文》（Kyrie eleison）或者《基督慈悲》（Christe eleison），固守这些庆典仪式。

卢卡·尼科里：

在结束我们的访谈之前，我想借用一位巴西^[1]同事的问题，问问你对精神分析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即将迎面来临的前景和挑战是什么？

安东尼诺·费罗：

我希望精神分析再活100年，再活100年，再活100年。我有点担心，因为有时候它会冒着不断重复自身的风险，而我认为我们应该埋葬很多在临床实践中不再有用的概念。我们应该有勇气抛弃我们不再需要的东西，使用全新的工具、技术、方法、思想，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是革命性的。我希望清醒的判断力能占上风；我希望有可能继续看着精神分析蓬勃发展，再一次转变成一种有活力并且彻彻底底有创造力的东西，而不是目睹着它有时被“侏罗纪”（Jurassic，意指古老的）协议所束缚住，然后死掉。我记得上次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大会上，我说过，我厌倦了把精神分析看成一种用来把一种语言说的话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工具，正如罗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2]使得我们可以做的那样：在这块石碑上，同样的句子用象形文字（hieroglyphs）、通俗文字（Demotic script）和古希腊文字写成，这使我们能够破译那些象形文字的含义。今天，我不再把精神分析看成一种能够解码其他语言并以不同语言传递信息的东西了，但我很乐意看到罗塞塔石碑被砸碎，摔成碎片，然后放进烤箱里，看看烤熟了会有什么结果。

[1] 欲了解更多细节，请参考洛桑格拉·德·奥利维拉·法利亚（Rosângela de Oliveira Faria）的采访，该采访预计发表在第19期《伯格大街》（Berggasse）上，这是位于里贝朗普雷图（Ribeirão Preto，巴西南部城市）的巴西精神分析学会的双年刊。

[2] 制成于公元前196年，其上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登基诏书，且用三种文字刻成。18世纪末石碑被发现后，学者们基于其中两种仍在流传的文字，解读出另一种已经失传的文字，即古埃及象形文字。——译者注

参考文献

- Adams, D. (1979).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London: Pan.
- Aguayo, J., & Malin, B. (2013). *Wilfred Bion: Los Angeles Seminars and Supervision*. London: Karnac.
- Baranger, M., & Baranger, W. (1961–1962). La situacion analitica como campo dinamico. *Revista Uruguaya de Psicoanálisis*, 4(1): 3–54.
- Bion, W. R. (1959). Attacks on l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0: 308–315.
- Bion, W. R. (1962).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Heinemann.
- Bion, W. R. (1963). *Element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 Bion, W. R. (1967). Notes on memory and desire. *Psychoanalytic Forum*, 2: 272–273, 279–280.
- Bion, W. R. (1970).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Tavistock.
- Bion, W. R. (1974). *Brazilian Lectures. Revised and corrected edn.* London: Karnac, 1990.
- Bion, W. R. (1982). *The Long Weekend: 1897–1919 (Part of a Life)*. Abingdon, UK: Fleetwood Press.
- Bion, W. R. (1991). *A Memoir of the Future*. London: Karnac.
- Bion, W. R. (2005a). *The Tavistock Seminars*. London: Karnac.
- Bion, W. R. (2005b). *The Italian Seminars*. London: Karnac.

- Bleger, J. (1967). *Symbiosis and Ambigui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 Bolognini, S. (1991). The analyst's affects: analysis by the ego and analysis by the self. *Rivista Psicoanalitica*, 37: 339–371.
- Bolognini, S. (2008). *Secret Passag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 Calvino, I. (1965). The origin of the birds. In: *T Zer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9.
- Choder-Goldman, J. (2016). Global perspectives: an interview with Antonino Ferro.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13: 129–143.
- Civitaresse, G. (2014). *I sensi e l'inconscio*. Rome: Borla.
- Civitaresse, G. (2015). Transformations in hallucinosis and the receptivity of the analy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6: 1091–1116.
- Corrao, F. (1986). *Il concetto di campo come modello teorico*. In: *Orme (vol. 2)*. Milan, Italy: Cortina, 1998.
- Etchegoyen, H. (1986). *The Fundamentals of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London: Karnac, 2005.
- Freud, S. (1918b).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S. E.*, 17: 1–124. London: Hogarth.
- Grotstein, J. S. (1981). *Do I Dare Disturb the Universe? A Memorial to Wilfred R. Bion*. Beverly Hills, CA: Caesura.
- Grotstein, J. S. (2009). Dreaming as a “curtain of illusion”: Revisiting the “royal road” with Bion as our gu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0: 733–752.
- Joseph, B. (1985). Transference: the total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66: 447–454.
- Laplanche, J., & Pontalis, J.-B. (1973).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Hogarth.
- Merleau-Ponty, M. (1945).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 Nissim Momigliano, L. (2001). *L'Ascolto Rispettoso. Scritti psicoanalitici*. Milan, Italy: Cortina.
- Ogden, T. H. (1994). The concept of interpretive action.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63: 219–245.
- Pichón Riviére, E. (1971). *El Proceso Grupal: del Psicoanálisis a la Psicología Social*. Buenos Aires: Nueva Vision.
- Quinodoz, J. M. (2004). *Reading Freud*. London: Routledge, 2005.

- Stern, D. B. (2015). *Relational Freedom. Properties of the Interpersonal Field*. London: Routledge.
- Thomä, H., & Kächele, H. (1988). *Psychoanalytic Practice. Vol. 2. Clinical Studies*. Lanham, MD: Jason Aronson, 1994.
- Winnicott, D. W. (1953).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A Study of the First Not-Me Poss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4: 89–97.
- Winnicott, D. W. (1960). The theory of the parent-infant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1: 585–595.